

- 553193

137-8.
56382;3
F.8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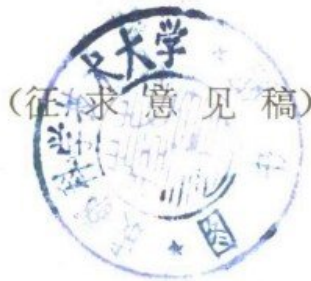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第一分册

(美) 包 华 德 主 编
沈 自 敏 译
林 东 民 校



37-8.
382;3
4.1

成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
基本馆藏

中 华 书 局

1979年6月



553193

137-8
5638233
F.8 4.1

137-8
5638233
ES 41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第一分册

(美) 包 华 德 主 编
沈 自 敏 译
林 东 民 校

手
写
原
稿

中 华 书 局

1979年6月

内部参考 注意保存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第一分册

(美) 包 华 德 主编
沈 自 敏 译
林 东 民 校

中华书局排印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中国书店代发
北京体育报社印刷厂印刷

1979年6月印刷 定价：0.78元

译者说明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全书四巨册，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处于1966—1971年陆续出版。原书收入我国辛亥革命以后各方面有名人物的传记五百九十五篇，约一百四十万字。现已全部译出，先行将其中绝大部分，按原书英文字母排列顺序分十二册陆续出版，其余部分另行处理。

原书主编包华德(Howard L. Boorman)，曾于1947—1950年和1951—1954年间先后在美国设于北平、香港的外事机构任中文秘书。这部传记辞典是1955年包华德提出建议，由福特基金会提供经费，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持下编写的。除主编包华德外，参加编辑工作的先后有十五人。列名的传记撰稿人有八十一人，其中有四十一名中国人或美籍华人，比较知名的有张嘉璈、何炳棣、薛君度、李书华、柳无忌、孙任以都、邓嗣禹、吴相湘等人。不少传记除根据文献资料外，还采用了一些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述资料。

原书是近年来国际间流行比较广泛的一部现代中国人物传记辞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编者和撰稿人由于种种局限，在评价人物方面不可避免地不够全面，事实记述也难免有失实之处。因传记内容涉及的范围很广，译者又限于水平，译文定有不少错误，请各方面读者予以指正。

1979年4月

序 言

研究历史的各个时期，应避免
一般化，要研究人物和家族。

罗纳尔特·赛姆

大约在三十年前，恒慕义在他博士论文前言中，间接提到需要有一部二十世纪中国人名辞典。恒慕义的博士论文，是译注顾颉刚《古史辨》的自传序。恒慕义在论文中还提出了一个矛盾的问题，他说：“为了使原著明白易懂，我尽力在每一处标明确切日期（只要能找到）。为此，我经常为弄清一个日期而花费很长的时间进行磨人的搜索，即使在最完备的中国图书馆里也不能得到充分的帮助。这种情况对近代、现代作家更是如此。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寻找一个远在十二世纪的中国人的确切日期（只要有记载可查）要比寻找十五年前去世的人的日期反而容易。”

恒慕义博士在他工作的后期，用很大的精力筹划和编订《清代名人传（1644—1912）》，这乃是一部仅有的不可缺少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西文参考书。虽然后来出版了少量其完备和可信程度不同的传记和传记参考书，但是，恒慕义博士在1931年所指出的状况并无根本改变。1958年出版的由已故的袁同礼编写的一本完备的书目汇编，书名《西方文献中的中国》，其中属于1900年以后的人物传记书目仅占七页，大部分篇幅又是孙逸仙、蒋介石、宋美龄和毛泽东四个人的传记著作。1964年出版的由巴黎的赛诺和伦敦的勒斯特合编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入门》一书，其中传记部分竟少到只有四页。这证明西方学者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有关人物传记的研究工作几乎还没有开始。

六十年代中期，中国以一个主要的强大国家出现于世界，因此，需要有一个机构从事民国时期这一段历史的认真研究，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本书涉及的民国时期，是指从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到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这三十八年的时间。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进行系统研究，不仅因为它是近

代史的一个具有内在重要意义的部分，而且它又是了解现代中国政治和政策所依据的背景。1950年以后，无论在大陆和台湾，组织结构和思想方面的重要发展变化，几乎没有能与这一世纪的前半个时期分得开的。

诚然，从传记入手研究历史，不过是把历史从过去到现在这一过程加以回溯的许多方法之一。有人认为，研究历史着重点应该放在组织结构的阐述和分析方面，如政治组织、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等。诚然，即使在中国最动乱的军阀时期，如果不依靠某种政治军事机构，就不能取得政权、巩固政权、行使政权。同样，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对历史亦起着决定性影响。凡是关心中国问题的人，没有谁会否认组织结构的重要性，或者否认由此滋生的相互有关问题。同时，凡是在中国经历过1949年以前这一时期的人，也不会否认中国政治生活的基本状态常常交织贯穿着个人的影响和相互关系。由此可见，中国生活的基本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成就不同的人物通过错综复杂的个人关系而形成的。中国人自称为“三同”，这是个人关系格局的引喻，即“同乡”、“同学”、“同行”。民国时期，由于缺乏全国性有效的政治法制，又由于这时期的社会变动，因此，个人关系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历史的主体是人本身。政治、经济、社会变化的影响是重要的，可是，它们最终是与人们的生活相关联的。本书编者希望这部著作能通过民国时期中国名人的生活来说明这一时期的事件、组织结构和变化过程。

随意选择民国名人进行传记的研究，会造成对当代中国历史明显的不连贯的印象。明确了研究对象的特点和有了一定的资料，就首先需要为《民国名人传记辞典》制定一个研究规划。从一定意义上说，这部著作可以看作是《清代名人传略》的补编。由于在时期上有些交叠，因此在这部著作中常常提到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因为，有一些自1911—1912年清朝覆亡后仍然在世的人物的材料散见于该书中。《民国名人传记辞典》所选录的人物，几乎全是出生在清代最后几十年中，其中有些人在1911年以前已经知名。对那些在1949年以后去世的或现在仍然在世的人物，他们在1949年以后的经历，凡能了解到的，我们也都收集了。本世纪中叶以来成名的中国人，不管是在大陆、台湾或其他地方，本书尚未收录。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与其他重要的人名辞典所不同的，它所收录的人物既有去世的，又有在世的，人物事迹又都是最近期的。这部著作是现代的文献资料。为了充实一些模糊的和不完美的文字材料，当事人或知情人所提供的口述材料也常加以采用。这部著作是为了收集和保存中国在二十世纪时期的情况，以免很多材料、特别是口述材料散失。

本书涉及到一个现代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这个国家近代历史上最为动荡不安的时期，因此，编者必须对选定人物名录确定一项准则。开始时分为三大类：内政、对外关系、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在内政类中，又分成几项：北洋军阀（1912—1928年）、国民党（及其前身）、中国共产党、1928年后的国民政府、省及各地的地方军阀、1931年—1945年间的日伪政府、各小政党、边疆（东北、内蒙、新疆、西藏）。对外关系类中，主要有职业外交家和海外华侨。社会和经济类中涉及的范围有伸缩性，主要是：实业与银行、文学、艺术、新闻与出版、教育、学术、宗教、航空、医药。妇女则另立一项，只是为了保存材料，并无它意。书法家、道士、集邮家、孔子后裔、图书学家、地志学家及其他，均分别单独处理。

采用这种普遍分类办法，有助于对民国时期的知名人士初步加以分类区别。在某些类别中是一些有权势的集团，当选择对象时，主要挑选那些集团中的高级人士，如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首脑，国民政府的内阁部长，省长，主要大学的校长，主要报纸的发行人，中国驻欧洲主要国家的大使。对其他阶层，主要是文学、艺术、学术界的人物的挑选难免更为主观。挑选的基本名单是按社会阶层分的，但许多人有多种经历，实在难以分类。初选名单曾正式征询各方面的意见，得益不少，但有时争论也相当大。

最初，在五十年代中期，我们乐观地提出了选录八百人的计划，这个数字是从恒慕义的著作中派生出来的。到1960年，选录人物的数目削减了一半。六十年代初，又增加到目前列选的六百多人。一开始，编者认为，本书不能只是考虑到军政界人物，在民国时期有过特别重要活动和发生过重要变化的其他各界也应包括在内。尽管如此，某些方面还照顾得不够，甚至有的并未列入，例如，医药界选入本书的人物很少，只提到在国外受过训练的西医和公共卫生专

家，没有中医界的代表人物，也没有护士，而护理工作在当时已是日益重要的专业工作了；还没有厨师、高级妓女、算命先生等人物的传记；体育界人士也未包括在内，因为除了来自马来西亚的曾长期赢得国际比赛声誉的中国羽毛球运动员外，民国时期的中国运动界人士未曾获得世界声誉。

进入传记学这座巨厦有很多通道，但是万能的钥匙是没有的。追溯起来，编者认为恒慕义的著作和1933年《哈泼》杂志上最初发表的德·沃脱的论文《持怀疑态度的传记家》是传记学的入门向导。一篇理想的传记是一个人物一生的简史，用下列传统的研究方法确定一个人的经历：搜集原始资料，细致考订鉴定，客观地加以评述。文章不宜象静止的流水帐那样，应该加以概述。但是在实际撰写过程中，经常不易达到这些要求而缺乏感染力。撰写时，还时常发觉文献资料混乱，即非谬误，也常常矛盾百出；此外，辅助材料也很缺少。又由于时代很近，情况复杂，易造成错觉。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所定的最低要求，是在传记中编出每个人物一生的确切年表。年表是传记的支架，传记中所涉及的事实，应努力做到合情合理，应与传记的通篇叙述及其最后结局相呼应。每篇传记的基本体裁是：首先简要说明身份，然后是人物背景、早年生活、经历、著作、家庭等主要章节，对资料的安排运用，应有精确判断。一篇传记能否向读者表达人物的基本特点，这是这篇传记成功与否的实际标准。

撰写传记的准备工作很象儿童的拼图玩具，从几百宗感人的材料中编理出恰当的资料，是写作中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除按社会活动分类确定人物范围外，大量的汇编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全局的考虑和偶然事件的影响。所谓全局考虑，即指妥善处理某界所包括的人物范围。譬如将某人列入某界，为了均衡相称，又需把另一人列入。偶然发生的事情对决定人物的范围也有所影响，譬如在个别情况下发现意想不到的材料，或是偶尔发现一位合适的传记人物，就需增添新的稿件。此外还出现一些情况，如由于材料不足或另有重要人物列入，原定的人物传记就势必要取消了。

在工作进行过程中，有两个棘手的问题经常出现。第一个问题是，一篇传记要同该传记人物所处的历史社会背景紧密联系的问题。谨慎地处理传记人物

的一生与他所处的时代之间的恰当的关系，这一直是传记撰写工作中的一个问题。可是，由于缺乏确切可信的资料，以及由于西方对这个时期的历史不够了解，因此在探索民国时期的历史时，常有把握不定的困难。第二个问题是，其他的人名辞典的编者也存在这一问题，即是掌握传记人物的第一手资料的问题。编者在物色本书的传记撰稿人时，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选择与传记人物有私交的人撰稿，那可能有把传记写成一篇颂词或是一篇有偏见的稿子的危险。另一种办法是挑选一位与传记人物的关系并不亲密或是与传记人物根本不相识的人为撰稿人，这样可以不偏不倚地评价传记人物。究竟选择掌握第一手资料的撰稿人，还是选能客观评价的人撰稿，这是一个经常遇到的问题。从大家议论的情况看，一般都认为选掌握第一手资料的撰稿人要比一个只是依靠中文文献资料（这些资料即使并非故意欺人，也常因其不真实而贻误资料的使用）的撰稿人为好。

由于在这一时期内，中国的私人关系很复杂，所以决定各篇传记的撰写人都不加署名。其理由有三：一是可以自由地处理稿件；二是为了出书，许多稿件需要进行翻译和认真审订；三是本书作为一部参考资料应做到尽量客观。许多撰稿的中国人本人也不愿具名，因为其中有些人提供了本人的情况和经历。此外为了文稿（许多稿件是用中文写的）统一起见，需要用极大的功夫进行加工。可以说，在这部书中，几乎没有一篇文稿是同当初送给编者时的原稿一样的，大部份稿件至少经过一次修改、编订和重写。为了使传记尽可能做到客观，作一些增订性的重写是必要的。因此编者对本书的质量负有全责。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是为用英语的知识界的读者筹编而在美国出版的。全书尽可能保持中国本身的风格，但那总是经过西方人理解的棱镜表达出来的。由于缺少关于这一时期的标准参考书，因此在涉及政治、军事和组织机构的术语时引起了许多麻烦，例如借用西方的军事术语来说明中国军队的编制，如果把这些术语加以确切对比，则往往会引起误解。有关这些问题，在本书说明中有所解释。几篇文字较长的传记——特别是蒋介石、毛泽东、孙逸仙、袁世凯四人的传记——为了读者的方便，加了副标题。我们还打破了惯例，另写了一篇宋氏家族传，不少人认为宋氏家族是民国时期最有影响的家族。

本书各卷均附有简明书目，全书最后一卷附有各篇传记所使用的全部参考书目。

本书的筹划和出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回顾整个过程，大约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1955年到1963年间，在纽约的编撰人员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协助，进行初步的研究工作；1963年到1964年间，资历较深的少数编撰人员完成了研究工作并补充应列入本书而未被列入的人物；1964年以后进行校订、重写，统一编订，为准备出版定稿。

鉴于中国民国时期的复杂性，原来打算在全书校订完毕后再行出版。但是，由于实际的需要，决定在其他几卷的传记尚未完成最后校订之前，将已经准备好的第一卷的传记出版问世。而且，使这些资料早日为广大读者使用，这显然是重要的。因此终于否定了延期出版的意见。

任何一部象这样篇幅巨大而又复杂的著作总是会有错误，希望读者提出各种建议、修正、批评和补充，编者将对此表示感谢。来信请寄纽约州10027，纽约市，百老汇2960号，哥伦比亚大学出版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编辑部。

包华德

1966年8月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编印凡例

一、编印《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目的仅在于组织协作，征求意见，反映工作进展情况。

二、《丛稿》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负责编辑。

三、《丛稿》专登有关中华民国史资料一类的稿件，供内部参考，不对外。每辑字数不定。

四、所有中华民国史初稿及其所附资料，一般都先在《丛稿》登载，广泛征求意见，然后改为定稿。但《丛稿》登载过的稿件，将来《中华民国史》一书及其所附资料不一定全都编进去。

五、欢迎投稿，但只限于中华民国史及有关资料。

六、欢迎对《丛稿》提出批评意见。

七、《丛稿》不对外展览借阅，所登文稿，不要转载和引用。

目 录

译者说明	(I)
序 言	(II)
白云梯	(1)
詹大悲	(5)
詹天佑	(8)
张 继	(13)
张季鸾	(18)
张其铨	(22)
张其昀	(24)
张嘉璈	(26)
张嘉森	(30)
张 謇	(36)
张之江	(41)
张治中	(44)
张 群	(50)
张恩溥	(56)

张尔田	(58)
张发奎	(60)
张学良	(66)
张 勋	(74)
张一麀	(78)
张人傑	(80)
张 澜	(84)
张厉生	(86)
张默君	(88)
张弼士	(91)
章炳麟	(93)
张伯苓	(100)
章士钊	(105)
张大千	(110)
附 录：中华民国史研究工作简介	(113)

白云梯 字：巨川

白云梯（1894.2.17—），蒙族领袖，蒙名布延泰，国民党官员，他以在内蒙古推行国民党的民族政策著名。

白云梯系昭乌达盟中科尔沁旗（Kharchin）人，生于1894年，白宇坤（蒙名忽苏泰Husutai）的二儿子，白宇坤是察哈尔部族王公的后裔。在清朝末年，居住在察哈尔的蒙族由于离北京很近，因此受到汉族文化的很大影响。察哈尔的草原被汉族移民占有的情况日益增多，白云梯出生时，正是昭乌达盟发生蒙汉两族激烈冲突的第三年，这次冲突是由于汉族占有蒙族自认为是他们世代所有的土地而引起的。不久以后，发生了1900年的义和团起义，白云梯的童年受到这些年动荡不安的影响。

科尔沁旗右翼的王子贡桑诺尔布曾提出过各种革新，使蒙古青年的思想受到影响。在1911年中国革命发生后，白云梯去北京上学。在私立学校学习一年后于1912年入蒙藏学院一年级。这所学院是由贡桑诺尔布新创办的。默斯（郭道甫）、傅明泰等也在那时入该学院学习。默斯和傅明泰后来与白云梯成为至交。

1918年春，白云梯离开北京去上海投奔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他在上海加入了孙的运动。同年8月他到广州进孙中山召开的非常国会。他的两位朋友，默斯和傅明泰去乌兰巴托加入了由苏俄在1921年扶植起来的蒙古人民革命党。

1920年8月，孙中山任白云梯为热河、察哈尔和绥远三省蒙族地区党务特别代表。同年9月，孙中山又派白云梯陪同李烈钧去云南与唐继尧商讨合作问题。在二十年代初期，白云梯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孙中山和国民党处理蒙古方面的事务。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孙中山提名，白云梯当选为改组后的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同年10月他又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一直连任至1945年的第六次代表大会，这是国民党在大陆举行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

1924年1月，蒙古人民革命党派丹增南下与孙中山会晤。孙派白云梯和吴威廉会见外蒙古代表。孙中山表示承诺蒙古自治，同时，为了扩大国民党的影

响，他授权白云梯建立蒙古国民党组织。丹增对此表示支持。那次也提到了关于外蒙古与内蒙古未来的统一以及蒙古国民党和蒙古人民革命党今后的联合问题。白云梯曾北上与当时已从北京蒙藏事务院总裁职位退休的贡桑诺尔布商榷。这位白云梯的前辈主张保护蒙族权利，并未直接支持建立一个蒙古政党的计划，但他表示相信今后的发展就得依靠白云梯这一代蒙古青年人了。1924年11月，冯玉祥把孙中山的敌手曹錕、吴佩孚赶下了台，冯向白云梯表示愿对白的事业给以支持并提供便利条件。白云梯以北京为基地，在那里继续筹建蒙古国民党。

经过白云梯等几个月的准备工作，国民党终于在1925年3月1日在张家口召开了第一次内蒙古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共125名代表。当时孙中山在北京病重，派了徐谦和李烈钧为国民党代表出席了大会。冯玉祥亦是参加大会的贵宾。同时，1924年7月北边的外蒙古宣布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那个新国家派了五名代表出席了张家口大会。内蒙古代表大会决定了蒙古国民党的政纲，要为争取蒙古人民的自由、独立、生存和发展而奋斗。封建制度将被废除，代之以民主代表政府，致力于人民的和平生活和繁荣事业。此外，应与中国国民党协作共同建立中国联邦共和国，以三民主义为宗旨，主张世界人民平等，打倒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政纲的第三点明确表示与中国国民党联合。

新党称为内蒙古国民党——蒙文即 Totugadu Mongol—in Arad—in Hubisgattu Nam. 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十一人，其中包括白云梯，默斯，傅明泰和赛音巴雅尔。白云梯当选为主席，默斯为秘书长。委员会很多成员后来都在国民党和政府中任职。

白云梯还办了一份蒙文报，即蒙古人民日报，蒙文为 Mongol—in Arad—in Nam. 他组成一支内蒙革命军，自任司令员。蒙古军事干部学校，主要训练骑兵部队，曾培养了九百多人。第一班设在海西顿（译音），第二班在包头，第三班在宁夏。这所军校的经历反映了内蒙国民党政治生涯的变迁。在白云梯领导之下，国民党派了二百多名蒙族青年到乌兰巴托和莫斯科学习。其中有乌兰夫，他在政治上起的作用和白云梯完全不同。在乌兰巴托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虽有苏联人在那里，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蒙古民族主

义的影响。1924年11月，白云梯访问了乌兰巴托，企图以该地区为基地开展内蒙国民党活动。

但是，另一个对立的蒙族政治势力形成了。它是由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领导的青年蒙古党。1925年10月在张家口又出现了另一组织即内蒙人民革命党，它是完全仿效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建立起来的。两支蒙古民族主义的力量发展着。1926年春，冯玉祥的势力从张家口被排斥以后，内蒙国民党放弃了在西内蒙东部地区的活动，把黄河河套以南鄂尔多斯的伊克昭盟地区作为基地。

1927年3月在武汉举行了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会，会上通过了支持内蒙国民党的决定。但是过后不久，国民党左翼、右翼发生分裂，该党的内部组织机构以及它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关系均受影响。1927年10月蒙古国民党在乌兰巴托召开特别会议考虑今后的政策问题。当时，白云梯派往莫斯科学习的不少蒙族青年已回到乌兰巴托，他们参加了大会。幸而白云梯得到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秘密通知，知道这些学生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图谋在这次大会上将白云梯及其他亲华分子驱逐出去。白云梯在夜间乘车南逃。1927年11月他抵达南京，在会见蒋介石时报告了此事。后来决定将内蒙国民党与国民党合并，在国民党内成立一个专门处理蒙族事务的部门。内蒙国民党就不再存在了。

此后白云梯就居住在南京。1928年春，冯玉祥将白云梯在宁夏的全部蒙族军队解除武装。白云梯虽多次向冯抗议，但毫无结果。白云梯的内蒙古运动从此瓦解。他以前的合作者，默斯和傅明泰仍然倾向蒙古人民共和国，希望能从那里得到支持在内蒙重建政治势力。

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后，白云梯在政府中名义上任参事要职。他还被任命为蒙藏事务委员会筹备处主任，以此代替北京的蒙藏事务院。1928年6月北伐胜利后，他又负责重组北京办事处。

虽然白云梯费了不少精力，但不久蒙汉关系趋于紧张。1928年8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了将蒙古的特区热河、察哈尔、绥远改为省级机构的建议。白是政委会成员，他因病未出席会议，但此建议被一致通过，使内蒙古

的蒙族人十分气愤。他们认为此举是把他们置于汉人严格控制之下的一项措施。他们对白云梯不出席这次关键性会议表示不满。有人怀疑他是否真病，有人认为他出席了会议而没有反对该项建议。内蒙所有的蒙族盟和旗都表示不满，要求蒙族自治的呼声更为强烈。在北京的蒙族人对接管北京的蒙藏办事处表示忿懣。1928年10月1日吴鹤龄率领的蒙族代表团访问南京，要求实现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允诺的，给予中国少数民族自决自治权利。虽然白云梯未公开反对此举，但他亦未明确给以支持。结果，亲汉的蒙族保守派与内蒙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之间的对抗加剧，这些派别无法重新统一。白云梯在中国国民政府中蒙族领导人的地位最终也发生动摇，当1928年底，蒙藏事务委员会正式成立时，他未能当上委员长，只当了一名委员。1929年1月，山西省老省长阎锡山担任新机构的委员长，白云梯被任命为宁夏省政府委员，宁夏是中国西北很多蒙族人的故乡。

1929年3月汪精卫从上海发表声明反对在南京的蒋介石的领导，当时白还在南京。在电报上签名反蒋的共十二人，白云梯也是其中之一，他对此并不否认并很快离开南京去广州，参加了汪精卫的改组派。1930年夏，以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为首在北平成立反对派政权，白云梯也北上参加了这一反对蒋介石的活动。1930年9月北方联合政府瓦解，白云梯又回到广州。1931年12月蒋介石暂时引退，汪精卫重新在国民政府掌权，白云梯又来到南京并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入中央执委会。1932年1月他担任蒙藏事务委员会常务委员。

1933年，德王在绥远省百灵庙发动了内蒙自治运动。由于这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制止日本进入内蒙的意图，因此引起国民政府不寻常的注意。这次运动还预示要比以前历次蒙族运动发挥更大的力量。1934年2月28日，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蒙古自治法案，此法案为内蒙的蒙族人民所接受。德王任新成立的蒙族地方自治委员会主席，白云梯任委员。以后情况的发展使蒙族人怀疑南京国民政府是否有诚意给他们以自治，德王的运动经历了很多曲折变迁。此外，日本对华北及内蒙的压力继续加强。1935年下半年，德王抗日的态势软弱无力，白云梯去百灵庙见他，看到了蒙族的抗日力量太弱，无法阻止日本人

侵，白云梯回南京报告了这一情况。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白云梯随国民党政府到了汉口，又到了重庆。抗日战争期间，他出席国防最高委员会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日本投降后，他曾担任内蒙慰问团团长，慰问曾遭日本人统治的蒙族人民，可是，他在途中到达北京后，发觉不可能前去内蒙，因为那里有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中国一场新的夺权斗争正在形成。

1946年2月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委会二次全会上，白云梯、白海风、李原沂三个蒙族委员建议在绥远百灵庙恢复蒙古地方自治政治委员会，并建议把蒙族旗、盟政府所在地的界限与中国省县行政区域划分清楚。这个建议在会上通过了，如果真能实现，那必将对内蒙的忠于蒙族事业的人有利。可惜当时熊式辉和傅作义分别在东北和绥远掌权，他们不执行这个决定。

1946年11月，国民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白云梯是蒙族代表团成员，代表团建议新宪法应明确制定蒙族人民自治的条款。在新宪法中蒙族自治权在名义上得到了承认，宪法条款阐明，蒙族的旗、盟地方自治政府制应为法律所规定。1947年春，蒙藏事务委员会由许世英任委员长，白云梯任副委员长。当年12月许世英辞职，白云梯即任委员长。当时，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正在兴起。1948年国民党遭到灾难性的损失，丢了东北。1949年中，失去首都南京。在大陆最后混乱期间，白云梯在1949年8月辞去蒙藏事务委员会委员长职务，随同蒋介石渡过台湾海峡去台湾岛。白云梯在台湾只是主持蒙族团体举办的一些官方活动，其中有名的是1962年庆祝成吉思汗诞辰八百周年的活动。白云梯在台湾继续担任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挂名的高级职务。

詹大悲 字：质存

詹大悲（1888—1927），湖北省著名的反满革命家，孙逸仙的忠实支持者，袁世凯的死敌，国民党官吏。1927年，他曾和武汉国民党左派合作，后被

当作共产党人处决。

詹大悲，湖北蕲春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幼年时就强于记忆，具有文学才华。成年时，清朝考试制度已废除，他在接受了中国古代经典的基本教育以后，投考黄州中学。这是一所有名的学校，当他投考时，鄂东一带有将近二万人应试，詹大悲虽然年龄最小，却以第一名被录取。他的优良成绩给学校校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后来由于他年少气盛，和学校监督作对而被开除。

辛亥革命前夕，湖北是反满活动的中心之一，詹大悲由他同学宛思演介绍参加了革命活动，加入了同盟会。新军在武汉地区的部队是当时宣传革命的主要对象，詹大悲就在宛思演在汉口创办的反满报纸《商务报》任主编，不久即与湖北新军第四十一标军官的秘密组织取得联系，力图使其下级军官投向革命。但这一活动为清廷侦知，《商务报》因此被封。

詹大悲此后加入了湖南激进分子蒋翊武（死于1913年，二十九岁）组织的文学社，另创新报《大江报》。文学社从1911年前的振武学社改组而来，很快发展成为湖北主要的反满革命组织之一。当年夏天，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引起邻省四川普遍的强烈反对。詹大悲极力反对，携抗议书去见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詹认为铁路可以收归国家所有，但不能为清廷所有，据说这个论点影响了汤化龙，因此使湖北咨议局大力支持四川的立场。詹大悲还写了一篇有力的文章《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载于《大江报》。另一个反满革命者何海鸣接着发表了题为《亡中国者和平也》的文章。湖广总督瑞澂对此大为愤怒，把詹大悲投入狱中，又追捕何海鸣。詹大悲声称，他对《大江报》负完全责任，处罚仅能及于他一人。但当局未加许诺，何海鸣却自行投案。武汉报界发起声援，要求释放他们。瑞澂在盛怒之下，判处他们十八个月的徒刑，其结果却使詹大悲顷刻之间闻名全国。

1911年10月10日爆发武昌起义，革命派同时占领汉阳、汉口，总督瑞澂逃走。詹大悲被释出狱后，统率革命军司令部汉口分部。当时在武昌的革命军总部由黎元洪统率，他并非党人。汉口守军统领张景良和清军勾结，詹大悲不征求黎元洪的同意，处决张景良，此举大受革命党人的赞赏。汉口仍有受清军反击的危险，詹大悲去九江要求江西革命军援助。援军未能及时赶到，汉口

失陷。詹大悲于是去山东联合革命军山东都督胡瑛，当时胡瑛正准备从烟台誓师北伐。但是和议已成，不久共和国正式成立。

1913年春，国民党准备选詹大悲为湖北省参议会的议长，所以先选他为议员。但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案引起了新的政治危机，詹乃集结同志组织讨袁势力。计划泄露，其中一人被处死。1913年7月，国民党首领发动了所谓二次革命，詹去九江投奔江西都督李烈钧。不久，李烈钧失败，革命党人逃逸，大部分人到了日本。

1914年孙逸仙在东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詹立即加入了这个新党。詹和其他一些党人被派往上海策反该地军队，但策反计划泄露，冯国璋设置圈套捕捉策反首领，詹大悲巧计逃走，重返日本。后来，1915年反对袁世凯的运动兴起，詹大悲离开日本，拟返回老家湖北集结反袁势力，但当抵达上海时他就被捕，囚禁在公共租界。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詹获释出狱，受到民众热烈欢迎。

当时，国会在北京复会，各省参议会也同时恢复。詹大悲按照革命党人的计划竞选为湖北参议会议长，但湖北的北洋军督军王占元加以阻挠，不让詹就职。不久，张勋和其他一些北洋军阀迫黎元洪去位，国会停顿。1917年，孙逸仙得到海军支持，在广州组织革命政府，宣布护法。詹大悲由孙逸仙派去四川，争取那里的军人对南方政府的支持。

1920年詹去广州，在孙逸仙的大本营中担任宣传工作。1921年5月，孙逸仙就任大总统，又派詹大悲去四川争取军人的支持。1922年詹大悲从华西回广州时，正遇到陈炯明叛乱，詹随同孙逸仙避登“永丰”舰，这是孙蒙难时的临时指挥所。

1924年1月，詹大悲为国民党改组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25年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詹大悲任参事职。1926年1月，在汪精卫这一派控制下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詹大悲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26年秋，北伐军占领武汉，詹大悲回到老家湖北，为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委员。在此期间，他同时兼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在任内着手成立水利局，筹款修建水闸，这些措施得到公众的拥护。

1927年初，詹大悲担任湖北省政府财政委员。当时的武汉处于国民党左翼和与国民党联合的共产党人控制之下。詹大悲向来对个人交往不甚注意，他因为和武汉的共产党人接触而被视为共产党人。1927年春，上海开始清除共产党人，接着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当即下令逮捕著名共产党人，詹大悲亦被列名其中。

1927年底，国民政府对支持武汉对抗南京的唐生智进行讨伐，率领讨唐军的胡宗铎部队的一个指挥官逮捕了詹大悲。在那时谨慎从事是不可能的，因此以共产党人的罪名将詹大悲立即处决。詹大悲以前的同志们得悉这场悲剧，想要救他已为时太晚了。

詹大悲身后遗有寡妻，子詹世华，女詹志芳。

詹天佑 字：眷诚 西名：天佑·杰姆

詹天佑（1861.4.26—1919.4.24），铁路建筑的开创人。曾在美国接受教育，以天佑·杰姆为名。他是京张铁路局的总工程师和总办，很早就知名了。后来充任粤汉川路总办。

詹天佑是广东南海县人。他在广州出生时正当太平天国席卷长江流域的时期。他祖父母原籍安徽，因经营茶叶出口贸易而徙居广东。詹天佑是全家四个孩子中的长子，早年在广州受旧式的私塾教育。

1871年詹天佑接受教育的方式有所改变。当时清政府采用了容闳提出的派一批中国幼童去美国留学的建议。容闳是第一个在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人。当他在耶鲁大学读书时，就多方思考中国的问题，并希望对祖国的现代化和改革有所贡献。他深信中国的希望将是迅速采用西方的科学和进步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应加以彻底改革。他认为最好的方法是不断派遣经严格选择的中国青年去美国求学，而并不在于雇请外国专家，购置外国器械。他把这个计划递呈清帝，1871年获得批准，决定四年内每年派遣年龄在十岁到十五岁之间的幼童三

十名去美国学校上学，接受十年到十五年完全是西式的训练。

詹天佑那时才十一岁，是第一批去美国的三十名幼童中的一人。他于1872年夏由上海启碇去美国。詹天佑被安排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他由美国人的家属照顾进入滨海儿童学校，准备投考纽黑文市的山屋中学。他第一批通过大学入学考试，1878年进入耶鲁大学谢菲尔理学院学习。由于他具有科学和数学才能，所以选习土木工程。1881年，詹天佑二十岁时在耶鲁大学毕业，获得土木工程学士学位。

北京接到了不利于这些学生的报告，说他们忽视汉语学习而完全美国化了，因此驻美国的教育代表团于1881年夏奉命撤消，留学生也奉令回国。仅有詹天佑和另一人侥幸地学完了大学课程，而其他六十人尚在大学学习期间，甚至还有一些尚在中学学习。

詹天佑回到上海，正好国内筹建第一条标准铁路。这是开平矿业公司为了运煤而修筑的自唐山到胥各庄长仅数英里的铁路，由公司的英国工程师C·W·肯特主持。这条铁路太短，不足以显示詹天佑这样青年中国工程师的才华，所以他和几个留美学生被派到福州海军兵工厂，学习航海。后来他又被派到一只中国海军的驱逐舰上进一步训练，准备当海军军官。

1884年中法因印度支那问题发生了冲突，一支法国海军舰队驶往福州，轰击福州兵工厂和海军学堂，詹天佑正在一艘中国海军舰艇值勤，他奋勇开火还击。詹的舰艇被击毁，詹跃入海中救回了不少同伴。几个月后，广州的张之洞请他南下，对广东沿海作一次全面测量，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测量。

1886年测量完毕后，詹天佑应广州陆海军学堂聘请当教官。后来前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请他去天津经营铁路事业。当时开平铁路公司已脱离矿业公司而改组为天津铁路公司，而且把铁路延伸到塘沽和天津。这正是詹天佑等待已久的机会，可以充分发挥他在耶鲁大学学到的知识并献身于铁路工程事业。伍廷芳当时是天津铁路公司的总办。

詹天佑于1888年在天津开始从事铁路事业。从此以后，他以极大的献身精神不断在各城市从事铁路建设达三十一年之久。最初，因他是一名实习工程师，充当天津铁路公司现场工程师的助手。修筑这条铁路的经费是英国的借

款，因此总工程师和其他主要工程师都是英国人。这条铁路的修建计划是一边由天津到沈阳，一边由天津到北京，即是以后所称的北宁路。在修建这条主要干线的时候，詹天佑奔走于长城内外，他克尽职责，被提升为现场工程师而后又被提升为地区工程师。他负责的重要工程中有滦河桥梁的修建，其中包括五根长二百呎的钢梁，十根长一百呎的平樑，两根长三十呎的樑。他为这项工程在中国第一次采用了气压沉箱法，在水中筑桥墩。

在修筑这条铁路的十二年中，1900年他又被请去修建湖南萍乡、醴陵的铁路。1902年他又负责修建西陵铁路，这条铁路是为慈禧、光绪及满族皇室到河北易县谒陵而修建的。这条京汉路支线的西陵铁路，长四十二公里，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用了四个月工夫就建成了。因此，詹天佑为清政府所重视，受到在天津经办铁路掌握实权的总督袁世凯的赏识。

1900年义和团运动之后，华北渐渐恢复到正常状态，北宁路业务发达，除偿还借款外尚有积余，袁世凯准备用以修建京张路，准备把铁路最后修到绥远等地，以便开发西北。最初打算由当时北宁路的总工程师肯特担任拟建铁路的总工程师。这种想法似乎合乎逻辑，因为拟建铁路的经费是来自用英国借款所建铁路的营业盈余，而且肯特是被公认为卓有才能的。但是，俄国驻北京公使却在1905年对此任命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声称英俄间曾有过谅解，即在长城外向蒙古方向修筑任何铁路就涉及所谓俄国势力范围，必须由俄国投资，并聘用俄国工程师。俄国公使又说，如用中国的经费和人才，俄方当不加干涉。袁世凯马上接受了俄国的要求，任命詹天佑为总工程师，这是第一个中国人负全责修建这样工程艰巨的铁路。这一任命颇引起许多西方工程师的惊奇，他们怀疑中国是否有称职的工程师能胜任这样重大的工程。

在修建京张铁路的过程中，詹天佑在担任工程师和行政官员的职务中显出他突出的才能。他以身作则，鼓舞他的部下，并提醒他们：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他们，此路修建的成败直接影响中国的利害。因此各级人员齐心协力，因为他们充分认识到他们从事的工作的重要意义。

京张路最艰巨的工段是从南口关开始的那一段，二十公里内升高五百七十米，需要采用高坡度和长隧道的办法。在多山地段开了四条隧道，最长的是靠

近长城的那条，长达一千另九十一米。这条长隧道若从两端挖掘，进度很慢，詹天佑采用了从山上选择能垂直达到隧道中心线的两点开凿两个竖井，使隧道挖掘工程形成了六个掘井作业面，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由于工作周密细致，中心线和坡度都无差错。当时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不多，又无现代化设备，这一成就更显得非凡。詹天佑不得不采用自己创造的土办法，还得亲自训练工程技术人员。为了保证安全，在弯度大的地段普遍采用了防护路轨。由于坡度大，一种特殊的挂勾机车在中国铁路上第一次使用。在南口到康庄坡度极陡的地段，采用了在火车后部加一机车以增加推力的办法。

詹天佑曾估计，修建这条二百公里长的铁路需银七百二十九万两，需时四年。实际上，此路修建始于1905年8月而于1909年7月完工通车，共化了银六百九十三万两。工程技术人员直接和承包商打交道，这也有助于这一工作的完成。这样，购买器材就不需支付佣金，而所有其他借外债修筑铁路总是要付给外国经纪人佣金的。1909年8月举行通车仪式时，詹天佑受到热烈欢迎，成了一位全国闻名的英雄人物。为表彰他的功绩，清政府授以进士衔。詹天佑又当了交通部的顾问工程师。1910年主持文官考审，甄别由国外回国的七百多名留学生。

京张铁路通车后，四川地方官吏向北京要求请詹天佑去四川主持川汉铁路工程。由于京张铁路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袁世凯批准他应聘（短期的）前去。1909年詹去宜昌，任私营四川铁路公司总工程师。

1910年他在宜昌动手建造川汉路工程时，得到通知要他去主持私营的粤汉路南段的建筑工程。于是在宜昌铁路工程开工后，他就去广州承担这项外加的工程。这几年中，詹天佑来往于北京、宜昌、广州之间。

1911年反满起义爆发时，詹天佑正在广州专心一致地从事粤汉路的修建。清室退位后，粤汉川铁路系统由英、法、德、美四国财团资助兴办。中国政府则派出总办，监督工作，并与借款国代表和他们所推荐的各段的总工程师取得联系。詹天佑从1912年起担任了总办这个铁路方面的最高职位，办公处设在汉口，一直到他去世。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因为经费短缺，这条干线工程大为延缓。

詹天佑只得用英国借款修建了从武昌到长沙这一段365公里的铁路，1918年通车。德国借款的那一段164公里路基虽已全部完成，但铺设路轨的工程才开始了一小段就停了下来。美、法借款的那一段根本没有动工。

当粤汉铁路停建时，詹天佑受命任美国工程师约翰·夫·斯汀文主持的协约国技术局中国代表，参与有关协约国军队进占西伯利亚铁路和中东铁路事宜。詹天佑一生不知病痛，这次忽得痼疾，长期艰巨的工作使他难以支持，他只得离职回到汉口，立即进仁济医院治疗，1919年4月24日去世，年五十九岁。

詹天佑从来就自认为是一个职业工程师，从不过问政治。他是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创始人之一。1912年被选为第一任主席，他的目的是：使学会具有足够的业务水平，而其成员能胜任政府的任何技术岗位。他为学会在北京的会址修建积极筹款，他到北京时，宁愿住在工程学会里，而不愿居住在豪华的旅馆内。1894年，詹天佑被选为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会员，他是获得这项荣誉的第一个中国人。1909年又被选为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会员，1916年香港大学授予詹名誉博士学位。

詹天佑是一个深思熟虑、寡于言谈的人。在铁路工程界他一贯显示了正确的判断力。他对于他的同事和部属，尤其是和他早期共同奋斗过的人，具有一种引起他们深厚爱慕的力量。他那一辈的工程界把他当作经常可以得到他的指导和帮助的权威人士。在他主持过的每条铁路上，他为中国工程师的待遇规定了恰当的标准，他认为他们的工作应该取得欧洲同级工程师的同等待遇。他始终是青年工程师的一个鼓舞力量和永不衰竭的源泉。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他在广州和人数日增的广东技工有密切来往，对他们的才能和创见怀以极大的敬意。后来，他在中国三十年铁路修建工作中，每有新的工程，他总是经常依靠来自广州的熟练技工。

詹天佑为人纯朴，极其谦逊，从不忌妒职位比他高的人。他早年在美国读书时喜爱棒球。1881年回国经过加利福尼亚时，他和其他回国留学生同加利福尼亚代表队奥克兰队作了一场表演赛，中国队的熟练球艺博得美国人的赞赏。詹天佑又是一个网球爱好者。

詹天佑遗有寡妻，子五人，女二人。两个儿子均曾留学美国。他的第二个儿子，和詹天佑一样，毕业于耶鲁大学，中日战争时任粤汉路副总工程师，因积劳成疾，于1941年去世。他的长婿杰克·翁，也是一个知名的铁路工程师，曾任京汉路总工程师多年。

为了表彰詹天佑创建中国铁路的功绩，中国政府在京张路最艰险的地段青龙桥车站附近为他竖立了一座全身铜像。詹天佑的铜像位于长城脚下，目光注视着祖先的这一最伟大的工程。京张铁路是詹天佑一生中最大的工程成就。

张 继 字：溥泉

张继（1882，8，31—1947，12，15），政治人物，反满革命家，《民报》编辑，国民党元老，国民党内得势的少数几个北方人之一，右翼西山会议派的头面人物。

张继，直隶沧县人，出身世家，幼年在家里习读儒家典籍。1897年，他父亲张逸南（译音）（字华成）（译音）任保定莲池书院教席，张继随父亲在那里读书。莲池书院在吴汝纶（字挚甫）任斋长时，是华北一个重要的教学中心。张继在保定时结识一个日籍学生，他建议张继去日本深造。

此后几年，张继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以大部分时间学习政治经济，他广为阅览，又积极投身于反满政治活动。张继魁梧健壮而又有才智，他很快成为在东京的中国学生中的领袖人物。他改名为“继”，意思是“延续”、“继承”，以表示他决心献身于在清朝整个统治年代中无数汉族志士为推翻满清而斗争的事业。

1900年义和团起义时，张继和一些留日中国学生组织“青年会”，从事推翻满清统治的活动。此后，他在政治上另有交往。1902年，张继年二十岁时，被介绍先后认识了孙逸仙、章炳麟。同年，他与邹容交往密切，并参与由邹容率领的一群人潜入清廷派去日本监督中国士官生的姚文甫寓中，由邹容割去姚

的辫子。事后，邹容、张继因已不能在日本存身，乃去上海。

张继在上海和章炳麟来往，又认识了著名的报纸《苏报》的编辑章士钊，他们三人，加上邹容，结拜为兄弟。章炳麟、张继两人经常给《苏报》写文章，《苏报》在当时被认为是反满最激进的报刊。1903年夏初，《苏报》被封，章炳麟、邹容被捕入狱。同年下半年，张继和章士钊等人在上海英国领事当局登记筹出一份新报——上海《国民日报》，以续停刊了的《苏报》。

1904年下半年，张继去长沙明德学校当教师，该校是黄兴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个据点。张继并非1903年12月黄兴组织的华兴会会员，但仍与黄兴常相来往。1904年11月策划的一次反满行动失败，黄兴避入长沙英国圣公会的一个基督教牧师家中。黄兴乘着轿子从明德学校去牧师家里的途中，张继身带手枪扮作仆从保护黄兴。张继随即逃到上海，又参加了新成立的革命团体光复会，蔡元培任会长。

1905年张继又到日本去，这一年同盟会成立，他是同盟会创始时的第一批会员，被举为同盟会司法部判事，并任该会直隶支部负责人。但是给予他的主要荣誉职称是让他担任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首任发行人兼编辑，《民报》是1905年11月在东京开始出版的月刊。早期的《民报》据说大部份的编辑工作实际上是由胡汉民担任的，但最初五期的出版工作是由张继负责的。此五期的最后一期出版于1907年6月。此后即由章炳麟担任出版和编辑的职务。1906年后半年，张继去爪哇，在那里教了几个月书，不久又回到东京。

1907年年初北京政府促请日本政府当局将孙逸仙驱逐出境。日本政府为了缓和国内各派意见，特馈赠孙逸仙五千日元，“劝说”他离日他往。孙逸仙接受了这笔馈赠，自留三千元备用，另二千元交同盟会总部作出版《民报》之用。这件事第一次引起孙逸仙部下的反抗；张继、章炳麟等多人表示反对。章炳麟极为愤怒，竟取下了《民报》办事处墙上的孙逸仙肖像，他和张继甚至提请罢免孙逸仙党内领袖的地位而选黄兴代替。不过，这个提议无人支持，而孙逸仙对此事也未作解释，不了了之。

章炳麟任《民报》主编一直到1907年12月。其后张继编辑过1908年2月25日出版的一期《民报》。该期尚未出版，张继即离开日本，将编辑事务交给陶

成章。1908—1911年，张继在欧洲，先后在巴黎、日内瓦、伦敦从事学术研究，参加自由讲演会，会见艺术家，其中有毕加索。在巴黎，张继与热衷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李石曾、吴稚晖来往。为了实践这种理论，1908年张继曾与一些其他国家的同志们一起在法国北部的一个公社新村度过了一个夏天，他在那里为社员销售村社社员生产的蔬菜。

1911年底，张继得悉武昌起义的消息，立即返回中国。据说，那时张继已加入了1912年江亢虎组织的中国社会党，并被选为该党的一名领导人。虽然如此，当1912年8月同盟会吸收了其他四个党派组成国民党时，张继仍被举为干事之一。孙逸仙虽被选为理事长，但不久即将此职交给宋教仁，委宋为代理理事长。

1913年，张继当选为北京参议院议长，当时袁世凯已开始压制国民党员，结果在这年中引起了革命党人的所谓反袁二次革命。1913年的这次短暂的运动失败后，张继以及其他革命党领袖人物，包括孙逸仙等人不得不逃亡到日本。孙逸仙在东京着手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并于1914年7月正式成立。不少孙逸仙的支持者，例如黄兴、李烈钧、陈炯明都反对改组，强烈反对孙逸仙提出的要党员对他个人宣誓效忠和加盖指印的要求。张继这次又是孙中山这一计划的最坚决的反对者之一，并且拒绝宣誓。分裂幸未持久，1915年反对袁世凯帝制运动展开后，国民党又重归统一。

1914年底，张继离开日本去欧洲，1915年，从英国到美国，他访问了几个有华侨团体的大城市，希望在那里取得华侨团体支持反对袁世凯的运动。1915年底，张继由美国到日本，1916年回中国。当1912年的临时约法重新生效，国会两院重开时，张继重回参议院。

1917年黎元洪总统解散国会，张继等人南下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广州成立了军政府，以孙逸仙为大元帅。但是广州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却在桂系军阀手中，他们名义上支持军政府，实际上是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1918年广州军政府改组，孙逸仙被举为七个总裁之一。孙未就任，于1918年6月离广州去上海。张继和其他支持孙逸仙的议员也离开广州。张继到1920年一直在上海，然后再次去欧洲。1920年夏张继回国，参与国民党党务，孙逸仙任命他主持北方

党务。

陈炯明将桂系军阀逐出广州后，孙逸仙于1920年11月回广州，召回张继等国会议员。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逸仙又逃往上海，张继亦离粤去沪。就在那时，孙逸仙决心对国民党进行大改组。9月，张继率领了一批各省国民党中的代表人物与孙逸仙磋商党务改革。孙逸仙同意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李大钊是第一个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他在上海认识孙逸仙就是张继介绍的。

1922年11月，张继和其他各省国民党代表再次参加孙逸仙召集的会议，商议国民党改组方案，推胡汉民、汪精卫起草改组宣言。当时，张继是国民党宣传部长。1922年12月18日，他和其他各部部长联合提出辞呈。改组宣言随即于1923年1月1日发表。1923年1月21日孙逸仙任命国民党总部各负责人，以叶楚伦为宣传部长，张继及张人杰、居正、谢持、廖仲恺、戴季陶、于右任等为干事。

1923年10月，国民党改组进入一个新阶段，孙逸仙任命了一个临时中央委员会，负责筹备于1924年1月召开第一次会议。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20日在广州召开，张继并非代表，但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共有正式委员五名，候补委员五名。当时国民党除在广州设有中央总部外，在上海、北京、汉口、重庆、哈尔滨各地并设有执行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员隶属中央总部，其他委员分别负责各地执行部。但是由于某种尚未弄清的原因，张继并未被指派参加管辖华北和西北各省的北京执行部而参加了上海执行部。

从国民党首届中央机关的组成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势力的增长。早在1924年6月16日，五名中央监察委员中的三人张继、邓泽如、谢持向中央执委会提出弹劾共产党人案，谴责共产党人在国民党里搞渗透活动。25日，张继、谢持访问苏联顾问鲍罗廷，孙科当翻译，他们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问题谴责俄国代表。1924年7月3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否决了他们的弹劾案。四天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发表声明，号召党员消除误会，重申三民主义为革命成功的唯一道路，希望以此来解除那些保守分子的疑虑。

1925年3月孙逸仙在北京逝世，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张继当选为以汪精卫为首的十六个国务院委员之一。当时，不少国民党老党员反对共产党人。1925年11月，他们在北京西山开会，后来被称为西山会议，参加的人及其支持者被称为西山会议派。二十四名中央执行委员（其中三名是共产党人）中的十人，参加了这次西山会议。张继因系中央监察委员，据说他以观察者身份列席了会议。事实上，张继因头部受伤，未出席那次会议，但他无疑是全力支持这个集会的。谢持亦是中央监察委员，以观察者身份列席会议。1924年联名提出弹劾案的三人之一的邓泽如当时在广州，但据说曾给西山会议以财政资助。

张继因为参加西山会议使他暂时丧失了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机关中的地位。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要对西山会议派采取纪律处分，并警告他们倘不悔改，则将开除出党。这一次张继未被重选入中央监察委员会。1927年9月，国民党内以武汉、南京、上海（西山会议派）为中心的三个派系重新统一，张继是促成三派合流的特别委员会的一名委员。

1928年6月，张继任蒙藏事务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北平临时分会委员，1928年8月继李石曾而为分会主席。10月，张继任国府委员，立法院副院长。11月，张继、李石曾视察北平及冀、鲁、晋各省党务。

1931年，胡汉民在南京被拘，引起广州对南京的分裂，成立了相对抗的国民政府，其支持人有汪精卫、唐绍仪、孙科、伍朝枢等著名人物。1931年9月，日本侵占东北，内战危机因之停息。10月，张继偕蔡元培和陈铭枢由南京去广州议和，11月21日，广州方面的领袖人物如汪精卫、邹鲁、伍朝枢、陈友仁与南京代表一起回到上海。1933年12月初，陈铭枢以十九路军为后援发动福建事变以后，张继率领了一批南京方面的代表访问两广，观察南方领袖人物的动态，防止他们支援福建政权。张继在去广州的往返途中，都曾到香港去探望胡汉民，多方劝说，请他回南京，但未成功。1933年初，国民党在河南新乡设华北党务办事处，张继从广州回来后，即前往就主任职。此后，他经常在北方视察，来往于北平、洛阳、西安之间。

1935年11月，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六次会议在南京召开，正在全

体照像时，有人谋刺行政院长汪精卫，张继和张学良上前抓住刺客，将刺客打倒在地。

中日战争期间，张继致力于保存整理有关国民党历史的文献资料。1937年，张继任中央党史委员会主任，他将重要档案经南昌、长沙安全转移到四川。张继在重庆期间，经常作党史讲演。他又常常率领中央慰问团，去各战场慰问部队。

张继在去世前两年中（1945—47），不断为党务奔走。1947年新宪法颁布，张继任宪政促进会副主席。1947年初，任第一任国史馆馆长。自1940年以来，张继即负责筹建该馆。1947年12月15日，张继死在南京，年六十六岁。他经历了近五十年的政治生涯。他的著作和讲演收集在《张溥泉先生全集》、《张溥泉先生全集补编》，分别于1951年、1952年在台湾出版。

张继身后遗有1912年在天津结婚的妻室崔振华（1886— ），她是1947年制定宪法的国民大会的代表。张继死后，她去台湾，任职于国民政府监察院。张继的两个儿子张湘（译音）（1916—1921）、张恭（译音）（1917—1945），都先于张继去世。张恭曾于1932年留学法国，1937年回国，1945年在成都被谋杀，尸体在荒塚发现。张继还有两个女儿：张莹（1913— ）、张玲（1922— ）。

张季鸾 原名：张炽章

张季鸾（1888，3，20—1941，9，6）著名的《大公报》主笔，是中国新闻界新闻自由的倡导者。

张季鸾出生于山东邹平，原籍陕西榆林。父亲张绍雄（译音）在山东做官时，张季鸾出生。1900年父亲在济南去世，母亲携子回籍安葬，从此留在陕西。

张季鸾幼年体弱口吃，但他有志成为一名学者，因此为地方官吏所器重而加以培植。青年时习读经史典籍，那时他就以文字流利简洁、构思谨严著称。

1904年2月，张季鸾进陕西三原宏道高中，两个月后母亲去世。1905年经陕西省试，获得留学日本的资格。他先在国内补习日文，直到1909年才去日本，进东京第一高等学堂习政治经济学。那时，他开始注意政治活动，加入了同盟会，并协助留日陕籍人士编辑一份反满刊物，这就成了张季鸾后来毕生从事新闻事业的起点。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张季鸾由日本回国，在上海参加《民立报》的工作。《民立报》系于右任创办，报社当时是南京临时政府的支持者章士钊、邵力子、宋教仁、叶楚伦等人经常集会的地点。1912年4月孙逸仙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张季鸾去北京，协助创办北京版《民立报》。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由于《民立报》强烈斥责，张季鸾被捕入狱，监禁三月之久。

张季鸾被释后潜往上海，在上海应留日同学胡霖邀请担任《大共和日报》国际版主编。他经常译载一些日本报刊的时论文章，同时兼任上海吴淞中国公学西洋史教师，盛世才当时是他的一名学生。1915年张季鸾在上海创办《民信日报》，自任主编，几乎每天撰文抨击袁世凯。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张季鸾到北京主持《中华新报》，同时兼任上海《新闻报》记者。在此期间张季鸾常常用化名向报刊投稿，因揭露了安福系和日本的秘密谈判，《中华新报》和北京几家其他报纸同被查封，张季鸾被徐树铮下令逮捕入狱。当时北京毫无新闻自由，其他报界人士的处境也大为不妙。张季鸾被释后回上海。

张季鸾过去十年所主编的报纸，都是经常依赖政治特权或私人补助来维持的，因此他很想创办一份具有独立性的、商业性质的报纸。1924年冬他回北京，参与改组风雨飘摇中的国闻通讯社的筹划工作；在作出改组决定之前，《大公报》在天津出版了。1926年9月，由吴鼎昌投资组成一个新企业，接办《大公报》，由胡霖任总经理，张季鸾任主编。三人决定不让该报受到政治上的影响和控制。

从1926年到1941年，张季鸾全力以赴，力图使《大公报》成为一份反映中国自由舆论的可靠喉舌。他在创刊词中宣称《大公报》“不党”、“不卖”、“不媚”、“不盲”。《大公报》在张季鸾的编辑方针指导下，忠实地坚持报道实际情况和反映公众舆论。《大公报》虽然通常同情国民党，拥护蒋介石为

全国领袖，但对于政府的政策和人物仍时时有所批评。1930年10月，《大公报》根据张季鸾的意图，派遣记者考察河北省的农村生活情况，每天在该报发表报道，直言无讳地揭露了这些地方的种种弊政，这种做法标志着中国新闻界的一个新纪元。

此外，在1931年以后的一个时期中，当全国注意力逐步集中于中日关系的时候，《大公报》派出记者去日本、苏联采访。记者的采访报道附有张季鸾写的评论，这些评论具有远见地指出了日本对中国的意图，并且意识到如果中国重视苏联所推行的发展工业技术的方式，中国将能获得益处。《大公报》报道之所以能切中时弊，还在于张季鸾本人和他的助手王芸生对日本的情况很熟悉。在三十年代期间，《大公报》稳步地获得了全国声誉，经济上亦绰有余裕。1936年9月1日《大公报》重刊十周年，张季鸾在报上发表了纪念文章，回顾《大公报》的成就，并重申它的方针。

华北局势日趋紧张，1936年4月1日，《大公报》增设了上海版。在天津版和上海版的《大公报》上同时发表了张季鸾的声明，指出增设上海版目的在于使《大公报》真正成为全国的独立论坛，并非借此扩展业务，亦非表示撤出华北。当时国内舆论对政局的意见有严重分歧，许多爱国团体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对日抗战主张。张季鸾想要在这个国事艰难的时期保持《大公报》的独立地位，表示他宁愿《大公报》停闭而不愿为感情用事的党派利益所左右。1936年6月1日，张季鸾发表了一篇《中国青年和日本》的激烈社论，他对日本提出警告说：今日的中国男女青年，其刚强意志已远非三十年前所可比拟，为了民族独立和社会的利益，他们准备洒热血抛头颅。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张季鸾在致张学良的一封公开信中斥责他拘捕蒋介石是破坏了中国自1928年以来经历了千辛万苦而得来的统一。信中的用词和表达的情感在中国引起了极大的影响，据说对解决西安事变起了作用。

张季鸾根据他办报的亲身经历，对新闻检查和言论自由一贯坚持强硬的立场。1937年2月他议论说：政府禁止新闻报道权，仅能限于对那些危害国家制度、泄露国防机密、扰乱社会秩序这几个方面的报道加以禁止。他主张实行能够发表的言论必须允许发表的政策，不得任意扣留。

1937年秋，战争爆发，上海、天津两地《大公报》停刊，胡霖把天津《大公报》的设备运往香港，在那里创办香港版的《大公报》，而上海的设备则运往汉口。1937年9月18日《大公报》复刊，10月17日即被迫停刊。在汉口出版的为期甚短的《大公报》1937年12月1日又在重庆出版。抗日战争初期，张季鸾是《大公报》在重庆的主编。他经常来往于重庆、香港之间，和胡霖取得联系。在中国局势动荡不定的时期，张季鸾发表的文章在指明真相、展望前景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他呼吁长期抗战，强烈反对汪精卫之流，称他们的政策是一种“民族灭亡”的政策。

《大公报》经营多年，成为一家拥有很多职工的大企业。张季鸾作为《大公报》的老前辈，他不仅身任主笔之职，而且还担负着繁重的行政工作。他到重庆后虽然继续处理许多有关重庆办报的工作，可是他本来就不健康的身体更坏了，1939年的春季后，他把主笔的工作越来越多地交给他的助手王芸生去办，最后他因肺病退休，由王芸生继任他的职务。

1941年5月15日，美国密苏理大学新闻学院授予《大公报》奖状，表彰张季鸾的功绩。在密苏理大学授奖后没有多久，9月6日，张季鸾在重庆逝世。张季鸾的同事在重庆悼念他的逝世，为他举行公葬，并设立奖学金，以纪念他对现代中国新闻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1944年他的著述《季鸾文存》在重庆出版，1946年在天津刊印新版。

张季鸾具有朴素的生活作风，与报界人士习以为常的散漫性迥然不同。在晚年，他这个高个子显得有点驼背，鼻梁很高而头顶秃了。他是一个俭朴的人，毕生穿的是用粗布缝制的中式长袍。

张季鸾是有声望的陕西人，因此他很关心本省教育的落后状况。民国初年，他从日本回来后曾去陕西，建议陕西省政府专门设置资助学生的基金。由于他努力促成这件事，此后，陕西省的学生到国内外大学上学的人数大为增加。

正当中国新闻界遭到来自私下的和政治的各种压力的时期，张季鸾能坚持不偏不倚的新闻报道以及畅所欲言地发表评论的正确方针，这是他的最大成绩。

张其镗 字：子武 号：无竞居士

张其镗（1877，5，7—1927，6，30），起先在湖南当官，二十年代曾充当吴佩孚的顾问和秘书长。

在他出生前的五代之内，他的家族里颇有一些有学问的官吏。他原籍广西桂林，祖父在南方做官，太平天国叛乱时立有军功。他父亲在1862年中举，以后在广东南海、顺德等县做县令。张其镗童年时智力过人，六岁就正式上学，十八岁入张之洞1887年在广州创办的著名教育中心广雅书院。1896年父亲去世，张其镗同他母亲和幼弟留居广州，三年后和粤越边境守备潘培凯的女儿结婚，因协助其岳父而对军事渐有所知。1902年回老家桂林参加广西省试，1903年中试后又于1904年参加京试中式，那正是废除科举的前一年。

张其镗投身官场，先在湖南署理零陵知县，后为芷江知县直到1910年，以办事练达著称。他的发妻死后，又和曾国藩的外孙女聂其德结婚。1910年母死，回桂林居丧。

1911年湖南督军令张其镗率部驻永州。当年10月革命爆发，谭延闿任湖南督军，1912年湖南新政府成立，谭邀张充当军务委员，他们原系故交，京试同年中式，因此有同年之谊，这在清代时是很密切的关系。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另召会议修订宪法，张其镗被举参加。1915年会议作出了恢复封爵的建议，张其镗感觉到其中的反动趋向，离京回南。不久，袁世凯开始了不得善终的帝制运动。

张其镗一生的关键是在1918年与吴佩孚初次相会。1917年，张勋企图在北京复辟清室帝制，但以惨败结局。当时段祺瑞以拯救民国的主将闻世，随着他的权势增强，又成了内阁总理，并进一步准备以武力统一中国。1918年初，段祺瑞派兵由曹錕、吴佩孚率领进占湖南。吴佩孚部队开入湖南时颇为顺利，但不料在永州被阻，那里有再次任谭延闿副手的张其镗守备。当时张其镗通知吴佩孚说：为全国利益计，应重建地方和平。吴佩孚为张其镗的感人意见所

动，同时又对段祺瑞不满，乃决定在湖南停战，并于1918年8月21日从衡阳领衔通电北京政府倡导全面和平，据说电稿系张其锬所拟。不论电稿执笔是何人，这个通电促使北京的段祺瑞辞去了内阁总理。

北方的混乱仍继续不断，张其锬当时以吴佩孚顾问的地位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和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继续活动。张、吴成为莫逆之交，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对求神算命有共同的兴趣。

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张任他的老家广西省省长。民国初年，南方粤、桂、黔、滇、川诸省主要是控制在地方军阀手中。由北京任命的官吏在这些地区的权力极小。张其锬权力所及只是省会邕宁附近的几县而已。张不能掌握该省财政收入，他设法在那里应付了两年，1924年李宗仁接任他的职位。

当时北方正在酝酿第二次直奉战争，1924年9月张作霖首先宣战，吴佩孚在河南洛阳，又邀张其锬前去协助。但吴佩孚在这次战争中失败，从此以后他开始失势了。在南方，复兴的国民党在广东巩固了军事据点。在北方，冯玉祥于1924年转而反对吴佩孚，1925年反张作霖。吴佩孚、张作霖准备组成反冯联盟，吴佩孚的私人代表张其锬在这些军阀的谈判中起了重要作用。吴佩孚自1924年失败后，东奔西走，总不能巩固一块地盘，这一期间，张其锬仍为他效力。1927年吴佩孚准备撤到四川去，那年夏天率部队到了豫鄂边境，部队在西行途中，6月30日张其锬在樊城被刺，刺客有说是土匪，有说是敌对派系，传说不一。张其锬的尸体运往南方，1927年冬在苏州附近安葬。

张其锬多才多艺，喜绘画，能弹筝，善围棋。他具有诸如中国医药和英语等各种各样的知识，又是一个很好的书法家，被看作是文士中一个有修养的人。

他又是一个学者，特别注重古代中国哲学。梁启超很推崇他的《墨经通释》，在序言中对张其锬于1923—27年在吴佩孚幕中协助军务的时候能有这样的著述感到敬佩。他的《墨经通释》和文集《独志堂丛稿》，在他死后由他的姻亲居善英编订，分别于1931年、1932年出版。

张其昀 字：晓峰

张其昀（1901—），学者和官吏。他在国立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教授历史、地理多年。他还著有讨论中国近代化问题的著作。他在台湾任蒋介石办公室秘书长，又是教育部长。

张其昀浙江鄞县人，出身诗书门第，他的曾祖和祖父是举人，他的父亲张绍林从事研究浙江地方志，致力于改革乡村教育和水利建设。张其昀受了几年旧式教育后，1913年进了县城的第四高小，两年后又进了省立第四中学，深受几个有名的教师的影响。语文教师陈广甫原是他祖父的学生、父亲的老师，他教导张其昀当以教育为毕生的事业。历史教师洪云祥和地理教师蔡和康，在教学工作中强调历史和地理的相互关系，这两门学科此后就成为张其昀毕生的兴趣了。

1919年夏，在“五四”运动高潮中，张由宁波学生联合会推举去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会议。这可能是张第一次参加政治活动。那年恰好他毕业，他离开浙江进入南京高等师范学堂，这是一所政府主办的具有大学水平的免费学校。那里的史学教授柳诒征对他特别注意，设法疏通了因张身体太差而不准入学的阻碍。张又从另一个名学者刘伯明（1887—1923）学习哲学，刘是学术杂志《学衡》的创办人。张是一个优秀的学生，1922年梁启超到那里讲学，对这个青年人的一篇论文曾大加赞赏。1923年6月张毕业，同年该校改组为东南大学。

毕业后，张其昀应上海商务印书馆之聘编写中学地理教本。为期四年完成的工作，给他良好的机会遍读商务印书馆附设的藏书丰富的东方图书馆的书籍。1927年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东南大学改组为国立中央大学，张其昀由柳诒征介绍，当了母校的地理讲师，在校十年以后升为教授。在这期间，他除了著译有关地理学的著作外，又到浙江（1929年秋）、东北（1931年夏）、西北（1935年秋到1936年夏）旅行。旅行见闻刊载于《地理学报》上，获得著名地

质学家中央研究院丁文江的好评。1935年中央研究院院务委员会成立，参加院务委员会的国立大学推举张其昀为院务委员之一，那时他三十五岁，是院务委员会中最年轻而又没有出过国的委员。

1936年夏，他离开南京，去杭州就任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主任。一年后，日本进犯中国，该校师生为了避免遭受破坏，向内地迁移，先后在浙江建德、广西宜山、贵州遵义停留。1939年8月浙江大学迁至广西，张其昀就任该校新设的史地研究所主任。1940年8月，浙江大学在遵义定居后，他和文学院的一些同事创办了《思想与时代》杂志，作为讨论复兴中国、交流中西文化等问题的论坛。1943年2月，美国国务院文化交流处请中国各大学校长推举六名中国教授访问美国，张其昀即为其中一人。1943年6月6日离开重庆，经印度、非洲、巴西，6月21日到达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他在美国期间，大部分时间在哈佛大学的怀德纳图书馆研究地缘政治学。他还访问了西岸和东海滨的一些城市。1944年11月张其昀和霍普斯金大学校长鲍曼的会见，给他留下愉快的印象，他们谈论几世纪前中国作为海上强国和陆上强国的情况。

1945年9月，张返回中国。日本失败后，浙江大学又迁回杭州旧址。张其昀继1945年12月去世的梅光迪而成为文学院院长。他整理了史地研究所在遵义收集的资料，1948年5月出版了《遵义新志》，对地方志的编纂提出了新的概念。他为研究所收购了南浔刘氏嘉业堂和瑞安孙氏越海楼的宋版珍本典籍，丰富了史地研究资料的收藏。

当时中国内战正进入最激烈阶段，1949年6月共产党军队向杭州进军时，张其昀离开了大陆，这一次浙江大学则并未迁移。张在台湾脱离了学术界而充当了总裁办公室的秘书长。1949年7月，他随同蒋介石去菲律宾博利脑和总统奎利诺会谈，发表了联合反共宣言。同年8月，又随同蒋介石去南朝鲜访问总统李承晚，蒋、李两人重申坚决反共的立场。1950年3月1日，蒋介石正式任总统，总裁办公室撤消，张其昀改任国民党宣传部长。1950年7月任国民党中央改组委员会秘书长，1952年10月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兼任秘书长。几年之内，张升到了国民党核心集团中的高级地位。

1954年春，俞鸿钧组阁，张任教育部长。从1954年5月到1958年7月他在

职期间，在台湾重建诚志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改组台湾省师范学院为大学，恢复国立中央图书馆，又建立了历史博物馆和台湾科学馆。为了推行台湾青年免费义务中学教育，1956年9月在兴中县试行国民小学毕业生免试升入公立中学。这是一项担风险的实验，因为中学教育是义务的，需要一笔费用。入校学生增多，而经费、校舍和教师不足，因此对这一项措施的责难比赞助的还多。1958年7月，张辞去教育部长之职，这项措施也就无声无息地中断了。同年秋，他任国防研究院院长，它类似美国的军事研究院。1960年初，他又在阳明山创办了国学研究所。

张其昀的主要著作有下列几种：《中国民族志》、《中国经济地理》、《浙江省史地纪要》、《中华民国史纲》、《新教育论集》、《中华五千年史》、《中国地理学研究》等。他又是《国父丛书》的总编辑，收集了孙逸仙主要的理论和政治著作，已于1960年在台湾出版。

张嘉璈 字：公权

张嘉璈（1888——），银行家，经济学家，政府官员。他和中国银行有长期联系，在私人银行的近代化经营方面作出很大贡献。1935年后，他在国民政府中曾任铁道部长、交通部长。

张嘉璈，江苏宝山人，张嘉森之弟。幼年受塾师的教育，其中有几个是县里闻名的塾师。1901年，他兄弟两人在上海进了广方言馆学习法文。1905年去北京，在高等工业学校上了几个月学。以后去日本进东京庆应大学学财经，他的哥哥进早稻田大学。他潜心读书，未曾卷入引起当时极大部分中国留日学生注意的反满政治活动。

1909年张嘉璈在庆应大学毕业后回国，在清政府所设立的相当于近代交通部的邮传部任职。他的工作之一是编该部的官报。他像他的上司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一样，关心1911年铁路国营的纷争。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张嘉璈离京回南方。1912年初任浙江都督朱瑞的秘书。1913年4月召集国会，张任参议院秘书长，不久离职，从此他长期为中国银行出色地工作。最初，他是上海支行协理，在支行经理宋汉章手下工作。

1916年5月，张嘉璈初次获得全国声望，他抗拒了袁世凯对有发行货币权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这两个半官方银行停止兑现的命令。那时袁政府的崩溃即在眼前。在这个混乱的时候，两行发生挤兑的局面，因而出现了停兑的命令。上海支行因位于公共租界，地位特殊，其营业有巩固的基础，信誉又很好，如停止本行货币兑现，将会损坏他的同事辛苦建立起来的信誉，因此他决定置北京命令于不顾，并且设法方便兑现。这一行动立刻引起北京的回击，袁世凯下令逮捕张嘉璈，并备文要求上海租界外人当局引渡。公正舆论支持张嘉璈的勇敢行动，强烈反对北京的作法。

袁世凯死后，张嘉璈的坚毅行动更提高了他在银行界的声誉和影响，1917年提升为总行协理，到北京总行工作，1929年升为总经理，直到1935年。张嘉璈在1917年底离上海前，5月29日创办了《银行周刊》，这份刊物后来由上海银行协会主办，是一份研究中国银行经济很有用的杂志。该杂志在共产党进据上海后一直出版到1950年3月3日。

张嘉璈在普遍提高整个中国的银行界组织和中国公共财政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二十年代早期，他在财经工作方面的才能为中国政府和国际银行界所公认。1922年，被任命为全国财政协商委员会委员，第二年为全国财政改革委员会委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银行团借款中断，日本成了唯一供应借款的国家。战后，由于中国对日本的不信任和各列强间的猜疑，大国组织新银行团的计划失败。1920年纽约摩根公司的股东拉蒙特访问中国，与中国银行家商讨外国贷款，其中包括张嘉璈。但是因中国政治混乱，任何外国资本都无法筹集。最后一致同意需要建立一个中国银行集团来应付政府的财政需要和工业需要。

张嘉璈在《中国铁路发展史》（1943年出版）一书中回顾：“中国银行集团1922年第一次签订发行六百万元铁路财政公债，1924年又向陇海路发放一千万现银借款。投入铁路财政的经营工作需要有些勇气，因为要在国内资金有

限而又无外国的合作的情况下完成这项事业。但我们终于深信，我们必须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力量。”

中国银行界用自己的财源参与全国建设事业，这在中国公用财政史上是第一次。舆论界认为中国的银行界已老练成熟，达到象迄今为止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的外国银行一样殷实可靠的程度。这种新的声誉，为1927年到1937年这十年间国家经济现代化发展扫清了道路，这一期间，本国银行机构在筹措资金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自张嘉璈任总经理后，从1928年到1935年间中国银行有很大发展。张嘉璈在对银行业务的考察中认为，缺乏健全的会计制度是银行业务运行的极大阻碍，因此，他从英国聘请了西方的银行专家作顾问，并由在伦敦训练过的经济专家刘攻芸创建一套完全近代化的会计制度，并改组银行属员，聘用受过西方训练的谙悉经济、银行业务的中国留学生担任要职。

中国银行还为处理外汇和国际银行事务扩展业务，指定国外代理和客户，在海外华侨地区设立支行。中日战争期间，中国银行担负了战时国外划汇业务。中国银行又是中国第一个设立完备的经济研究部的银行，其研究出版物被经济学家和银行家认为具有权威性。

张嘉璈和中国银行的联系在1935年曾一度中断，当时国民政府新任闻名的财政家孔祥熙为财政部长，决定改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着重改变这两个银行与中央银行的关系。中国银行的资本由二千万元增为四千万，政府的股份亦相应增加。于是这个银行的官方色彩更加明显，具有辅助中央银行的作用。宋子文取代张嘉璈而成了中国银行首脑。中国银行在业务上作为一个独立机构的作用中止了，这种地位是张嘉璈二十多年来辛苦经营建立起来的。

张嘉璈又向另一个新的事业迈步。蒋介石在他的“人才内阁”里任命张嘉璈为铁道部长。张嘉璈是非官方的但有影响的政学系的一员。任命张嘉璈为铁道部长的用意，不仅由于他在中国银行忠诚工作之后给他安排一个新职位，而且也是发挥他对发展铁路的兴趣，这是他青年时代在清政府邮传部任职时曾表露过的，他在中国银行时又对铁路投资非常热心——特别在1929年修建浙赣路和1933年修建粤汉路中。日益紧张的中日关系和战争的危机，迫切需要修建新

线路。因此，张嘉璈被认是担负这个职务的合适人选。

从政府的国防需要着想，于是决定修建一条由东向西越过粤汉路的新铁路。1936年1月，铁道部发行二千七百万元的公债，修建浙赣路南昌到萍乡这一段，与萍乡株州段相衔接。一个月后，铁道部又发行一亿二千万新铁路公债，修建由株州向西到贵阳的湘黔路。张嘉璈主持和德国有关方面谈判，要求供应修建浙赣、湘黔两路的设备，又与法国有关方面谈判，供应修建四川的成渝路的设备。从1935年12月张嘉璈就任到1937年夏中日战争爆发这十八个月中间，张嘉璈又为中国铁路界获得了外国的信任，因此铁路公债涨价，他又成功地促使中国银行界助销铁路建设公债，总数达七千四百五十万元。

中日战争爆发后，铁道部并入交通部，张嘉璈任交通部长。此后四年中，在敌人的封锁和沿海省份沦陷的情况下，张嘉璈不顾艰难，主持战时交通运输卓有成效。他最出色的成就是在激烈战争中建成了湘黔铁路，这条有战略意义的二百二十四公里铁路一年内即告建成。原来还计划将这条铁路扩建到法属印度支那，由于1939年11月日军袭击广西，这个计划未能实行。

1942年，张嘉璈以健康为由辞职，由曾养甫继任交通部长。张随即由政府派往美国考察经济建设。他的《中国铁路发展史》1943年用英文在美国出版。他于1943年1月在重庆写成的前言中说到，他虽然把书稿寄往美国，但仍受官方制约。这本书详细回顾了中国的铁路和铁路财政的历史，又瞻望战后发展铁路的前景，这本书分析了铁路发展的重要条件，意在指出这方面的潜力，借以引起国外财政金融界的注意。

1945年战争结束，张嘉璈回国，在此之前，国民政府已任命他为东北经济委员会主席。在这个职位上，要使被敌人占领十四年的地区的经济获得稳定，他要做大量工作。由于共产党人进入了这一地区，又由于苏军在日军投降前几天开进这一地区所形成的阻挠，情况复杂化了。张嘉璈是长春铁路局主席，深感其使命的艰难。他和东北外事委员蒋经国多次同苏方谈判失败。俄国人对国民政府代表加强其在全东北的控制的努力，丝毫不给以方便。

当时，共产党指定林彪和其他富有经验的军政人员进入东北，组织对国民党军队的武力抵抗。国际的压力最后促使苏军撤走，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已在苏

联的庇护下建立起战略据点。张嘉璈决定对这个异常艰难的工作尽力而为，开始在长春以南地区进行一些恢复工作。日本投降初期，张的工作有一些进展，铁路通车里程和电讯线路以及煤产量和发电量都有所增加，相当多的工厂复工。

东北的政治军事形势迅速恶化，因而也影响了经济形势。国民政府当局由于军费的沉重负担而改革币制，发行一种特别的东北币，随着国民党统治地区的缩小，这种纸币发行的数量达到惊人的数字。1946年后半年，美国放弃调停国共冲突，内战公开化了。东北工作的重心已经从经济复苏工作转移到军事行动，张嘉璈无能为力了。1947年3月国民政府召回张嘉璈，任命他为中央银行总裁，他任职约一年，到1948年5月南京政府改组，翁文灏任行政院长为止。

在共产党军队控制大陆时，张嘉璈出国，在澳大利亚当了三年教授，讲授远东的经济问题。1953年迁往美国，在洛杉矶罗耶拉大学教书，1958年出版了《通货膨胀的螺旋形膨胀：1939——1950年中国的经验》一书。他退休后仍在加利福尼亚居住。张嘉璈除著述外，还培养了一批中国经济学家，他们是过去张嘉璈当中国银行总经理时在该行经济研究部起家的，其中大部分人现在在美国。

张嘉森 字：君劭

张嘉森（1886——），二十世纪初年致力于立宪政府，是支持梁启超的主张和活动的首要人物。他在中国集中精力于文化教育活动而显露头角。他曾在德国学习哲学，是1923年科学与玄学之争的头面人物。1930年，他反对国民党的一党政治而创设了国家社会党。1952年后他迁住美国。

张嘉森出身在江苏宝山一个相当富裕的家庭，他是张嘉璈的长兄，早年受塾师的儒家教育，塾师中颇有几个该地区的知名学者。1901年，他们兄弟两人一起进上海广方言馆，在那里受了中等教育，开始学德文。

张嘉森在成长时期中，对改革家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理论发生兴趣。1905年到1909年，他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和政治经济。1907年他加入了梁启超这一派人在东京设立的政闻社，筹划建立立宪政府。1908年总部迁往上海，张嘉森等社员继续在日本主持社务，他与梁启超通讯，支持梁的立宪政府的主张。

1909年他自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回国，通过自1905年废除科举后清政府举办的甄别留学生的考试而获得进士衔，任翰林院编修（后期的进士被一般经艰苦努力由正式科举取得进士的老一辈人视为微不足道）。1911年张任《京津新报》主笔，他和梁启超这一派人过往甚密，他们要进一步支持清廷筹设新国会。1912年武昌起义，民国成立后，他在上海遇到梁漱溟、汤化龙、孙洪伊和其他一些梁启超派的人物，筹划成立立宪国会，并拟建立政党来完成这项任务。1912年12月梁启超主办《庸言》报，张嘉森任副主笔，经常撰稿。

1913年张嘉森去欧洲研究西方哲学，他的政治活动暂时中止。1913年到1915年，他在柏林大学。离德国后又去英国研究数月。1916年离英回国时，他深信德国必将战败，竭力主张中国加入另一方参战。回国后，他在杭州任浙江省公署交涉署长。他和梁启超讨论中国的参战问题和中国的政治形势。1916年底、1917年初，张嘉森代梁启超探听张勋、冯国璋的主张，因为梁启超想在北京发挥作用而受到段祺瑞的干扰，不少知识界人士对在现存政府控制下使国家复兴这一点日益增加了怀疑，许多人从此退出了政界。其中有一个叫张东荪的，去上海主编一份独立性的《时事新报》，张嘉森亦参与其事而当了经理。他赞同梁启超要重视文教工作的主张，1918年又在北京大学教书。同年年底，梁启超以非官方代表的身份去欧洲参加巴黎和会，随同他的有他的一些好友，其中有张嘉森、蒋方震、丁文江。战后的几年中，从1919年到1922年，他在德国柏林耶拿大学从鲁道夫·倭铿学哲学。倭铿注重对人类道德责任感的研究，吸引了张嘉森的兴趣，他们两人合作写了一本《中国和欧洲的人生问题》，1922年在来比锡出版。张对法国哲学家柏格森也很注意，他从柏格森的著作中发现作者的论述支持了他关于孔子人性论的观点。张在耶拿不仅学哲学，而且又旁听法学家卡尔·柯尔齐的课，增长了有关欧洲政治思想和政体的知识，如

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俄国的共产主义以及英国的议会政府。他又密切注视当代欧洲的发展，例如匈牙利贝拉·孔的独裁制和共产国际的早期活动。

张嘉森由共学社委托邀请德国哲学家生物学家汉·德莱塞来中国讲学。共学社是由梁启超发起的，它的宗旨是请西方的名学者来中国讲学。人所共知，德莱塞致力于具有生命力的生物学，而对远离现代科学观点的机械设想不屑一顾，德莱塞对中国的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张嘉森回国后在北京当他的翻译，以后张本人又由清华大学学生邀去作演讲。接着1923年2月的《清华周报》上刊载了一篇题为“人生观”的著名的讲演，引起许多中国的颖悟之士参加了这一场生动的、发人深思的辩论。张嘉森提出的这个课题是受倭铿《人生问题》（1890年莱比锡出版，1909年英译本在纽约出版）一书启发。这本书的要点是在说明科学只注重事物的客观世界，对解决人类的精神生活则无能为力，而且科学导致欧洲文明趋于实利主义而使道德败坏。张嘉森宣称，明智的人生哲学不是依靠科学规律来决定，而是应该依靠人类的直觉和自由意志。因为张对科学方法进行攻击，所以丁文江著文驳斥张嘉森的论点，极力维护科学对人类的精神生活和大学教育的价值。张东荪、胡适、梁启超和其他当时的知名人士，都参加了这次辩论，1923年底曾出版了《科学与人生观》论文集二册，收集了当时参加辩论的重要文章。

1923年江苏省长韩国钧聘他去上海任国立自治学院院长，张嘉森将该校改为国立政治大学，入学条件和学业都很严格。请了一些名人到校讲课，如张东荪、张东荪的大哥张尔田、潘光旦、吴国桢等人。张嘉森本人讲授的题材极多，其中包括当时的政局。他有关中国当时内战形势分析的六次演讲稿，1924年由该校出版，题为《国内战争六讲》。军事形势的迅速转变，在张嘉森面前提出了新的问题。1926年11月，他在汉口花了十天时间考察国民党政府和估计北伐的前途。他回到上海后，发表了他的观感《武汉见闻》，并在政法大学公开发表他的见解。他预见到北洋军阀的崩溃和国民党共产党的分裂，他还反对国民党的一党制，力劝学生们要严守民主原则，他的民主原则即是西方的议会民主。

1927年3月北伐军到达上海，由于他的政见不同，又和梁启超等反对派别

在一起，张嘉森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国民党封闭了国立政治大学。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张嘉森和他的朋友在上海秘密出版《新路》杂志，反对国民党的训政一党制，强烈要求政府实行多党制，允许发展民主政治。由于这些活动，国民党当局将他拘留，由上海警备司令部将他软禁在家，禁闭了一个月之后获释。据他在1952年出版的《中国的第三势力》一书中所述，他“被迫出国”。

1927年到1931年张嘉森的活动不多，他过着隐居生活，据说他致力于阅读和翻译亨利·拉斯基的《政治入门》一书。他仍和在北京讲授中国历史的梁启超保持联系。1928年9月，他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到，他听说丁文江自国民党占据上海后过着半隐居的生活。1929年到1931年，他又到德国去，在耶拿大学可能还在柏林大学研究哲学并讲授中国哲学。

1931年张回国，9月17日到北平，那正是沈阳事变的前夕。他重新从事政治活动，力图在中国建立民主政府。他经旧友燕京大学哲学教授张东荪介绍，那年冬天才能在燕京讲课。1932年4月，一批热衷于组织政党的人在北平会面，人数约有百余名，他们大都是大学教授和梁启超的旧友，张被举为新组政党的秘书长，出版《再生》杂志宣传他们的政治纲领。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禁止成立政见不同的政治团体，所以他们的社团是非法的，一直到1938年都处于秘密的地位。张嘉森躲开国民党特工人员的追踪，奔走于北平、香港之间，征集会员。

1934年秋，张和他的支持者在天津召开全国会议，正式宣布成立国家社会党。这个新党的名称和德国希特勒的政党名称不幸相同以致混淆，这是偶然巧合。在他的政治报告中，强调中国受日本侵略的危险，号召增强国防。全国会议之后，他去山西会见该省统治老手阎锡山讨论国防问题。为了扩大新党的势力，张等还与一些退居的军政人士接触。

1934年张嘉森去广州，受到华南有势力的军人陈济棠的款待，陈请他在中山大学讲学。在陈济棠的庇护下，他在广州设立学海书堂，从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聘来教师，准备培养学生和军人。1936年夏，广州形势突然变化，南京当局准备取消反叛的西南政治会议，陈济棠失势，学海书堂解散，张嘉森从广州

逃到上海避难。在1936年召开的国家社会党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张再次当选为秘书长。同年出版了他的名著之一《明日之中国文化》，对欧洲、印度、中国的文化作了比较和研究。他认为欧洲长于科学和自由，印度长于先验的玄学，而中国则着重人伦。他根据梁启超等人在1918—1919年间提出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必须从人性的观点出发，必须建立一种新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为了建立这种新文化，必须注意欧洲宗教改革后的文化，应该采纳那个活跃时期的精神，而不是它的形式，把它溶化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去。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张嘉森和其他中国小政党的领导人一样，不再反对蒋介石而致力于民族团结的事业。同年8月，他接受国民政府的邀请到南京担任国防咨询会议委员。1938年随同政府去汉口，他以国家社会党七个代表之一参加国民参政会。他和蒋介石就统一战线问题多次交换信件后，国家社会党始为官方所承认。1938年5月到7月，他在汉口作了一系列有关国家社会主义原理的讲演，后来将这些讲演汇集成册，出版了《立国之道》一书，阐明国家社会党的宗旨，他的基本主张是在中国推行改良的西方民主政府的议会制度和改良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体制。在民主制度的结构里，政党有行动自由，彼此友好地竞争，而不得彼此破坏或破坏政府制度。公民都有言论和参政的自由。根据国家宪法由国民代表会议选定，组成中央行政院的成员，并制定行政院执行的施政纲领。政府人员除各部首脑外，都应是无党派的人士。在他的社会主义纲领里，张嘉森主张钢铁、矿藏、水力发电厂、交通等重工业由国家控制，同时，国家必须监督纺织等大工业（倘不是国有的）。在各经济领域内对国家无“损害”的私营企业应允许存在。

1939年张嘉森随国民政府迁到重庆，他企图通过教育以促进民族主义。由政府支持并经军事委员会资助，创办了“民族文化学院”，张担任该院院长，董事会由陈布雷等国民党的要人组成，1939年7月在重庆正式开学，张嘉森亲自讲哲学。该校特别注重民族主义的思想教育。1940年，他随同学院迁往云南大理，由省主席龙云提供校舍。1941年，在云南的学生不满情绪增长，引起了新的纠纷。国家社会党常委罗隆基，那时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被斥为煽动学

生反政府情绪的主使人，因此，国家社会党的首脑张嘉森亦被怀疑。1941年12月，张去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时，奉命留在重庆，1942年春，大理的学院由政府下令关闭。

当时在中国政界中最令人注意的事件是国民党、共产党间统一战线的破裂。张嘉森和中国青年党的左舜生以及其他小党派的政界人物如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等人形成了一股第三政治势力，力求在战争期间能保持统一战线。这些反对派人士在1941年组成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10月在重庆开会，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以张澜为主席。1945年春，国民政府派民盟代表张嘉森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在加利福尼亚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1945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召开另一次大会，张嘉森被选为中央委员，负责外事。1946年1月，那个后来流产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会，张嘉森被指定为出席会议的民盟四个代表之一，其他三人是张澜、张东荪、罗隆基。当时他正在从美国去英国途中，由于他赶回国内，参加了会议的第二次会议。

1945年张嘉森在旧金山遇见了民主立宪党的领导人李大明，当时该党的党魁是伍宪子。这个党是康梁保皇党的直接继承者，由于民国的成立而取消了忠君的内容，张嘉森和李大明当时讨论了两党合并的可能性。1946年8月，张嘉森的国家社会党和李大明、伍宪子的民主立宪党合并组成新的民主社会党。他们的政纲宣称，反对内战，反对一党专政或一个阶级专政，主张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国家统一和大工业的国家社会主义化。1947年后，国内形势笼罩着日益加剧的内战危机，民主同盟被政府宣布为非法，同盟的领导人日益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政治总纲。当形势更为恶化时，张嘉森仍留在南京，继续为争取宪政而努力。1949年4月25日，他离开上海去葡属澳门。

1949年10月，当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时，他由印度教育部请去印度讲哲学。1950年5月24日宣布辞去民主社会党主席职务。1952年3月，他到香港，他的名字一度与张发奎、顾孟余等联在一起，准备发起一个第三势力的运动。4月，他由香港飞往日本，又由日本去美国。他的政治生涯的自传《中国的第三势力》1952年于纽约出版。在这本书中，他阐述了从孙逸仙到毛泽东这个阶段在中国发生的事件，而对他个人在现代中国政治历史中的作用的阐述并

不是没有偏见的。这本书被认为是对蒋介石以及对美国的战时和战后对华政策的谴责，又谴责了中国共产党背叛中国传统。

1952年后，张嘉森以大部分精力从事哲学著述。他最著名的著作是一本历史性的概述《理学的发展》二卷，分别在1957年、1962年出版。这本书之所以引人注意，部分地是因为作者自认为是二十世纪的理学家。这本书详尽阐述了从唐到宋的中国哲学，附有不少简短的译文以及与西方思想作对比的阐述。他于1958年在《东西方哲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孟子要义》，称孟子为对中国思想影响最大的儒家，他的思想与柏拉图、康德等思想家有类似的地方。明代大理学家王阳明也是张嘉森近年来注意研究的对象。《东西方哲学》杂志登了他的一篇论王阳明的文章，对王阳明的哲学作了简要通俗的解说。他在1962年出版了关于王阳明的书，书名为《王阳明：十六世纪中国的理想主义哲学家》。1954年8月，他在香港《再生》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名理谈》的有意义的文章，列举了十七世纪基督教学者李之藻的1631个逻辑例证。1956年他还写了一篇《中国和甘地主义的印度》，在加尔各答发表。

张 睿 字：季直 号：啬庵 斋翁

张睿（1853，7，1——1926，8，24，）实业家，教育家，保守派，一位著名的社会改革家和有学问的企业家。他以1899年的大生棉纺厂起家，在南通建立了一个综合性企业。他的“通海垦牧公司”成为其他企业仿效的楷模。在他一生的最后十年，他致力于把南通建成一个模范区。

张睿生于海门（紧靠着他的老家南通），兄弟五人，张睿行四。他家世代是目不识丁的农民，他父亲张彭年粗通文墨，并使他的几个儿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张睿幼年时才华超群，远胜于他的几个兄弟。在几位塾师的授教后，1868年张睿十五岁时举生员，以后数年，他先后在南通和南京的书院攻读，1870年到1876年张睿曾四次应试，但终未考上举人。

1876年，张经一位老师介绍，在驻浦口的庆军统领提督吴长庆（1834—1884，字筱轩）幕中任职，同年，吴长庆从浦口调往山东登州，张謇随吴同去，张在吴长庆幕中任职达八年之久，直至吴长庆逝世。在这八年期间，他结识了吴长庆的一些幕僚，其中有后来成为知名人物的袁世凯、薛福成（1838—1894）等人。

张謇在幕中工作清闲，他有大量的空暇时间，因此他继续攻读，准备应考，直到1882年夏季。同年7月，朝鲜宫廷的极端国粹派由朝鲜国王的父亲大院君率领，包围了日本驻汉城的使团，杀了很多日本人。北京的清政府应中国驻东京公使黎庶昌的建议，决定出兵朝鲜，吴长庆奉命调他驻在登州的部队，立即开往朝鲜。吴长庆委派张謇负责协助他的部队从山东到朝鲜的调动工作，由于袁世凯等人有力协助，张謇将中国军队从芝罘及时调集到汉城，解除了反对朝鲜国王的武装力量。由于1882年中国军队迅速抵达，大院君派的叛乱才被平息，一时避免了日本全面入侵朝鲜的可能性。张謇对这次远征成功作出重要贡献，朝鲜国王和吴长庆对张謇当众嘉奖。

1884年张謇从朝鲜回国，同年吴长庆去世，张謇又埋头攻读，1885年应举入试，入选。1886年到1892年间，张謇四次进京应试，均落选，但他为皇帝的老师翁同和等有影响的官员所赏识，翁大力帮助张，1894年张謇终于通过了进士的考试，而且是殿试中的第一名，获得状元这个最高头衔。

此时，张謇感到需要改变他的发展方向。1894年爆发了在朝鲜进行的灾难性的抗击日本的战争，次年中国政府接受了马关条约的耻辱条款。这件事震动了张謇，虽然他在1894年获翰林院修撰这个尊位，但他决心放弃官场生涯。他认为要使中国有力量抵抗外国列强，必须进行改革。于是他回到南通，倾全力发展他故乡的事业，为全国作出一个从事现代化而获益的具体范例。

中日战争期间，张謇结识了在南京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1837—1909）。当时，张之洞希望当地士绅发展工业，按照他在湖广任内的经验，开办纺织厂。张謇得到张之洞的鼓励和支持，着手在南通建立一座棉纺厂。张謇用了三年的时间为此筹措资金。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因为在那时有钱人不愿意为新生的工厂企业投资，而对象张謇这样一个没有经验的学究所经办的事业更其不

能信赖了。

经张謇本人不断努力，本地少数士绅的支持，以及继张之洞为两江总督的刘坤一的不断鼓励，张謇终于建成了他的第一个工厂企业大生纱厂。1899年秋，大生纱厂在南通正式投产。此后，该厂股东的利润收入不断增加，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大生纱厂是中国唯一的一家获得成功的私营纱厂。张謇因创办大生纱厂成功而以实业振兴家闻名。张謇在南通和在南通附近建立的许多企业，几乎全部都是用大生纱厂所获的利润作为资金的。在南通建立起来的综合工业中，大生纱厂是第一所企业，这个综合工业包括：1901年建立的面粉厂，1902年和1903年办的轮船公司，1903年建的榨油厂和酒厂，1905年建的缫丝厂和机器厂。

在大生纱厂筹建过程中，张謇曾于1898年5月到北京去了一次，与不久后发生的“百日维新”运动有关的活动有密切的接触。在北京，张謇经常和他的恩师翁同和交谈，6月中旬，翁同和被斥退居，张謇敦促他赶快离京。张謇也曾遇到康有为，当时康有为作为维新运动的领袖，影响极大，张謇试图劝康不要公开鼓吹影响很大的政制改革，康没有接受张的忠告。7月张謇离京回南通，正好是在1898年9月的慈禧太后政变之前，因此他同康有为和其他维新派人物没有牵连，虽然他被认为是一个进步分子。

1899年，大生纱厂创建后不久，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迅速向南蔓延到长江流域。此时，张謇成了两江总督刘坤一的亲信顾问，张謇积极劝说刘坤一置身于北京朝廷的危险政策之外。刘坤一听从张謇的意见，刘与湖广总督张之洞以及盛宣怀商定“东南互保”，为长江流域在这次骚扰中保持住安宁。

1901年，张謇开始了他的第二项重要工程：开垦南通海滩荒地。几百年来，这些海滩一直认为不适于耕种，把它当作盐田。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化，许多盐田逐渐无法生产，张謇着手使这些田地变为种植用地。张謇得到一些当地人士的帮助，建立了通海垦牧公司。此后，江苏沿海一带先后建立的约四十家垦殖公司都是把通海垦牧公司作为蓝本的，这些公司虽然并不全都成功，但确实为数万垦殖工人解决了生计。

1902年，张謇着手另一事业，在他老家南通创办师范学校。他计划的第一

步是使南通的全部学龄儿童上学，为此建立了国内第一所师范——通州师范学校。初办时，只培养男教师，七年后学校设备扩大，建立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培养女教师。师范学校的建立，为南通地区几百个小学培养了教师。两所师范学校的建成，促使张謇又创办了一所农业学校（1910年）、一所纺织学校（1912年）、一所医药学校（1912年），这三所学校在1920年合并为南通大学。

1903年，张謇去日本访问四个月，对日本现代化的发展深有感受。他认为日本获得的成就是由于日本有一个立宪制政府。张謇回国后，热心鼓吹立宪运动。1908年清政府发布一项逐步实现立宪政府的计划，并拟在各省设咨议局，张謇主动为江苏省咨议局草拟章程，并选定南京为咨议局的所在地。由于他的这些活动，他被公举为1909年召开的江苏省第一届咨议局议长。接着张謇以江苏省咨议局议长的名义通电各省咨议局代表来江苏集会，商讨促使加快建立全国立宪政府的事宜。十六省咨议局响应，派代表到上海开会，成立了一个推动建立立宪政府的领导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

身为江苏省咨议局议长的张謇，又开始推行他的另一项盼望已久的计划——设立“江淮河道水利局”，这项计划是准备以近代科学技术治理多年为灾的淮河和江苏大运河。但是由于经费有限，这个半官方的水利工程计划，只做了一些勘察工作。

1911年，张謇走遍了中国的很多地方，并卷入了急剧变化的政局。年初，张謇在北京设法促成江苏商人和美国船业大王大莱之间的一笔交易。张謇在北京受到庆亲王的召见，张謇力促摇摇欲坠的清政府迅速采取政治和经济的改良措施。在下半年，武昌起义爆发时，张謇作为处理纱厂事务的顾问正在武昌。张从武昌回到江苏，马上强烈要求当时的总督赶快救援在湖北的清军。由于清廷显然无力采取决定性行动，张謇的保皇心情瞬即改变，放弃了立宪主义者的立场，转而而从事于使清政府的权力和平地交给民国的活动。为此目的，张謇应革命领袖胡汉民之请，同意草拟退位书，1912年满清皇帝退位的最后一份诏书就是根据这份退位书拟就的。张謇还同几个江苏同乡一起写信给担任要职的满蒙官员，恳求他们同意和平地交出政权。

1912年南京孙中山的临时政府成立，张謇因上述的活动而被任命为内阁中的实业总长。张在他短暂的任期内，把主要精力集中于掌管盐税的财政收入，使临时政府能应付财政支付。袁世凯出任第一任大总统，张謇继续重视盐政。由于他多年关心江苏沿海的盐业生产，他发表了一篇详尽的报告，提出盐政的全面改革方案。以后很多年，他继续积极参与有关盐政改革的措施。

张謇在参与短暂的南京临时政府期间，和辛亥革命的知名人物如黄兴、陈其美、章炳麟等人常有来往。早在1912年，张謇和章炳麟、熊希龄等人组成“统一党”，这是一个与同盟会对立而倾向袁世凯的独立政治组织。1912年5月，张謇担任黎元洪领导的“共和党”的理事。1912年到1913年间，政治集团不断变化，张謇的名字虽显赫地列在各党派的领导人之中，但他对党派之争不感兴趣，很少卷入。在这一期间，他经常住在江苏老家。

迟至1911年，张謇又和旧交袁世凯恢复经常来往。他曾多次谢绝袁邀他去北京任职，其中一次是请他组阁，但他最后终于不得不勉为其难，去北京政府任职，先后在熊希龄和孙宝琦两届内阁中任农商总长，任期从1913年10月到1915年12月。在此期间制定的许多法令，为国家推进农业、工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法律基础，张謇是这些法令的主要倡议者。这些法令有“劳工保息法”、“公司法”、“商会法”等。张又兼任全国水利局总裁，但是由于国内政局不稳，很少建树。袁世凯称帝的计谋日益显露，促使张袁之间的关系最后破裂，1915年12月张謇终于辞去了在北京政府中的两个职务。

在张謇一生的最后十年期间，他专心致志于把本乡南通建成为一个全国的模范地区。他除了创办工业、水利和教育事业外，长期以来还积极从事慈善事业。早在1906年，张謇提供经费建立了一所能收容一千二百名幼婴的育婴堂。在清政府覆亡后，他把自己的精力日益转向慈善工作，先后建立了养老院（1913年）、贫民习艺所（1913年）、医院（1913年）、残废院（1916年）、盲哑学校（1916年），这些慈善机构大部分是由张謇独自提供全部经费的。此外，由他帮助在南通建立了一所博物苑（1905年）、一所图书馆（1912年）和一座气象站（1916年）。他是传统戏剧的爱好者，因此1919年在南通办了一所伶工学社，盖了一家戏院。

张謇很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他的身体健壮，1922年他欢度七十寿庆时仍精力不衰。1926年8月24日，他偶患小病后去世。

张謇身后遗有三房妻妾（他的发妻在1908年去世）、四个女儿、二个义子，还有一个第四妾吴氏所生的独子张孝若。张孝若在1925年出版了他父亲自编的年谱《啬翁自订年谱》，他还编了一册有关他父亲的传记《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1930年出版。此外，他还完成了编订他父亲大量函电文稿的工作。

张謇虽谨遵儒道，但他一反缙绅阶层的传统习俗，敢于积极地投身于为当时有教养之士所蔑视的实业界，而且他又与李鸿章、张之洞之类的官僚企业家不同，亲自处理他所办企业的日常事务，在这一方面，在他同时期的人物中可以与他媲美的只有盛宣怀一人。

虽然张謇是一个主张维新的人，但他又与当时的许多维新派人物不同，他们这些人只是关心政治制度的改革，而张謇虽参与国家政治，但他很少直接卷入重大的政治事件。他不走纯政治生涯的道路，而是把自己所从事的活动主要限于自己家乡的范围内，因此，他能够在工业、教育和水利建设方面作出了不少实际的成果。

张之江 字：紫岷 号：子姜 西名：保罗

张之江（1882—？），1927年前，一直是冯玉祥部下的军人。

张之江，河北人，生于盐山县的一个地主家庭。他父亲是村里的长老，张之江幼读诗史，举为生员。1903年清朝办新式军队，实行征兵制，张的父亲需要在村里征募两名新兵，因人数不足两人，他父亲就把张之江送去应征。当时当兵的大都是文盲，张之江因读过诗书，所以为其上司赏识，提升很快。

1907年，徐世昌受命为东三省总督，调去了一部分直隶部队，其中第一混成协守卫新民府。张之江那时是该协骑兵营排长，他参加了由冯玉祥等人创办的讲武社而与部队中的反满军官有所接触。1910年第一混成协与另两个标合编

成第二十镇，由张绍曾任统领，他亦同情新思想，赞同在他部队中传布共和思想。

1911年10月武汉起义，冯玉祥、王金铭领导的讲武社准备在滦州举行反满武装起义。张之江去上海和共和革命领袖陈其美联系，起义计划失败，冯、张被迫逃走。

1912年民国成立，张绍曾任山西督军，张之江前去当参谋。张绍曾因与阎锡山不和，很快离开了山西，张之江投效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1915年底，十六混成旅在四川驻防，受命抗击蔡锷入侵，协助袁世凯所委任的督军陈宦。冯、张同情蔡锷的反袁运动，1916年5月22日，逼陈宦宣布四川独立，此举加速了袁世凯政权的崩溃。

张之江在四川时，对该省极大多数基督教徒热心反对帝制一事印象很深，因此引起了他对基督教的注意。张皈依基督教在冯玉祥之先，与冯无关。冯玉祥因为他为他的部队集体受洗礼而被称为“基督将军”。

张之江带了冯玉祥的部队回到北方，冯玉祥不在时，由他和鹿鍾麟负责。1917年7月张勋复辟，张请冯玉祥回来指挥部队，并与段祺瑞合作击败张勋的武装。1918年冯军调往湘西常德，从1918年6月到1920年都驻守在那里。张之江统率该旅第二团。1921年春，冯旅奉命去陕西，经不断努力，扩编为第十一师，张统率第二十二旅。1921年8月，冯玉祥任陕西督军。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属于直方，他令张之江率第二十二旅赴郑州支援曹錕部队。当时河南督军秘密和奉军首领张作霖联盟。张作霖战败后，冯玉祥充任河南督军，但为期不长，1922年10月底他受命为陆军检阅使而回北京。他的第十一师扩编为五个旅，张之江为第七混成旅旅长。

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冯玉祥和直军首脑吴佩孚关系恶化。战争开始时，吴佩孚命令直军第三军军长冯玉祥去热河前线，张之江任冯部的第一路军司令。冯考虑发动政变已有相当时间，趁吴佩孚去山海关之机，率部回师，于1924年10月22日夜占领北京。事变后，冯立即改组其所部为国民军，自任总司令。经苦战后，他在11月3日击退了吴佩孚。国民军下属三个军，冯兼任第一军军长，第一军是他原第十一师的旧部，张之江统率该军骑兵旅。

1924年底，冯再次下野，把部队训练任务交给张之江和李鸣镛，当时他们两人各由北京政府任命为察哈尔都统和绥远都统。张去张家口就任，大力巩固地盘，稳定币制，发展畜牧业，改善交通事业和增设公共娱乐场所。

1925年11月，冯玉祥和奉军将领郭松龄秘密约定推翻他昔日共同反曹锟、吴佩孚的盟友张作霖。冯令张之江率部由张家口出击天津，经过一个多月苦战，又得到宋哲元部由热河赶来支援，终于打败了奉军将领李景林，攻占了天津，然后张之江又回张家口。

1926年1月1日，冯玉祥宣布辞去西北边防督办，准备出国，由张之江继任自己的职务。敌对的冲突继续发展，当时冯玉祥的国民军成了直系、奉系两军共同打击的对象，国民军发觉自己在京津地区难以防守。冯玉祥的部队由京绥路转移到南口一带。1926年3月21日，张之江以国民军名义发布公告，宣称避免内战，致力于开发西北，特别是察绥甘三省。1926年5月，国民军改编成为七个军，张之江为总司令，因张之江系西北边防督办，所以这一支军队在国内又称为西北军。在西北军这个集团内，张之江只服从冯玉祥。

1926年8月，冯玉祥由苏联回国到西北。冯玉祥感到他的部队在他离国时因多次失败而混乱散漫，于是他又对西北军进行全面领导，张之江仍为西北边防督办。

冯玉祥决定和蒋介石合作，这对国民党中的武汉派和苏联顾问是一个致命打击。1927年12月，张之江代表冯玉祥出席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此后，张之江留居南京，被举为国民政府政治会议成员。北伐战争的第二个阶段中，他任参谋总长，并担任蒋、冯之间首席联络官。

1928年后，张之江退出军政界的活动，他嗜爱国术，1928年4月国术馆成立，张任国术馆长。1929年8月，张任全国禁烟委员会主席。1932年他任国术研究院院长，1935年出国考察外国体育事业。中日战争期间，他迁居重庆，任国民参政会代表，在会上，他大谈其国术，舆论界批评他为落伍，他若无其事。

1945年底，徐树铮的儿子徐道邻辞去行政院职务后，在重庆向四川北碚地

方法院起诉，控告张之江于1925年12月曾唆使人刺杀他父亲。张之江在当时主要报纸上登载正式声明，历述事件过程，声称他并不曾参与其事。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之江先回南京，后又回北平。他住在北京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但他没有参加政治活动。1962年4月一家香港报纸上曾报道说，记者在北京会见冯玉祥的长子冯洪国时，他曾提到张之江。据说张之江八十一岁仍安安静静住在北京，而且身体很好。

张治中 字：文白

张治中（1891—），军事统领，政府官员，国民革命军将领，中央军校教育长，1937年任湖南省长，因判断错误造成长沙大火而丢了省长职位。1940年任三民主义青年团秘书长。1945—49年任兰州西北行营主任，1946—47年任新疆省主席。中日战后，任国民党高级代表和共产党谈判。1949年后，投向共产党效忠北京，协助共产党巩固对西北的控制。

张治中，安徽巢县人，出身贫苦家庭，他早年经历不详，据说是一个优秀的学生。1911年反满起义，他投身于学生军协力推翻清政府。1912年民国成立，他在第二陆军预备学堂学习两年。1914年入保定军官学校，1917年毕业于该校第三期。

张治中虽由保定军校出身，但不能保证他在军界获得有希望的前程，这是因为当时国内局势混乱，又因为需要有能帮助他发迹的个人关系。他在北方与北洋军阀毫无关系，所以他到广东去了，那时孙逸仙正准备在那里建立军事政治据点。1917—1918年间，他在闽粤参加战斗，由连长升为营长。1918年孙逸仙在广东的地位暂时衰落，张治中离开广东，此后数年中不知音讯。显然他到过四川又去上海，进了上海大学。

1923年，孙逸仙在南方重建了据点。张治中又去广州，从此开始了他新的生涯。他在那里受命为创建中的国民革命军培训军事干部。

1924年黄埔军校在广东成立，张治中担任教官。由于他忠于职守，老成可靠，蒋介石对他很赞赏。1926年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黄埔军校学员编为第一军，何应钦任军长，张治中任第一军第二师参谋长。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长江流域后，张治中掌管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处。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往武汉后，张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并任军官团团长。

1927年秋，国民党分裂，蒋介石辞职，张治中辞去在武汉的职位出国，历访欧美日本诸国。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张治中回国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政厅长。国民党在南京巩固了势力后，把黄埔军官学校迁到南京，改名为中央军官学校，张治中任训练部主任，1929年又被任命为教育长，张任此职一直到1937年春天，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张治中对中央军校的发展所作的努力比任何人为大。他扩充课程，提高教学水平，增加教学研究设备，并增设了体育文娱设施。

张治中在任中央军校教育长期间，还参与许多其他活动。1929—30年间，他活跃在前线，参与了蒋介石抗击北方反蒋集团的战争。大约在1931年他去欧洲，从德国学得了一些新的军事科学知识。1932年1月，日本袭击上海，张治中亲自参与了这次由蔡廷锴指挥的第十九路军对外国入侵者的战斗。上海的抗战引起了国际的重视，那是日本第一次在中国的阵地战中遭遇到坚决的抵抗。

虽然日本的威胁不断增加，但是中国国内的政治纠纷依然存在，张治中常被蒋介石请去，帮助蒋介石用武力来解决反对南京蒋政权的势力。1933年冬，他率第四路军镇压了福建起义（见《陈铭枢》），又参与了对共产党的第四次所谓围剿。1934年秋，共产党军队从他们的江西根据地被逐出，被迫向西北作大规模撤退，他们到达陕西时只剩下一年前从江西出发的部队的残部。

1935年张治中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当中央军校教育长时，准备在南京近郊新建军校校址，筹设训练部。正当张在筹划此事时，日军对华的压力剧增，这项计划就遥遥无期的拖下来了。

1937年4月，中日战争爆发在即，张治中辞去中央军校教育长之职。7月，战争爆发，张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在淞沪作战，后又短期任军事委员会军令厅长。1937年11月代何键任湖南省主席。他就任第一年，着手提高省行政机

构的效率，改革教育，推广国民党原订的自治方针，增强防卫力量。1938年11月，由于张治中的判断错误，发生了不可原谅的灾难性的湖南省会长沙大火。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了武汉后，中国在湖北重新设防，据一般设想，日军将以极大力量向南推进以打通粤汉路，长沙当被蹂躏。为了实行那时的焦土抗战政策，湖南当局在张治中统率下准备在被迫撤走之前破坏长沙。

1938年11月12日，据当地报告说日军骑兵已到达长沙北约二十公里的集市新河镇，此项消息倘属确实，那末日军随时都可以到达。长沙当局对此既未核实，又不进行调查，慌张地下令烧毁长沙。长沙当时由于各地撤退下来的人很多，人口增加一倍，约有八十万人之多。长沙在熊熊烈火中烧了四天，化为灰烬，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大火灾之一。但是日本军队却并没有来。日军骑兵虽到过新墙河，但尚远在新河以北的新防线之外。身为省主席的张治中为此受到申斥，国民政府对此进行调查，处决了三个长沙的高级官员，张治中“降级留职”。1939年1月，他辞去湖南省主席之职到重庆。

不久，他又出现在大庭广众之前。1940年9月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执行部秘书长。以后有十万知识青年从军，以及建立了军人励志社，其中有张治中的功劳。

1945年对日战争结束，不少军事机构重新调整合并，设立了国防部。由于战争时期张治中对蒋介石的效力，成为他的一名可靠助手，乃任命张治中为甘肃兰州西北行营主任，他力争甘肃知名之士的合作而且颇见成效。张治中又受蒋介石之命去解决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和处理危害新疆当局统治的叛乱。

在抗日战争期间，张治中经常和周恩来有接触。1945年国共摩擦公开化后，张治中以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身份去延安提议和毛泽东谈判，毛不愿。张陪同美国大使赫尔利将军去延安，又于1945年8月底护送毛到重庆和国民党谈判。

张治中不久就脱离了这次无成果的重庆谈判。当时新疆属于西北行营范围之内，那里的中国当局受到由近邻苏联支持的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挑衅。1945年夏，叛军向省会乌鲁木齐进迫，9月初给国民党第二军以致命打

击，显然，中国政府的权力机构受到威胁。张治中即去乌鲁木齐，9月13日通知苏联领事要求立即停火，否则将诉诸联合国。四十八小时内，莫斯科向重庆表示愿为叛军调解。1945年10月11日，张治中回重庆，护送毛泽东回延安，然后又回乌鲁木齐，与东土耳其斯坦叛军三个代表谈判，其为首的一人系阿哈买提江。1946年1月2日协定签订后，张治中又回重庆。

张治中在处理边疆问题后略事休息。以马歇尔为首的美国代表团在中国力图调解国共冲突，1946年1月10日签订停战协定，张治中任执行部军事小组政府方面的代表，周恩来为共产党方面代表，马歇尔为顾问。军事小组在1946年2月14日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议，2月25日达成“整编全国军队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的基本方案”。两天后，又达成执行部实施军队整编基本方案的协议。

1946年3月29日，张治中继吴忠信为新疆省主席，又与伊犁叛乱集团谈判。6月订定补充协定，给予非汉族人民在省府中的代表享有特殊权利以及一系列的文化自治措施。7月，张在新疆正式任职，仍兼西北行营主任。张在新疆采取了联合政府的方式，阿哈买提江和鲍尔汉为副主席，秘书长系国民党人员，两个副秘书长系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张治中又释放了被盛世才监禁的大批共产党人和其他各界人士，烧毁鸦片，减轻税收，并请南京每年提供补贴以弥补预算赤字。他竭力和新疆叛乱集团达成妥协。

1946年夏，中国本部的内战又起，而且影响到新疆。当时在新疆占优势的并不是主张开明处理问题的张治中，而是一批胸襟狭隘的国民党分子，因此新疆省政府的方针往往是故意拖延和阻拦汉族突厥族联合执政的实施，不执行1946年1月和6月达成的协定。

而新疆的所谓少数民族，他们对自治的方案并不感到兴趣，他们要的是实现已经答应给他们的更多的自治权，这样，他们对汉族就他们权利所作的狭义解释就势必表示反对。1947年2月，维吾尔、哈萨克、回族对中国统治发动了新的攻击，重申他们的不满并要求张治中的省政府进一步改善。4月，张治中视察全省，5月回到省政府对各项不满意见逐条解释，他反驳说，省内的不安是由于一些有关集团意图攫取权力而造成的。他认为民主和民族自治是新疆的正当目标，但是必须遵循孙逸仙提出的方式加以实现，而决不是苏联的方式。

他指出，伊犁的叛变集团倾向苏联的主张。

张治中的答复反映了国民党中的保守分子的观点。张治中于1947年5月被免去了新疆省主席职位而代之以维吾尔族的麦斯武德似乎是证实了这一点。麦斯武德自1935年起即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据说他代表新疆地主的利益。那时张治中以西北行营主任的身份仍留在新疆。1947年7月，伊犁暴乱集团又发动新的叛乱。8月，由张治中经数月辛苦努力而达成的联盟瓦解了。

张治中继续和阿哈买提江商谈，但毫无结果。10月，他回到南京，提出了一项新疆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当时，国民政府正竭尽全力同共产党作战，张治中的计划也就被束之高阁了。1948年新疆仍陷于政治僵局，叛乱者又要求免去麦斯武德而代以张治中，特别是突厥少数民族认为张治中是南京提出的人物中最好的一人。1948年12月，鲍尔汉任新疆省主席。苏联支持了伊犁叛乱，在新疆西北部的这一重要地区消灭了中国的政权，但仍与国民政府保持外交关系。1949年苏联当局和中国政府谈判续订新疆经济贸易协定，其目的显然在于保持在那一地区的特殊地位。与苏联谈判初期，张治中曾参与其事。后来，他去担负拯救国民政府政权这一更为迫切的重任了。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新年文告里表示愿意和共产党媾和。在这一文告发布后随即而来的紧要关头，张治中1949年1月7日会见副总统李宗仁，8日由孙科、陈诚陪同，会见蒋介石本人。张又出席了1月16日、19日由蒋介石主持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作出了国民政府的重要政治决策。1949年1月20日，蒋介石引退，李宗仁为代总统。

李宗仁准备请张治中组阁，寻求同共产党和解的方案，张治中则要求有全权进行和平谈判。李宗仁认为他的要求过分，乃由孙科组阁。1月底，张治中回兰州行营，1月31日李宗仁拒绝接受毛泽东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但谈判之门仍开着。2月，一个非正式的公民代表团由颜惠庆率领从上海去石家庄准备谈判和平条件，毛泽东和共产党首领在那里。但是这个代表团毫无结果。

鉴于张治中从前和毛泽东、周恩来有过接触，李宗仁一再函电在兰州的张治中，催请他重新考虑他的决策，以担负起谈判重任。张治中最后同意，回到南京。蒋介石仍在幕后，他的支持者反对张治中的决策。他们认识到，任何和

共产党的谈判成功，就是他们的政治生命的终结；如果谈判失败，他们还不至于完蛋。终于六人代表团组成，由张治中率领。李宗仁宣布，代表团去华北根据毛泽东的八项条件进行商谈，但是代表团无权作最后决定。

1949年4月1日，代表团到达北平，受到冷遇。四年前，张治中到达延安那个简陋的飞机场时，曾受到毛泽东本人和共产党领袖们的欢迎。1949年的冷淡接待说明了毛把他们当作行将灭亡的敌方代表看待。正式谈判从4月5日开始。共产党坚持以毛的八项条件为和平谈判基础，不容变更。共产党同时也将同样的条件递给南京李宗仁，南京方面认为这些条件形同投降，加以拒绝。南京拒绝了毛的条件，共产党军队在4月渡过长江，占领了南京、上海。张治中眼见共产党必胜，就留在北平。这对李宗仁这个摇摇欲坠的政权又是一个打击，因为当时张治中仍是西北行营主任，他指挥的五万多军队在兰州和乌鲁木齐之间布防。

1949年9月，新疆地方政府和在广州的国民政府断绝关系，效忠于共产党当局。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平成立后，任命张治中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他在北京还取得了其他一些名义上的最高地位。同时，国民党当局把他开除出党并下令通缉，而张治中却已安安稳稳地在国民党的控制之外了。他尽个人之力协助共产党巩固西北那一大片地区的控制。1949年10月初，共产党军队进入新疆，几个月后，其势力到达新疆西部、北部的边远地区。共产党放慢了巩固西北地区的艰巨工作，任张治中为共产党在西北建立的地方政权的副主席。由于张治中本人1945年后一个时期在新疆参与复杂的政治谈判，因此他比共产党高级军政人员更为详细了解那里的形势。1949年底，他由共产党将领彭德怀陪同又去新疆，他在乌鲁木齐的一次重要讲演中，要求各界拥护毛泽东的政策和新政府。

由于张治中是蒋介石多年来最信任的军事部属之一，因此1949年张治中投向共产党，是在危急时期对国民党事业的重大心理损失。共产党有鉴于此，所以继续给予张治中以优厚待遇。1954年政府改组，张治中在北京担任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张 群 字：岳军

张群（1899——），国民党中的著名人物，蒋介石、黄郛的密友。1935—1937年间任外交部长，对中日关系起了重要作用。1938—1942年任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长，1940—1945年任战时四川省主席，1947—1948年5月任行政院院长，1954年在台湾任总统府秘书长。

张群幼年经历，知之甚少。他出生在四川华阳县，他读了一些儒家典籍，接受了一般教育后，1906年考入在华北保定的中国陆军速成学校，翌年，该校选送四十名学员去日本深造，张群即其中一人。中国学员在东京进了日本军部办的一所陆军预备学校。1907年，张群和同学蒋介石一起加入了同盟会。张群和蒋介石在振武学校完成预备课后，在日本陆军第十三野炮营见习。

1911年武昌起义后，原在日本各营见习的中国士官生离日本赶回上海，投奔陈其美统率的光复军。张群充当黄郛第二十三师军需官。1912年春，张群在黄郛手下升任营长。张群、蒋介石、黄郛三人结拜为兄弟。

张、黄因对革命有功，被选送去欧洲深造，1912年下半年，张、黄携眷同到北京，准备与陈其美在日本会合一起去欧洲。但是1913年3月袁世凯的亲信刺死宋教仁后，他们就改变了原定的计划，陈其美取消了欧洲之行，和同盟会同人回上海，投身反袁斗争。1913年所谓二次革命中，张群在上海随从陈其美。二次革命失败，张群逃往日本。

1915年，张群在日本士官学校受完军事训练后，去荷属东印度群岛，在爪哇一所华侨学校教书谋生。袁世凯作称帝的最后准备时，张群化装潜回上海，投身反袁运动，充当国民党浙军参谋官。

1917—1918年间，张群在广州岑春煊部下当一名副官。他曾去日本，为广州政府反对日本对北京政府的借款进行活动，但此行未获成功。1918年他回四川原籍，当了两年四川省警察厅厅长，兼任成都警察局局长。1921年，张群离四川去华北，那时，他的朋友黄郛深得徐世昌的信任。张群虽有国民党的背景

和联系，但他却在北方政府中和黄郛密切共事。

由于在北京和黄郛的关系，他进而与冯玉祥有所接触，当时黄郛常常在冯玉祥的司令部里给高级军官讲课。1924年，张群投身于冯玉祥的国民军，冯和吴佩孚开战时，张群在国民军第二军。以后又任河南省警察厅长，开封警察局长。1926年，国民军在河南被吴佩孚等军阀战败后，他转向国民党，参加北伐。张群和冯玉祥的这一段暂短关系，使他又能和蒋介石结在一起。那时蒋介石是北伐军总司令。1926年11月，国民革命军进入江西，张群成为蒋介石驻南昌司令部的总“参议”。

1927年春，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到达沪宁地区后实行清党，张群负责主持上海兵工厂。他和新任上海市长黄郛密切合作，通过国民党外的社会势力，进行政治交易，协调上海工商界闻人和蒋介石的关系，并取得了他们的支持。9月，蒋介石辞职，张群陪同他去日本。他们在东京拜会了首相田中大将等日本重要政界人物，希望从中探悉国民革命军进军华北时日本的态度。虽然田中给人的印象是日本未必会进行军事干涉，但田中认为国民革命军至少目前以稳定南方的地位为妥。

蒋介石回国，1928年初统率国民革命军向北方进军。2月，张群任中央政治会议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会议，是国民党新成立的一个决策机构。张群除主持上海兵工厂外，又当了第一任陆军部政务次长。国民革命军进军山东济南，日方反应强烈，断然声称要保护该地区日本利益。张群去东京，力请田中通过正常外交途径解决济南事件。张群在日本的折冲成就不大，济南事件虽暂时平息，但根本的解决却并无可能，因为山东的日本司令官有意曲解东京发来的有关克制的训令。

1928年9月，北伐结束。张群又被派去日本。他私下告知田中，蒋介石即将就任行政院长，希望日本在东北问题上保持友好态度，对中国的统一事业不加阻难。1929年3月，张群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不久又继黄郛为上海市长。他在1929—1931年上海市长任内，对市区现代化建设颇有建树。

张群协助蒋介石加强在南京的地位，对付来自反蒋的国民革命军将领连续不断的威胁。1930年阎冯联合反蒋，张群、吴铁城去东北游说张学良支持南

京，并反对北方军人。1930年9月张学良以其本人名义进军华北，张群去东北的活动使蒋介石免于在内战中失败，这是蒋介石统一全国的重要步骤。

张群认为，中国困于贫弱和内战，无力单独抗击日本，上海积极抗日的团体对他不满，因此在1931年辞去上海市市长一职。张群成为蒋介石制定一系列政策的一名心腹参谋。国内政策方面，其目的是加强国民政府的地位，使国民政府的实际控制权达到被地方势力和共产党叛乱者统治的边远地区。而其对付日本侵略的政策是灵活的两手政策，不得已时略加抵抗，为避免惨败，除调解外别无他路时则争取局部和平。张群对这一政策的实施作了出色的贡献。1931年冬，他负责主持蒋介石武汉行营政治处，其目的是力求在1932—1933年间拔除共产党鄂豫皖根据地。

经黄郛、张群的推荐，杨永泰成了蒋介石的一名谋士，对他的政策起过很大影响。黄郛、杨永泰是蒋介石身边的保守派政学系的关键人物。1936年，黄、杨先后死去，张群成为国民政府中政学系的首脑人物，他在三十年代和政学系的关系，决定了他的政治态度的基调。

日本人越过了长城一线，直迫北平。一旦北平陷落，则将对南京国民政府沉重的打击，中国的外交政策正经历着严重考验。黄郛负责处理华北局势，1933年5月和日本当局订立了塘沽协定。张群去北平协助黄郛，并与蒋介石的总部保持及时的联系。日本的压力一时有所缓和后，张群自1933年中到1935年任湖北省主席。当时国民政府想要稳定华中，他在湖北所推行的工作有：赈灾、调整税率、促进地方工业、平衡财政收支、巩固机构提高行政效率、选拔县长、召集省议会等。

1935年，日本的压力再度增加，张群离去湖北省主席职务，由杨永泰继任。1935年12月，汪精卫因在南京遇刺受伤，辞去一切职务，蒋介石代汪精卫而为行政院长，张群为外交部长，改变了汪精卫的外交政策。汪精卫采取一种敬而远之、不与直接谈判的政策，而张群则主张和日本谈判，解决主要争端，调整两国关系。1935年初，南京《外交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名《友乎？敌乎？》的长文，是这一政策转变的序曲。张群向东京表示，希望把华北问题作为地方事件进行谈判，中国方面将充分尊重日本在这地区的特殊地位，但该地

区应属于南京政府的全面控制之下。日本政府对此表示同意，因此制止了日本军方成立“自治区”的计划，两国政府的紧张关系一时有所缓和。

张群的主要目的在赢得时间，倒并不在探测和日本签订协定的可能性。1936年5月24日，他在一篇重要的演讲中强调说：中国的政策是一种放任自由的政策。他又说，就日本而论，它倾向于经济合作，不一定在政治上侵夺，因此，就中国而论，一些主要问题可以加以调整，不仅是为了缓和华北局势的一项办法，而在于“保证两个民族世代和平共存的长远目标”。

张群最后同意1936年秋天两国在南京进行正式谈判，他事先约定说，这次谈判只是探索性的。在七次会谈中，日本大使川越茂狡猾地采用拖延战术，既不达成具体协议，也不加以断然拒绝。当中国军队在内蒙战胜日方支持的叛乱时，张群充分利用这个机会，虽未能坚决拒绝，却否定了日本的许多要求，他认为反日和反共都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不容干涉，力求和中国友好相处的日本政府当然不应干涉。长期谈判毫无结果，只处理了两件意外的地方事件。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全国的统一掩盖了这一场外交插曲。接着南京政府改组后，张群辞去外交部长，但他的外交政策还延用了几个月。

1937年7月，日本武装侵犯中国，张群放弃了力求和解或进行谈判的希望，但是作为一个谈判老手，他的才能和声望马上很好地用在处理国内政治问题上。1937年8月，他当上了一个新的决策机关全国军事委员会的秘书长，陈布雷为副秘书长。1937年底，日军进攻南京，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调解，张群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参加谈判。1938年初，国民政府由南京迁至重庆，张群在新改组的国民政府任行政院副院长。1938年1月四川省主席刘湘突然在汉口离奇地死去，国民政府准备以当时任重庆行营主任的张群为四川省主席，四川军人表示反对，结果蒋介石不得不亲自任四川省代主席。1939年1月，张群任新成立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1940年11月任四川省主席，直到1945年对日战争结束。这一期间，他的主要任务是使国民政府在四川的据点巩固安定。

在四十年代，他经常和西南地方军事将领、各小党派头目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接触，取得了他们的尊敬和信任。在战争年代中，他协助处理与不属国民

政府统率的四川地方军的关系，改革四川地方行政，设法成立省参议会。但是，他的成绩并不显著。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群在国共争夺全国领导实权的斗争过程中，充当了一名新的谈判人的重要工作。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来和蒋介石谈判，在实质性会议中，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和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王若飞谈判。经四十天断断续续的谈判，宣布休会。1946年1月，成立了张群、周恩来、马歇尔为首的三人小组，商订国共停战协定。当时，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代表八人，其中包括张群，共产党代表七人，其中包括周恩来，还有其他党派代表十四人，无党派人士九人。1946年1月10日第一次会议，张群、周恩来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是后来并未实际生效。

1946年中，双方谈判破裂，张群去美国，希望广泛接触美国政府官员，因为美国的帮助是国民政府必不可少的。1947年初，他去日本，和驻东京的美国当局以及有重大影响的日本政界人物建立联系。1947年4月，张群在南京新的联合政府中任行政院长，他的施政方针是决定争取和维持美国的支援。他收罗了一些小党派的代表进入政府（当然没有共产党的代表），借以表示国民党已放弃一党专政。他的政治纲领是准备按照1946年国民代表大会通过并于1947年底生效的新宪法建立政府。他的经济政策是：控制物价，稳定币制，整理税则，改革土地，鼓励生产。但是在蒋介石的威权之下，张群即使与蒋交往深厚，他那个院长身份还是起不了作用的，他无力实施他的方针。在军事方面，张群一直希望双方冲突达到一定阶段，政治和解的可能性总是有的。但军事形势不断朝不利于国民党方面发展，政治解决也不可能了。1948年5月，张群辞去行政院长。

张群继续效忠蒋介石，他尽一切努力拯救国民政府，以免彻底垮台。1948年8月至9月，张群以总统府参事的身份去日本，同麦克阿瑟将军以及日本的重要领导人会谈。他在一次对日本人民的广播讲话中，着重指出中日合作对促进亚洲地区安全的重要性。从东京回国后，张群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在1949年初，他曾被提名为与共产党谈判的代表，当时共产党正加强对天津和北平的控制，但是因为1948年12月共产党公布的战犯名单也包括张群在

内，张群未能成为谈判代表。

1949年春，张群飞到重庆考察，研究能否把四川当作国民政府基地，他看到西南局势很不稳固，以此救急已属不可能。1949年11月底重庆失陷，四川肯定保不住了。12月初，蒋介石飞到成都后即去台湾流亡。蒋介石派张群去昆明，希望劝说云南省主席卢汉不要倒向共产党，张群此行全盘失败。1949年12月11日卢汉宣布归向共产党，并拘留了张群。国民党在云南的抵抗力量已全部撤出，但国民党军用机在昆明上空盘旋，并发出警告要求保障张群的安全。12月23日，卢汉释放了张群，他就到台湾去了。

1950年8月，张群任总统府高级顾问。由于他和日本的关系密切，与日本谈判的经验丰富，继续充当蒋介石有关中日关系的顾问。1951年，在由美国主使而又无台北直接参加的情况下，在旧金山签订了对日和约，结束了日本对台湾的统治。1952年4月，日本和中华民国在台北签订和约。张群在1950年以后多次去日本，强调日本和台湾中国政府的新关系，日、台两国政府与美国的联系的重要性，以及两国面临来自苏联的威胁。1957年，张群以蒋介石特使的身份正式访问日本，受到热烈欢迎，当时距张、蒋同在日本当士官生已经五十年了。1964年，张群再度访问日本，企图缓和因日本和大陆中国进行贸易而引起的矛盾。

1954年以后，张群是台北总统府的秘书长。1958年他在台北作了一次引人注目的演讲，他说，人生自七十始。这表达了他的政治目的和个人意图，向人们说明了统治台湾政府的老人不准备放弃统治者的地位。

1965年，他以蒋介石特使的资格访问欧洲，参加在罗马举行的世界基督教会议的闭幕式，12月8日教皇保罗六世特予接见。他对来自各国的中国籍的牧师和教士们作了一次讲演，参加者中有于斌主教。

张群在三十年代成为基督教徒，主要是受他妻子马玉英的影响。他早年所受儒家教育决定他的观点，但自从入教之后，他的个人思想就混杂了儒家和基督教的影响。他有三个儿子，其中张继忠于1961年在台湾受命为南方浸礼会牧师。

张恩溥 别名：张天师 字：瑞龄

张恩溥（1894，10，3——），道教第六十三世天师，生在江西龙虎山。张家以前各代天师，被外国人一般认为是道教的教主，是由公元第一世纪张道陵炼成长生不老丹之后就传下来的。事实上，这个谱系自宋以后可能不确切了，宋仁宗封张千岁于龙虎山，公元十世纪后，张家就在那里主持他们的神职。龙虎山并非什么大山，不过是江西地势起伏的区域内的两个形状奇特的小丘，一个小丘的侧影像一只老虎，另一个像起伏的龙背。张家虽经历了不少变故，但几个世纪以来在江西保留住这个据点不受损害。张家的“诚一”宗是道教的正统，又为历代帝王求长生之术而受到供奉。

清末太平天国席卷华南、华中，威胁到了龙虎山。太平天国是反道教的，他们到了龙虎山进入道观，但劫掠并不严重，古物、财物也未加损坏。六十二世天师张元书生于1862年，正好是太平天国将要终结时。他在1903年承继父业。1904年他去北京庆贺光绪诞辰，得了一些赏赐，唯一见到过六十二世天师的国外作家是卫理公会教士卡尔·夫·喀普，他在1910年2月到过龙虎山。据喀普的记述，张元书是一个“身材高大、仪态清秀的中年人，穿着上等士大夫的日常服装，温文尔雅，和蔼可亲”。辛亥革命后清朝覆亡，有一股反对道教迷信活动的潮流，民国成立后江西的新督军宣布将道教的财产充公，废去天师等称号。张元书有一个强硬靠山张勋，1914年张勋通过袁世凯对此加以干涉。袁世凯下令发还财物，恢复世职，又召六十二世天师去北京觐见。张带着随从离江西的神坛到北京住了两周，他为袁世凯新建的帝制建醮祈福。张元书还有其他一些有势力的支持人如吴佩孚、孙传芳，他们邀张在洛阳、南京做法事。民国初期，他广为游历。1920年他成为道教五字联盟的首领，他曾应美国教士李佳白的邀请去基督教堂讲道。他在1924年死于上海。

张恩溥是张元书六个儿子中的长子。虽非明文规定，但由于惯例，张恩溥幼年时就被父亲视为继承人。他在家中由塾师传授四书五经，受传统教育，一

般都认为熟悉儒家经典便于理解其他古代典籍。此外，他又为未来的神职而受特殊训练，例如习读和诠释教典《道德经》和《文中子》，实习各种天师神职所需的仪式礼节。他除读《道德经》外，还读了有关《道德经》的重要评述。1916年张恩溥二十三岁时授命为“应时”，相当于中国皇室中的继承人。1921年离家去江西省会南昌进了江西省政法学院，1924年毕业。

张恩溥的父亲死后，他继任为六十三世天师，按照前例，这是一个终生神职，他据有龙虎山的财产——五座寺观及其附近的田产——以及一付应杂差、司神职的八十人的班子。田租和香火费是他的主要财源，他的田地 in 清代和民国都是免税的。张恩溥象他父亲一样，有当时一些军阀为护主。例如，1926年初，他应吴佩孚之邀去汉口拜杆建醮。孙传芳又是他另一个护主，当孙传芳控制了长江下游时，六十三世天师得到孙的支持，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上海，指使门徒，承办道场。国民革命兴起，北洋军阀岌岌可危，张恩溥就回到他江西老巢去了。

在江西，他和共产党有了第一次接触。1927年4月2日，当时张恩溥在南昌被领导共产党叛乱的方志敏捕获关进监狱，但未处决。张恩溥被关了几周后，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江西省主席朱培德驱走了叛乱者，将张恩溥释放，他又回到龙虎山去了。1931年2月，江西苏区共产党部队由彭德怀率领占领龙虎山，扫荡了道教的地盘。天师逃走，他的一个兄弟被捕，因其为封建地主而又倡导迷信而被处决。

天师去上海，生活并不贫穷，在上海法租界一个漂亮的地区安逸地生活。他继续履行其神职，在三个道教寺观里发符咒行神礼。1936年夏，他听说江西地区的共产党已经肃清，决定回龙虎山旧地，收回土地，运回转移隐藏在上海的财产。从抗日战争起到国共内战期间，他就一直在那里，过着古老而又华丽的逸隐生活。1949年4月28日，共产党军队跨越长江向南推进的前几天，他离开了龙虎山，经广州和澳门到香港，住在德辅道的云泉观。1949年12月到台湾。国民政府内政部给了他一些补贴，在台北清虚观住了下来，该观属于道教的另一宗派。

六十三世天师在台湾继续积极建立道教组织和传布道家思想。他到台湾一

个月后，被准许在台湾组织道教协会。他宣扬宗教的宽容观点，认为人们一般称为神灵的东西，道教亦称为神灵。他反对道教中那些无知之辈以符咒治病借以敛财的迷信活动。天师又积极响应台北中华民国政府进行反共，1957年4月，曾特地向大陆上的道徒广播，要他们不要误信共产党，不要支持共产党赞助成立的道教协会。同年，他为了和大陆上的共产党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全国性的道教协会相抗衡，在台湾创办了道教善士协会。

六十三世天师在台湾除了在两个道教协会的活动外，还继续他的神职工作，印符咒、发牒谱，拜忏建醮。但是他主要的考虑是想出版一本新的道藏。1923—1927年间，商务印书馆曾影印白云观的明版道藏。他主持这工作，重新发行了白云观道藏，并增添了白云观版本以外的其他重要道教著作。他写了三本未出版的书：《道学源流》、《诚一经集》、《符录学》。

象他的前人和一般道徒一样，除在拜忏建醮时外，他穿着普通服装，过着世俗生活，并不节食禁欲，也不打坐练功，也不呼神召鬼。他自认为是一个学者而并非圣者，他自认是道教的一名卫士。1958年《东方研究杂志》上发表了威尔契写的《张天师和中国道教》的文章，叙述了张恩溥的一生。

张恩溥于1911年十八岁时第一次结婚，其妻于1917年死后，张恩溥于1919年又与妻堂妹结婚。1949年他携长子合法继承人张云贤离开江西，他的幼子和妻子留在大陆。1953年张云贤死在台湾，张恩溥希望有朝一日能与小儿子团聚，以便继承有人。但他终于选定了他在台湾的侄儿张元贤（系张恩溥小叔父的孙子）为天师继承人。张元贤生于1937年，准备在1959年继承六十四世天师之位。后来，据说他改变主意，放弃这个神职。

张尔田 原名：张采田 字：孟劬 号：遁堪 许村樵人

张尔田（1874，3，17—1945，2，15），学者教授，以著述历史而闻名，其中有《清史稿》中的一些篇幅。这是1928年出版的一本清代历史的未定

稿。他还有有关蒙古史的研究著作。

张尔田，浙江钱塘人，出身于一个累世诗书之家。青年时受教于名学者门下，早年就有文名。他捐得国子监监生，应顺天府试中举人，任刑部主事，清末任江苏省某县知事。

1912年初，清室覆亡，民国成立，保皇派张尔田去职引退，专心著述。他潜心儒家传统，1913年康有为门生陈焕章成立孔教会，力争以孔教为国教，张尔田为该会会员，经常为《孔教杂志》写文章。这几年中，他大力反对“自由派”梁启超等人的主张，他在小册子《新学商讨》上批驳自由派的观点。他又写了几篇文章，宣扬传统学术的价值，先后在《大公报》和学术杂志《学衡》上发表。

张尔田是一个儒家佛教学者，但他的主要精力却在中国历史。他的历史学奉清代章实斋浙东学派为典范。1911年出版《史微》，他恢复和发展了章实斋视野广阔的历史学。这本书使他在国内和日本获得了学者声誉。他另一本值得注意的历史著作是有关唐代诗人李商隐（约813—858年）的研究。在清代有些学者研究李商隐生平，认为他就是玉溪生，但是从他的诗篇编年中并不能得到证实。他编订注释了这些学者的著作，1917年出版了《玉溪生年谱会笺》。

1914年9月袁世凯创立清史馆，赵尔巽为主编，请张尔田为纂修，他任此职直到1921年。在这七年中，他为清史稿撰写了《乐志》、《刑法志》、《地理志》中的江苏省部分、《图海、李之芳列传》以及《后妃传》。1928年《清史稿》出版后，他发现其中有些最后的修改，与稿本原意大有出入，改动最多的是《后妃传》。张尔田对这篇著作特别重视，因为他自认为这是他的文才史识的代表作，所以在1929年依原稿本出版。

当代和张尔田具有同样政见和学识的人中有王国维（见后）和孙德谦（1839—1935），三人并称为“海山三子”。他又与前辈学者官吏沈曾植（1850—1922）友好，1915年沈曾植请张尔田等学者协助编修《浙江通志》。沈对蒙古史颇有研究，身后遗有这方面的存稿，此后数年中，张尔田为了诠释这些遗稿，出版了《蒙古源流笺证》、《蛮书校补》和《元朝秘史注》。

张尔田由于和沈曾植的关系，对辽金元史发生兴趣，研究了清代学者辽金

元史研究的开创人钱大昕的著作，并写就《钱大昕学案》一书，对钱的观点加以评述。这一著作后来收集在徐世昌主持编纂的《清儒学案》中。

1921年后，张尔田先后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学和上海光华大学中国史教授，最后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教，先在中文系，后在燕京哈佛学社研究部。1937—1945年中日战争期间，他一直在北平，1945年2月15日去世。

张尔田还著有许多短文，有些文稿存在家中，战争期间逸失。但有百余篇由他学生保存的文章经编订于1948年出版为《遁龕文集》。从文风来说，他的论文比同代人刘师培、王国维的文章更受欢迎。

张尔田两次结婚都无子嗣，后以他幼弟张东荪的长子为嗣子。

张发奎 字：向华

张发奎（1896——），广东军界领袖，铁军第十二师师长，后以统率第四军闻名。他虽曾支持过汪精卫反对蒋介石，但中日战争时蒋仍委以指挥重任。

张发奎粤北始兴县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他父亲张居之因耕种难以度日，在县衙门里找到一个录事（书记）的差事，因此才能供他儿子上学。张发奎在十二岁时去县城高小上学，1910年十五岁时，因顽劣不驯被开除出校。

1911年，张发奎离家去广州，在黄埔纺纱厂做工，这时的反满起义引起张发奎的注意。1912年民国成立，张发奎进入黄埔初级军校。学校校长邓铿对他很喜爱，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1914年毕业后，张发奎去武昌入陆军预备学堂。

1916年袁世凯称帝，南方各省起兵讨伐，张发奎离武昌陆军预备学堂到广州加入了军队。他和薛岳一起都在邓铿、朱执信部下，从事各种革命活动。

1918年夏，孙逸仙由广州去上海前，组织粤军由陈炯明指挥。为了避免和广西军阀公开冲突起见，孙令陈炯明率军去福建。该军由邓铿任参谋长，张发奎隶于邓铿部下。

1920年，粤军返回广东，逐走在广州的广西军阀。1921年孙逸仙回广州，

就任非常大总统。粤军扩编，参谋长邓铿又兼第一师师长，张发奎为营长。后张发奎营扩编为保护孙逸仙的警卫团。

1922年邓铿被刺，这是陈炯明叛乱的先声，张发奎失了至友和恩人。1922年6月16日凌晨，陈炯明部包围孙逸仙广州大本营，当时张发奎和他的部队在孙逸仙设立北伐指挥部的韶关，因此未遭陈炯明袭击。效忠孙逸仙的各部队进入江西，那里陈炯明的军力极强，乃又转向福建，张发奎未能随同前去，率军驻于粤北始兴。

忠于孙逸仙的梁鸿楷继邓铿任第一师师长，一师避驻江门，梁召张发奎前往。1923年粤军第一师改编，其中张发奎原部极多。孙逸仙得到桂滇军队的援助，陈炯明被迫撤出广州，转移到他的老家东江地区。孙逸仙任命梁鸿楷为第一路讨逆军司令，第一师参谋长李济琛升任师长，张发奎任该师独立团团团长。

1924年军队进一步改编，张发奎任第一师第一旅的一个团长。该旅旅长是陈铭枢，该旅另一个团长是戴戟。第一师击败北京政府企图用以反南方政府的桂系军阀沈鸿英，又在1925年于东江之役最后击败了陈炯明，不久又击败刘震寰、杨希闵的桂滇各军。

1925年7月，国民党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8月，国民政府统率的各军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以旧第一师为骨干的粤军改编为第四军，军长李济琛。第四军是改编后才出现的番号。张发奎任独立旅旅长，该旅不久扩编为第十二师。四军初编时，军长为李济琛，四个师长是陈铭枢、陈济棠、张发奎、徐景唐。

1926年国民政府开始北伐，蒋介石统率全军，李济琛留守广州后方。四军四个师中，陈铭枢第十师和张发奎第十二师随军北伐。这两个师任先头部队，1926年7月插入湖南。1926年8月29日，张发奎最后占领了汀泗桥，接着又拿下了战略要地贺胜桥。这两次战役，大大打击了敌人吴佩孚的士气，张发奎师获得了“铁军”的称号。

攻占武汉地区之后，陈铭枢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下隶三个师，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第十九路军。张发奎除原属第十二师外，又加第二十五师，扩编为第四军，号称“铁军”。

在称为北伐的第二个阶段中，张发奎率军由武汉北向进攻开封。冯玉祥投向南军，河南全省落入国民政府之手。张发奎回师驻军武汉。当时国民党内部武汉、南京两派冲突日益明显。陈铭枢因反对武汉离开了军队，张发奎乃同时统率第四、第十一两军。

武汉政府任唐生智为总司令，1927年夏，武汉、南京的分歧几乎要用武力解决，张发奎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统率四军、十一军，还有第二十军。

当时，张发奎被怀疑为共产党人，至少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但未能证实。他的部队中确有一些知名的共产党人和同情者。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是郭沫若，叶剑英是四军的参谋长，张云逸是二十五师参谋长，周士第是团长。在第十一军中，叶挺是二十四师师长，第二十军是由贺龙指挥的。

张发奎由武汉率军东进，1927年7月他的一部分部队到达南昌。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武汉政府开始清除共产党。1927年8月1日，二十四师师长叶挺、二十军军长贺龙发动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并迫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参加。以后这一天被称为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诞生的日子。

张发奎当机立断，纠集余部，其中包括四军的十二师、二十五师，十一军的二十六师迅即向公开承认为共产党人的起义军进攻。他们未能抗击张发奎的进攻，撤出南昌，向南方转移，蔡廷锴在中途脱离，率领第十师转向福建。

1927年10月，张发奎率部回广州。11月，李济琛离广州去上海参加会议。讨论国民党的重新统一问题。张发奎在广州发动政变，发表宣言反对南京国民党召开弥合党内分歧的特别会议。国民党认为这是一次公开叛变，下令通缉张发奎和四军军长黄琪翔。

桂系军队和忠于李济琛的粤军反对张发奎向广州进军，其中有陈济棠和重新统率第十一军的陈铭枢。张发奎分兵东西两翼抗御。在这关键时刻，留在广州的军官教导团团长叶剑英率领共产党人于1927年12月11日成立广州公社。张发奎、黄琪翔逃到河南小岛，迅即纠集第二十六师和薛岳的第一教导师赶回省城，三天后将共产党的起义扑灭。

李济琛的部队集中到广州，张发奎终于失败，退到粤桂边境。张、黄公开声明对广州的惨案承担责任，并宣布脱离军队。第四军由缪培南统率，参加了

1928年北伐的最后阶段，当时四军归第一集团军，由刘峙统率。

张发奎离广州后，去日本略事休息。北伐胜利结束后，国民政府实行裁军，编军为师。第四军缩编为第四师，仍以缪培南为师长。1929年8月初，缪培南辞职。当时南京方面正在讨伐控制武汉地区的李宗仁、白崇禧桂系势力。张发奎回国后又任第四师师长，蒋介石并任命他为右翼讨伐军司令，意思是除第四师外另又增加他的军力，由张全权指挥第十师、第十一师。5月，他于沙市击败桂军后攻占宜昌。

四个月后，1929年9月，张发奎又与蒋介石破裂，发动一次称为保卫国民党的运动，率军由宜昌到湖南，准备回广东。几个月前和张发奎苦战的李宗仁，这时转过来支援他。第四师和桂军联合攻打广东，1929年12月向广州进军，不久被陈济棠击败，张发奎和他的盟友撤到广西，着手改建整编他的部队。

1930年春，以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为主组成反蒋联盟，举行所谓1930年扩大会议运动，也有人称之为阎冯联盟。张发奎得到李宗仁的帮助，扩编他的军队为两个军：四军和七军。

张发奎、李宗仁声援北方阎冯联盟，1930年5月进军湖南，6月径直到了岳阳，但被来自南京的强大部队击败，7月乃从湖南撤往广西桂林。不久，阎冯联盟瓦解，李宗仁、张发奎把军队驻留在桂西。1930年10月击退滇军入侵。

1931年春，南京当局对广西的问题尚未解决，一个新的反蒋联盟又出现了。这个以广州为基地的新的运动为蒋介石所觉察，于1931年3月逮捕胡汉民。5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四个监察委员弹劾蒋，陈济棠、李宗仁、张发奎又重新合作，并以他们的两广军队为武力后盾支持1931年5月在广州成立的分裂政府，汪精卫、孙科、陈友仁、唐绍仪是这个政府的政治首脑。

1931年9月，日军侵占东北，南京、广州又言归于好。在南京、广州同时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张发奎当选为党中央监察委员，此时，张脱离军界。1932年夏，政府颁发一笔奖金给张出国游历。1932年11月12日张离国，遍游欧美、东南亚各地。

1935年，政府召回张发奎，任命为司令，负责皖浙赣闽边境地区军事。当

时，共产党已撤离江西根据地，国民政府反对共产党的军事行动的重点已转移到西北。1937年初，张发奎任苏浙边区绥靖主任，他的主要任务是在该地区筹建防御工事，以应付可能出现的大规模的日军侵略。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张发奎在淞沪一带指挥第八集团军，他设司令部于黄浦江东滨的一个小岛上对抗日军，为时三月之久。上海失守，张发奎撤至江西。1938年保卫武汉之役，他指挥第二集团军。

武汉、广州失守后，1939年张发奎任第四战区司令，设司令部于战时的广东省会曲江。张担任此职至1945年。1939年底，他在粤北与日军苦战获胜。1940年移司令部至广西柳州，是年年底，他收复广西的南宁、龙州和粤南的边防城镇廉州。南方的战局一直到1944年都比较稳定。1944年10月，日军开始新进攻，指向广西，11月初，张发奎稍加抵抗便撤离桂林、柳州，转移到百色，大批装备都已遗弃，给养和药物十分困难。

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接替史迪威将军指挥驻华美军后，到任后的任务之一是给张发奎的被打垮了的部队重新加以装备和训练。在中美军事合作计划中，张发奎任第二方面军司令。1945年5月，日军开始从华南撤退时，张发奎指挥的四个军中，有全部美式装备和训练的新一军。随着日军的撤退，1945年7月准备在印度支那进行局部反攻，责成张发奎攻占广州湾。5月26日，从少数日军后备队手中夺回南宁，四十六军和六十四军追赶撤退的日军。原子弹投到日本本土，日军投降，8月12日美国防部撤消了向广州湾进军的命令。

张发奎在战时的另一个作用，是他对促成越南革命党和越南共产党的联合施加了政治影响。其实这对他是很不相称的。1941年春天，有一批越南革命党人在越南边境广西南部的小城镇开会，组织越南独立革命联盟，简称为越盟。越盟是一个越南共产党和各种非共产党组织的联盟，它的宗旨是在印度支那开展抗日运动。一位老练的共产党人阮爱国（胡志明）是越盟的主要人物。他们在中国领土内的过激宣传和政治活动，促使张发奎在1942年8月到1943年9月逮捕监禁了胡志明。

由于鼓励抵抗日本对中国有利，张发奎和重庆国民政府当局同意与国民党有联系的越南革命党人阮海东的要求，支持越南流亡者的事业，1942年夏在广

西的越南人集中在柳州附近训练，张发奎的第四战区干部训练班也在那里。1942年10月张发奎授意在柳州开会组成越南革命同盟，举阮海东为首领，由张发奎负监管责任。

重庆的主要目的原是利用越南革命同盟搜集印度支那的情报，但他们对这一工作做得不力。国民政府乃重新考虑越南共产党的情况，认为越南共产党人可能成为更为有用的同盟者，而印度支那共产党是可以加以利用和控制的，所以张发奎就在1943年9月释放了胡志明。越盟加入越南革命同盟，收集情报的工作有显著改进。但是在中国的越南人内部的派系经常发生纠纷。同时，驻昆明的自由法国军事代表团，对越盟的反殖民主义的运动日益关注。1944年3月底，在中国方面的授意下，越盟又在柳州开会，决定成立越南临时共和政府，以胡志明为首领。张发奎认为他能控制这个新组织，重庆方面也认为这项安排可以使中国的势力替代印度支那的前法国势力。

但是张发奎的军队被1944年底日军的进攻所击溃。1944年10月，胡志明任命他的副手武元甲统率越南游击队，该游击队于1944年12月22日在东京湾组成。张发奎可能觉察到越盟的真实性质，但据说他并未向重庆国民政府当局报告胡志明即著名共产党人阮爱国这一事实。不管怎样，张发奎总认为战后只要国民政府在中国当权，日本和法国的势力从印度支那撤走，那末富饶而矿藏丰厚的东京湾当然是在中国势力范围之内。由于国民政府的这种设想和其所采取的政策，使得越盟在战争期间在越南创建了第一支有效地抗击日军的武装力量，在当地人民中开展宣传活动，他们的抗日活动受到人们的赞扬。1945年8月，越盟占取河内，在盟军面前造成既成事实。这个组织继续打破了战后法国在那里重建殖民统治的打算。

1945年，张发奎任新建第二方面军司令官，他受命沿西江东下占领广州，1945年9月完成。张发奎接受广州地区日军正式投降，任广州行营主任一直到1949年，在此期间，他曾一度任中国陆军总司令。1949年6月，他退休移居香港，得到香港当局的尊敬和优待，因为其中有好些人是同他在抗日战争时在华南一起共事过的。

1950年初，中国共产党控制了大陆，蒋介石及其随从人员迁住台湾，张发

奎常被视为是香港第三势力的首领人物。第三势力的活动是短命的。与此同时，李宗仁到美国去，声称继续行使代总统的权力，任命张发奎为陆军总司令，张发奎却公开声明加以拒绝。

经过短促而不幸的投身于第三势力之后，张发奎经常表示继续效忠台湾政府坚决反共。但是1960年台湾即将进行总统选举时，张发奎和青年党左舜生等其他社会名流在香发表声明，反对蒋介石连任第三届总统。他们声称只支持1947年宪法，该宪法规定蒋不得连任三届总统。这项声明未被看作是张发奎反对国民党和蒋介石个人。

1960年秋，张发奎去美国，受到纽约和其他地区华侨团体的热烈接待，当时他是香港广东客家“宗敬”协会会长。1960年10月10日在纽约“宗敬”协会举行的欢迎午宴上，他发表了一篇激情的演讲，要求海外华侨拥护台湾，表示深信反攻大陆必将最后成功。这篇演说使听众深为感动。两周后，纽约华侨代表再次设宴招待，张发表了同样的讲话。不断传说张发奎将出任台北政府要职，但他一直住在香港未去台湾。

张发奎是国民革命军中的最能干的将领之一，尤以他在北伐战争中的战功和严于军纪著称。二十年代后期，他的部队中有不少共产党人，他本人则竭力避免被认为属于共产党。他在早期经历中，视邓铿为他的恩人，以后他与汪精卫和改组派结合，这是他反蒋活动的根源。抗日战争时，汪精卫去南京投降日本，他就和汪精卫没有联系了。共产党在大陆取得胜利后，他除了在五十年代初曾卷入第三势力的活动之外，力图避开政治。

张学良 字：汉卿

张学良（1898—），一般称之为少帅，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在1928年从他父亲那里接过了对东北的控制权。1936年，张学良在西安拘捕蒋介石，促使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成立抗日统一战线。张后入狱，又遇大赦，但是他被蒋

监禁，一直到政府迁往台湾。

张学良是张作霖的长子，出生于辽宁海城。张学良早就准备从军，自奉天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十九岁时就在他父亲军队中服役。1919年升为校官，充当他父亲随身警卫部队营长。第二年充任前东北总督现任总统徐世昌的副官。

1920年直皖战争，张统率奉军第三混成旅在华北参加零星作战。1920年北京政府升任他为旅长。1921年张学良去日本参观日军秋季军事演习，回国后，他提议在奉军中进行改革，他的建议得到了采纳。1922年直奉战争中，张担任了重要角色，战争结束，当了奉军第二军军长兼奉天讲武堂校长。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张统率奉军第一军，在长城之役立了战功。奉军获胜，段祺瑞在北京恢复了他原来担任最高行政长官的地位。1925年段派年轻的张学良去长江下游一带协助处理该地区政局。张率领二千奉军，以维持治安的名义于6月中旬到了上海，那时正当英国巡捕枪杀中国工人的五卅事件发生后不久。张学良此行被认为是违反1925年2月结束江浙战争的停战协议，孙传芳于是立即加以反击。张学良回到北京，当上了北京军事学院院长。他名义上仍是奉军的一名司令，实际上他的部队则由他的亲信郭松龄指挥。

1925年11月和12月间，郭松龄和冯玉祥联合反张作霖。郭松龄倒戈虽失败，但是张作霖的地位一度岌岌可危。张大帅对他的儿子大为恼怒，决定予以惩处，经他的一些老将如张作相求情才得宽解。张学良虽仍担任指挥之权，但是失宠于他的父亲了。1926年春张作霖、吴佩孚联军攻打冯玉祥国民军时，张学良统率第三军作战。1926年12月北方军阀组成安国军，以张作霖为总司令，阻击从南方誓师的国民革命军的进军。张学良率领了一部分安国军在1928年4月迎击国民革命军，那时北伐已到了末期了。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暴亡，安国军失败，这对张学良的经历是一个大转折。当时张学良仍带军在河北，未及时得知他父亲的噩耗，这个噩耗保持了两周秘密。张宗昌、褚玉璞指挥的直鲁联军失败后，继奉军之后撤退到山海关。张学良、杨宇霆在滦州商讨对策，决定张学良回沈阳，杨宇霆在关内监督撤军关外。1928年6月17日张到沈阳，6月21日宣布张作霖死亡的消息。

东北首领面对着选择统率张大帅在东北的地方势力的继承人的问题。最合

适的人选是张作相和杨宇霆，一个是吉林督军，一个是张作霖的参谋长。张学良最初主张由张作相任东北军总司令，但张作相拒绝了，并支持张学良。1928年7月4日，张学良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兼沈阳东北大学校长，开始了张少帅的统治。当时一般人都认为他是个无所作为的青年，而且他又吸毒成癖。

1928年7月中旬，在华北的全部东北军队撤到了东北，但是张学良在东北的地位仍未稳固。张学良继位之后，还没有察觉到张作霖之被刺是由日本策刺的。他当时面对着这样的问题，即对日本和对南京的新国民政府应建立怎样的关系，同时在他的地盘范围内还要对付争权夺利的敌对势力。

1928年夏，沈阳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在促成张学良同日本接触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6月底，少帅和顾问们商议后，决定采取对日友好的政策，但是公众舆论却倾向沈阳当局应与节节胜利的国民革命军达成协议。南京国民党当局派使者去东北商洽政治协议。张学良和南京代表谈判，准备以维持他在东北的权力、任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并把热河划归他统治为条件，而宣布他忠于新的国民政府。这次谈判达成协议，国民政府的旗帜自1928年7月22日起在东北升起。

7月19日，南京方面通知日本政府：1896年和1903年的条约期满后作废，此后日侨应受中国法律的管理。日本加以拒绝。而在沈阳，林久治郎警告张学良，反对他和南京联合。不久，田中首相又用尽心计地提出警告。当时日本林权助男爵，表面上是代表田中首相参加张作霖的丧礼，实际上携有田中书信。田中的信表明日本反对东北和中国本部联合统一，并指出张学良本人倘要开发东北，也就是东北自治，那末日本将提供顾问和其他的援助予以支持。林权助在8月6日转递了这封书信。

四天后，在沈阳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决定：7月间中断的与南京的谈判，三个月内不能复会。但张学良在8月中旬派代表去南京、上海与国民政府进一步谈判。

1928年10月，田中首相确切得知张作霖被刺死的责任在日本关东军。当时张学良对此事已经非常怀疑。1928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张学良虽未承认它的合法性，但南京政府已委任他为国民政府委员、东北政务委

员会主席，又规定热河归由沈阳当局管辖。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向国民政府表示了沈阳当局的忠诚，在沈阳升起了国民政府的旗帜。在此之前，12月20日，南京方面认可了张学良这个地方政府的所有高级官员。日本政府又一次提出警告，但一时尚无其他行动，显然日本政府企图通过杨宇霆来控制张学良。杨宇霆有时候很看不起张学良，把他看作是一个政治暴发户而又虚弱无能的人，因而背着张学良去进行谈判。张学良从郭松龄对他父亲的反戈事件中懂得过分的信任会遭到政治上的惩罚。1929年1月10日，他以请杨宇霆和他的亲信东北铁路总办常荫槐宴会为名，把他们枪毙了。张学良对东北的实际统治乃得以建立，国民政府的权力通过张学良伸展到了东北，南京任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总司令。

此后多年，张少帅很受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的影响，他们是在1928年12月认识的。另一个对他有影响的顾问是张大帅的老朋友顾维钧，他在1929年才到沈阳投效少帅。张学良象他父亲那样，还用了一些日本顾问。张学良制定的方针，那些是受顾问的影响，那些是他自己的决定，这是很难辨别的，但是他的顾问班子无疑是很重要的。

1926年和1927年间，张作霖曾在东北和北京进行反苏。1927年12月，国民政府中断了中苏关系。1929年南京、沈阳又联合反对苏联在东北的势力，此举在5月间进行，军警袭击了哈尔滨苏联总领事馆，逮捕了几名中国人。7月1日，东北当局抢夺了中东铁路，驱逐了苏联职工。苏联政府立即要求恢复原状并不断进行威胁。中国当局一再延搁，并继续占据中东铁路。11月中旬，苏联采取了军事行动。南京指示张学良争取和平解决。12月22日订立《伯力草约》，维持原状。

国民政府以后所遇到的窘境，张学良的行动是很有影响的。一时间，以阎锡山、冯玉祥为一方，以蒋介石为另一方，这两种势力在华北引起了一场政治争斗，阎冯又进一步在军事上得到李宗仁的支持，在政治上得到汪精卫的支持。1930年6月，局势危急。当时，张学良处于关键地位，双方都拉拢他。南京派出政治代表争取他的支持，于6月21日任命他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张学良并未允就，拒绝了这个任命。1930年8月，华北的反蒋叛军筹划成立新政

府，其中也有张学良的名字。张公开否认他策划另设政府，并声明盗用他的名义一概无效。双方军事冲突加剧，很明显，北方联军唯有指望得到张少帅援手。当时激烈的战斗狠狠打击了反蒋军，张仍袖手旁观，最后北方反蒋联军终于溃败。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公开文告呼吁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他想以此表示他政治上的谨慎从事而从中得到好处。他把十万部队从东北调到平津地区，此举并未遇到意外，看来好象与华北的地方军阀事先已有协议。他又把河北的省会从北平迁到天津，控制了平汉路和津浦路北段。他名义上把天津关税交给了国民政府，实际上又约定关余必须支付给他。如果说张学良坚持克制态度，不在北平建立一个南京的敌对势力，到不如说他已成功地在这一地区把南京的权力排除在外。

张学良的东北边防军拥有四十万兵力。1930年9月，国民政府从政治现实情况考虑，又委任张为全国陆海空军的副司令。10月9日，一个隆重的张学良就职仪式颇有意味地在沈阳举行。1930年11月，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会，张学良并非委员，却受“特别”邀请参加此会。蒋张之间的协议范围进一步扩大，张当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他以平定河北南部反对南京的石友三的叛乱作为报答。

张学良既不考虑日本早先的警告，也不考虑1929年苏联军事行动的严重意义，而以南京为靠山，采取他父亲反对东北日本势力的拖延战术的老办法。1929年1月中，日本要求他把1928年5月和张作霖签订的有关铁路协定付诸实施。张学良向蒋介石请示，蒋介石指令不予理睬。日本方面责备张学良延搁不决，他就把问题推给南京；当日本方面想在南京处理，南京方面就答以应先从地方解决，这成了张学良和南京方面的惯用手法了。当时，东北方面大事建设，由荷兰公司投资在南满葫芦岛修建军港，以与日本控制的大连港对抗，同时又着手收回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

1931年6月发生了所谓中村事件：中国军事当局把一个日本参谋官和他三名随员以间谍罪处决。中国政府采取一贯的推诿责任和拖延的手法，一时保守秘密。接着发生万宝山事件，在朝鲜发生了反华运动。中国内地则发动运动抵

制日货。1931年8月，日本政府最后公开了中村事件，显然，它准备从中取得政治上最大的收获。

张学良一度不关心国家大事，沉溺于北平的社交生活，是北平国际活动场所中的一个活跃人物，当时意大利驻华公使的老婆、墨索里尼的女儿爱达齐亚诺伯爵夫人是他的亲密伴侣之一。张学良在北平和北戴河过着愉快欢乐的生活，以后生了一场伤寒病。病愈之后，他才发现对付关东军的威胁再采取延搁的手法的严重后果。他命辽宁省当局重新调查中村事件，又派日本顾问去东京向日本政府当局表示他希望友好处理。

9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准备把中村案件提交国联，并于15日谴责日本，说日方对万宝山事件及中日关系的后果应负责任。南京的鲁莽声明使情况更为复杂，关东军中的主战派立即着手部署，发动满洲事变。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制造沈阳事件占领了东北。

当时，张学良的东北边防军一部分驻在华北，有一些部队在长城附近的锦州。而他的东北军的大部分则仍在东北，抵抗数量上处于劣势的日本军队。但是作战方针却要取决于南京，并不取决于当地司令官。蒋介石命令张学良采取不抵抗政策，在日军进袭之前全部撤退，声称中国信任国际联盟。中国在东北的防守不过做做样子罢了，东北军一部分溃散，一部分投降日本，一部分撤到苏联，留下的都退入关内。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与张学良有个人来往，把张在沈阳寓所的家具物件妥善装箱运到北平。

张学良经过这一次东北危机，大大损害了他的声誉，南京的宣传机构并未为他洗刷。1931年11月，他失去了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头衔，12月，又免去他在国务会议的职务，而当了一个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1932年3月由日本操纵的伪满洲国成立，张少帅的地位进一步贬低。8月15日，南京接受张辞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一职，任北平绥靖主任。这一切都不能弥补少帅在故乡所遭的损失，也不能恢复他在中国政治军事生活中原有的地位了。1933年2月日军进犯热河，威胁内蒙，南京政府当局未遣一兵一卒抗击日军，而全国的舆论攻击目标却以张学良为主要对象。张学良在重重压力下，1933年8月在保定把他仅存的残余部队交给了蒋介石，蒋乃任命他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常务

委员，这不过是让他留在蒋介石眼前以便在南京加以看管而已。

张学良准备出国旅行，这是中国失意头领们常见的出路。张学良1926年就开始吸毒，起先是鸦片，后来是吗啡，经端纳大力催逼，最后进上海的一家医院戒毒治愈。1933年4月，他率领一批颇为可观的私人随从乘意大利“罗西伯爵”号轮船去欧洲游历。随员中有张的妻子，私人秘书赵四小姐，四个儿女，端纳，美国顾问爱尔德以及护士、佣仆。他在欧洲度过了几个月，对意大利、德国很感兴趣。1934年1月回国，他的健康情况大有好转，他的爱国思想也大为加强。

蒋介石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加紧他从1930年开始的对共产党的军事镇压。1934年2月，张学良任鄂豫皖剿共副司令，司令部设于汉口。12月，跟随张学良六年之久的端纳到蒋介石那里去当私人顾问了。1935年5月，东京向南京提出有关华北的一系列要求，蒋介石又一次向日本屈服。因此，蒋介石把从前张学良统率的东北军从华北调到西北，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共副司令，司令部设在西安，张从属于蒋介石的亲信蒋鼎文。

1935年秋，张在陕西对共产党军作战，丧失了两个师。东北军在自己家乡沦于日本占领的情况下，很不愿对中国自己人作战。1936年6月，他遇见了共产党领袖周恩来，显然，周使张相信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的现实性，双方达成了秘密协定。自1936年春以后暂停的军事行动现在完全停止了。双方建立了经常联系，8月，张学良任用了一名所谓非正式的共产党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约定，如有任何行动必事先互相通知。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在西北成立了许多民族解放同盟的分支机构。

张学良背离蒋介石的方针，南京方面并非毫不注意，但是很明显，张参加统一战线到何等程度，蒋尚未确知。蒋仍然打算利用东北军再次进军，以消灭西北的共产党军队。这个策略是为了消灭共产党和削弱东北军而加强蒋介石的地位。1936年10月底，正当日军进迫绥远的时候，蒋介石到了西安，商量立即对共产党进军。当时张学良提出停止内战，建立抗日联合阵线的主张，蒋介石严加拒绝，回到洛阳行营，张学良赶到洛阳受了一顿严厉的训斥。1936年12月4日，蒋又去西安宣布对共产党的总攻要在12月12日开始。张学良和陕西省

绥靖主任杨虎城再次提出上述主张，但毫无成效。事实很明显，蒋介石要宣布蒋鼎文为剿共司令而把所谓叛逆部队东北军调到华南改编。

张、杨和东北军将领商议后，1936年12月12日，举起叛旗拘捕了蒋介石，并提出八项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共产党的内战必须停止而成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南京国民政府必须改组。12月14日，从西安发出公告，建立包括东北军、西北军和共产党军队的抗日联军。叛军中有一些人主张枪毙蒋介石，张学良则比较缓和，希望通过谈判迫使蒋接受所提条件。12月15日，由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达西安，他们携有莫斯科主张保持蒋介石为中国领袖的通知，从此谈判出现了新的形势。从南京方面来的，有端纳于12月14日飞到西安，12月20日宋子文，12月22日蒋介石夫人也到了西安。最后，蒋介石接受了叛乱军要求的主要条款，但并未签字。1936年圣诞节释放了蒋介石。少帅本着一付侠义心肠伴送了他手下的俘虏回南京。蒋介石一行坐飞机先到洛阳，他为了挽回面子，在洛阳发了一个通电训诫杨虎城及正和他同行的张学良。

张学良在南京被提交军事法庭。1936年12月31日宣判十年徒刑，褫夺公权。1937年1月4日获大赦，但附有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严加监管”的条件，该会委员长系蒋介石。1937年3月东北军代表团去蒋介石的老家溪口看望张学良，要设法恢复张学良的自由，在那里见到宋子文、何应钦、陈诚和蒋本人，但没有结果。中日战争爆发后，日军步步进逼，张学良亦由浙江而安徽、江西、湖南，最后到了贵州，在那里拘留到战争结束。日本投降后，国内猜测因为国民政府需要巩固对东北的控制，张学良可能获释，但结果并无此举。1949年1月李宗仁任代总统，上任后第一步行动之一是下令释放张学良。

但是，那时张学良已移送到台湾继续监禁，先在新竹，后在基隆，约1956年移到离台北八里的北岚温泉。张在长期监禁中，专门研究明史。有一些人访问过他，东北的政界元老人物莫德惠偶尔也去探望。张学良皈依了基督教，常到台北附近一个小教堂去做礼拜。1961年9月1日台湾当局正式宣布少帅重获自由，据传他在台北郊区隐居。当时，他的长女张明英和她的丈夫陶鹏飞从美国到台湾来探望他。显然，张学良不能自由自在地离开台湾，他仍在蒋介石的

监视之中。同样很明显的是，他不能自由地发表他对1937年前这个中国处于政治危急时期的全面的独立见解，在这一时期中，他担当过主要角色。

张学良在监禁期间，他的第一个老婆于凤至和她的儿女们住在美国，在长期监禁中奉侍他的伴侣是赵四小姐，生了一个儿子张骏。1964年7月4日他们在台湾结婚，由一位美国传教士主持了基督教的婚礼仪式，张群和十来个宾客参加了婚礼。住在南加里福尼亚的于凤至对赵四小姐的耿耿忠心深为感动，因此解除了她和张学良的夫妇关系。

张 勋 字：少轩 号：松寿

张勋（1854，12，14—1923，9），军阀，以他那失败了的1917年复辟活剧而闻名于世。

张家世代住在江西南昌以西奉新县的一个乡村里，张勋在那里出生，家里很贫穷，1861年太平天国窜犯他的家乡之后更其窘困了。张勋十岁时父母双亡，不得不自己谋生。这一期间，关于张勋的情况无从确知，只知道他曾充当童仆，以后流浪到福建、湖南去了。1884年中法战争发生时，张勋正在长沙，他投入湖南巡抚潘鼎新的队伍，随军出发，在1884—1885年间到桂越边境参加了几次抗法战役，包括攻占谅山之役。由此得到上司的赏识，被提升为守备。中法战争后，他投身苏元春部下戍卫桂越边地，提升为参将。此时，他结识了苏元春的另一部将陆荣廷，建立了终生友谊，陆荣廷是民国初年南方闻名的军阀。张勋在苏元春军伍中的情况不能确知，只有这样一个传闻：据说，他曾奉苏元春之命，携巨款去上海置办军械，但是张勋到上海吃喝嫖赌，把军械款挥霍一空。他的伙伴劝他趁机逃走，张勋说：大丈夫不当如此，回广西去向苏元春请罪。苏元春佯作发怒明令处以死刑，暗中又把他开释放走，而且写信介绍他投奔别处。这一传闻虽未经证实，但可作为解释张勋为什么离开广西到遥远的华北找出路的原因。

1894年，张勋到北方投奔宋庆毅军。他到沈阳时，正值中日战争爆发，张勋率领马队投入战场。中日战争结束，张勋去天津，在那里结识了袁世凯。袁世凯正在小站练兵，张勋立刻投身其中，成为袁世凯的部属，是袁的一名高级军官。1889年袁世凯任山东巡抚，两年后迁往保定，升直隶总督，张勋均随同袁世凯上任。1900年义和团起义，张勋曾率军镇压。

1901年12月，慈禧、光绪从西安回京，张勋曾率军由直隶磁州护驾，由此得到慈禧宠信，这也是张勋甚至在清帝1912年退位后还死心塌地效忠于清皇室的原因。

清皇室回京后，张勋为清室重用，特赐以卫戍端门的重任。1903年，张勋被遣去晋察边地讨伐匪乱。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驻军张家口阻击俄军骚扰。1906年日俄战争结束，张勋调沈阳为准军翼长，两年后递升为云南提督，不久调甘肃任提督，在此两任期间，他仍兼任原在沈阳的职务。1910年驻浦口总统江防各军，1911年夏递升为江南（江苏、安徽）提督，驻南京。

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军攻占武汉、上海、苏州，向南京进军。张勋奉清政府命卫戍南京，他与人数占压倒优势的革命军对抗一阵后，于1911年12月12日弃城逃走，退驻津浦路兖州。清廷任张勋为江苏巡抚，又递升为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准备作殊死战。但是不到几个月，清朝覆亡，北京成立民国政府。

袁世凯新任总统，张勋为其属下的一名将军，张勋原是袁世凯的得意门徒，虽然对袁感恩，但是他始终效忠于被废黜的清室。他虽同意不反对袁世凯担任共和国总统，但他坚持按照清帝退位协议中优待条款，给予皇室全部优惠待遇。在袁世凯任总统期间，张勋始终维护倒了台的清皇室的利益。为了表示他对清皇室的忠诚，他不但自己脑后留着长辫，并规定他的军队士兵也必须留着长辫子，因此他得到了辫子将军的绰号。他自奉为孔圣人的卫道士，反对废除祀孔典礼，有一次从兖州派兵到曲阜去保护孔庙，制止当地民众的劫掠。

袁世凯力图加强自己的部队，以巩固他对全国的统治，由此，张勋获得了充足的军费和配备，以扩大他所统率的部队。1913年夏，二次革命爆发，张勋部队编入北洋第二军，由冯国璋统率进袭守卫南京的国民党军队。8月，张勋部沿津浦路南下，会合冯国璋部，包围南京。1913年9月1日张勋部破城，张

纵使其部队大肆劫掠三整天后，他才得意扬扬进城。张勋因功受命为江苏督军。张部在南京犯下的暴行立即激起了居住在南京的外国人强烈抗议，驻北京和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交代表施加了强大压力，1913年12月16日袁世凯不得不任命冯国璋代替张勋任江苏督军。袁授张勋为定武上将军，调张任长江巡阅使。袁世凯原本给张勋一个空名差使，但经张勋自吹自擂和靠他个人的军事实力，把他的职位渲染成具有了不起的荣耀和权力，此后，“巡阅使”就成为北洋军阀竞相争夺的职衔了。张勋任新职后，他的部队自南京撤至苏北的铁路战略要地徐州，从此徐州成为张勋的军事新据点，直至他的军事生涯的终结。

1915年夏，发动了一场袁世凯称帝的活动，张勋原本是清皇朝的效忠者，对此心里很反对，但并无具体行动。1916年春，西南各省爆发反袁起义，袁世凯被迫撤消为时不久的帝制，复大总统原职。但是反袁声势方兴未艾，他遭到西南各地领导人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免去他总统职务，以至袁的一些亲信也提出这个要求。1916年4月江苏督军冯国璋提议于南京开会讨论袁世凯的辞职问题，会议于5月间召开，张勋的代表在会上得到安徽都督倪嗣冲支持，竭力维护袁世凯的地位，反对冯国璋力图免去袁世凯总统职务的决议案。南京会议没有结果，张勋邀请各省代表到他的据点徐州开会。

在这次新的会议召开之前，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身死，袁的总统职务去留问题不复存在，黎元洪继任总统，北洋军阀的军事实权为内阁总理段祺瑞所掌握。尽管政治局势突变，徐州会议仍按原定时间于1916年6月9日召开。在会上，张勋提议建立各省都军联合会，以维护北洋军阀间的团结，抗击南方军事势力。段祺瑞及其支持者鉴于这样一个组织是加强他们势力的有效办法，因此不仅同意参加，而且推举张勋为这个新组织的首领。7月，段祺瑞任命张勋为安徽督军。由于反段的声势日涨，北洋军阀首领们于1916年9月、1917年1月和5月在徐州先后召开会议，商量对策，张勋成为会议的东道主。

段祺瑞及其同伙利用徐州会议来压制黎元洪及国会中的反段势力。张勋则另有打算，他自从民国成立以来，一直以覆亡了的清皇朝的卫道者自居，他盼望有朝一日扶清帝复位。当袁世凯活着时，袁处于优势地位，张勋直接反对他的老上司自有难处，袁世凯一死，他就着手实现他的妄念，希望通过由他挂帅

的各省都军联合会的建立，最终能得到北洋军阀中同僚支持他的冒险事业。张勋还纠集不少主张帝制的魁首，如原来拥袁称帝的首领杨度，原清朝改良派名儒康有为。

1917年春，张勋认为采取行动的时机已到。5月，段祺瑞同黎元洪和国会之间的宿怨已达到顶点，段祺瑞和黎元洪都争取张勋支持。5月21日，黎元洪免去段祺瑞内阁总理前一日，张勋召开第四次徐州会议，段祺瑞的代表徐树铮为了借用张勋铲除北京的反段势力，使张勋相信只要张能从北京逐走黎元洪和国会反段势力，段就不会反对恢复满清帝制。徐州会议并决定除张勋外，各省都军均宣告独立，脱离北京政府。张勋将以纷争的“调解人”身份去北京，趁机把黎元洪及国会反对势力驱走。按照这个计划，1917年5月29日倪嗣冲宣告独立，除张勋外，各省都军立即响应。黎元洪面对这种背叛局面，束手无策，不知不觉地中了他们的圈套，竟向表面上中立的张勋求援，请他来北京调解对立集团间的冲突。

张勋为假象所蔽，认为他的复辟计划不至于受到段祺瑞和其他北洋军阀的阻挠，因此除在徐州留驻重兵外，接受黎元洪邀请，亲率五千军队北上。1917年6月8日在天津征询段祺瑞及其他军阀首领的意见，又派出先头部队到北京，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作为他进京“调解”的先决条件。6月14日，黎元洪无可奈何地同意了张勋的要求之后，张勋率领了他那身穿黑色军装的辫子军和一群复辟派顽固遗老到了北京，他当即去皇宫晋见十一岁的宣统皇帝溥仪，溥仪同意了张勋拥他重登皇座的计划，据说溥仪当时有点勉强。

经过张勋、康有为和一帮清朝遗老的几天仓卒布置，1917年7月1日凌晨溥仪重登皇座，天明时，张勋和康有为入朝觐见，颁发“上谕”十九道，宣布恢复清皇朝和帝制。大部分的“上谕”是官员任命，张勋本人受益最大，这就表明张勋拥帝复位背后窝藏着他个人的野心。诰命张勋为忠勇亲王、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同时又任皇朝内阁政务总长兼议政大臣。张勋对各省北洋军阀督军谨慎小心，不变动他们的地位，只是依清朝官制改换职称而已，其目的不过是借此争取他们对清皇室复辟的支持。

不久，事态的发展证明复辟之举只是张勋对北洋首领和他自己实力估计的

错误，各省军政官员纷纷函电谴责张勋所策划的政变。1917年7月4日，北洋军阀中二个最难对付的首领段祺瑞和冯国璋联名通电反对复辟，段祺瑞率领军队从他天津的大本营出发，一路迅速地击溃了张勋的队伍，包围北京，7月12日段祺瑞部队破城，张勋的复辟支持者纷纷作鸟兽散，张本人逃往荷兰公使馆避难。段祺瑞控制了北京，宣称复辟告终并下令缉捕张勋及其他复辟元凶。

张勋在荷兰公使馆政治避难一年多，1918年10月23日，总统徐世昌下令赦免张勋和其他复辟参与者。张勋蛰居北京，于1920年夏迁往天津。尽管几度有人让张勋复出，如1921年1月张作霖曾任命张勋为热河林垦督办，但张勋一直过着隐退生活，度过了他的余生。1923年9月张勋死去，在天津举行了隆重的葬仪，溥仪亲临致祭，为表彰张勋一生对清朝的忠贞，赐张勋以“忠武”的谥号。

张勋有九个儿子，张勋死时尚有六子，他的发妻曹氏死于1893年。张勋发迹得势后，娶了好几房小老婆，有一个是北京名女伶。1917年8月号《远东评论》杂志上记述他的形象说：“耸肩，粗脖子，浓眉，高额，白皮肤，还有一根细长辫子”，又说他“认真严肃，固执己见，肆意谩骂，讲究礼仪，一碰到有趣的事就爱发笑”。张勋是一个慷慨、忠诚、开朗的人，但是他在战争中傲慢凶残，此外他具有贪婪的野心。由于他受中国旧军人的粗鲁习气的熏染，使他缺乏国家利益和民主政治的观念。

他幼年时没有受多少教育，据说他在晚年时勤于习读史籍。六十八岁时撰写自传《松寿老人自叙》，或许是他人代作的，以后译成英文，载入1934年詹逊所著《紫禁城的曙光》一书中。

张一麟——麟 字：仲仁 崢角 号：公绂 民佣 大園居士

张一麟（1867—1943,10,24），政府官员，清末民初期间袁世凯的心腹秘书。

张一麟，江苏吴县人，出身士绅官僚家庭。父亲张世义中1880年进士，曾在直隶任知县。他和长兄幼弟三人，同受旧式教育，十二岁为生员，1885年中举人。1903年取录经济特科。不久，入直隶总督袁世凯幕府。他的才能受到袁的信任。1907年袁去北京任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张一麟随同前往。1908年袁退休，张亦返回原籍，1910年曾入浙江巡抚增韞幕府。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政府召回袁世凯，张亦同去北京。1911年12月江苏宣告独立，张协助程德全筹办民政。袁任临时大总统，张去北京为总统府秘书，后又任机要局局长，机要局是袁世凯政府内阁改组后的一个重要部门。袁谋恢复帝制，张辞去机要局长职而任教育总长至1915年。他在任时推广注音字母，此后一直关心书写文字的改革。不久离京回南。

袁世凯统治的最后期间，袁信赖张的文笔，又召张去京担负草拟撤销帝制的命令这一窘困的任务。1917年冯国璋代总统，张重任总统府秘书。1919年南北分裂加剧，张以名士身分出面，力图双方和平统一。1921年他劝吴佩孚停止内战，是召开庐山和平会议的创议者之一。会议失败，他不再参加国家政事，1921年到1931年退住家乡，在苏州一带创办地方福利事业。

1932年1月，日军袭击上海，他重又关心国家大事，热心救援伤员难民。1937年8月，日军再次进攻上海，张当时年已七十，更加激愤，建议组成六十岁以上的老子军，并为此拟订章程，但并没有人认真看待。他所拟定的老人的工作是照管死伤，并不需要体力劳动，或者保护人民免受不法军人和地方豪强的欺凌。

不久，日军占领上海、南京、苏州，张一麟穿上和尚的袈裟，避开日本人的追踪去香港，而后又转往重庆。1938年国民政府为了动员群众，召开国民参政会，张为代表之一。他是参政会中年龄最长的一员，常常提出责问，放言批评和责难国民党和国民政府。1943年患急性肺炎，10月24日死于重庆。

张一麟全集《现代兵事集》1947年出版，他的杂著收在《古红梅阁别集》，其中有不少涉及中国近代历史的材料，例如中朝关系、戊戌变法等。白蕉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书中，张一麟还作了不少批注。1922年上海《申报》五十周年纪念集上，张曾撰《五十年来国事丛谈》一文。

法国新闻记者非迪南·法容纳在1913年曾会见袁世凯，当时张一麟在座。那个法国人描绘张一麟是一个“精明的矮个子”，是一个“老派学者”；法容纳说，袁世凯在一切问题上都信赖张一麟和梁士诒，称他们是“当时统治中国的三个人物”。法容纳的观察难以验证，但是张一麟是袁世凯所最信赖的助手之一，则是很少异议的。

张人傑——杰 字：静江

张人杰（1877,9,19—1950,9,8），商人，政府官吏。孙逸仙的早期支持者，蒋介石的恩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曾任浙江省主席，南京全国建设委员会主任。

张人杰生在浙江省吴兴县。他的祖籍原是安徽徽州。张人杰的本乡南浔镇以出产蚕丝闻名。他的祖辈是富裕的丝商，以慷慨开明知名。张人杰兄弟七人，他是老二，从小聪颖，八岁时熟读儒家典籍多种，早年精通书法。这个纨绔子弟，好在闹市中纵马疾驶。

因为家中富裕，张人杰不准备应考晋身仕途。当他十余岁时，他家里已为他捐得了候补道台的名额。1901年去北京，实补道台。他在北京认识了李石曾。他们之间的长期友谊，在后来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两个年轻人的打算很多，但最迫切的希望是到国外去增长见识。这个希望不久即成现实。1902年孙宝琦出任驻法公使，张人杰、李石曾即以随员身份一起出国。

张人杰到巴黎后，了解了有关欧洲市场上中国商品的情况。经了解后，他决定设立一家私人经营的商行，专卖古玩、茶叶、丝绸。他便回国为设立商行筹集资金。他的主意似乎很吸引人，但很少有人愿冒风险去投资。最后，还是他父亲张廷甫拿出了三十万元，让他在那里开设通运公司。这家在巴黎的公司一直是家庭企业，后来在纽约也开设了分公司。

张人杰从事古董商的工作，经常要和知识界人士接触，其中有一些无政府

主义者，他因此也读了一些有关无政府主义的书籍，并赞同其中的一些主张。但由于他是清政府使馆的人员，所以在欧洲的一些激进的中国学生对他的动机颇为怀疑，很少有人和他公开来往。

1905年，张人杰去伦敦，遇见了吴稚晖，吴稚晖早在上海时就遇到过张人杰的朋友李石曾，吴稚晖、张人杰一见面就很投机。此后，张、李、吴创立了一家革命文化出版社“世纪社”，并附有印刷所。

就在这一期间，张人杰遇到了孙逸仙。据孙逸仙回忆，他们是1906年在一艘法国商船上遇到的。张从财政方面资助了孙逸仙的革命活动。1907年初，孙逸仙在西贡筹划广东西南地区的起义，两次写信要张人杰筹划经费，张两次回信，并资助基金六万元。当时孙逸仙的心腹人员胡汉民等还不知张人杰其人，所以对他的支援颇为诧异。

经张人杰财政上的大力支持，1907年6月在巴黎出版了《新世纪》，大部分稿件都由吴、李撰写。该杂志出版了一百二十一期，1910年5月21日，因严重亏损而停刊。

1907年，张人杰主要因健康关系，又经过香港作另一次游历。此时，他被吸收正式加入同盟会。据国民党所藏文件说，张人杰于1906年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冯自由却认为应于1907年6月回上海途中在香港加入。冯自由是当时同盟会香港支会的负责人。又据说胡汉民是当时张人杰宣誓的监视人，为了照顾张人杰的信仰起见，在誓词中“我凭天宣誓”的“天”字取消了。这两个日期也许并不矛盾，也许张人杰在新加坡支会成立时加入了同盟会，而延迟到1907年才宣誓。

张人杰对反满事业的慷慨捐赠和《新世纪》的经常开销，成为他的巴黎古玩商店很大的负担。因此，1908年，张人杰打算在上海开办一所银行，这样，便可由银行提供资金购置不动产和发行债券筹集资金。他找到一家法国银行愿为此提供所需信贷。但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以后，法国人根据这项设想，在上海自己开设了一家法国信贷洋行。

1910年夏，张人杰又去巴黎。1911年秋武昌起义，张人杰回国，同时又促吴稚晖、李石曾回国。1912年1月，孙逸仙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准备叫张人杰

做财政部长，张坚决谢绝。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孙逸仙改组革命党为中华革命党，张人杰曾积极支持。孙逸仙任张人杰为财政部长，但张因病不能视事，同意由次长廖仲恺用他的名义行事。孙逸仙又指派邓泽如为东南亚支部财政部长。1914年蒋介石加入中华革命党，张人杰是他的监誓人。

1916年袁世凯死后，张人杰在上海的几年中没有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但他是一名忠诚的党员。他在上海法租界的住宅，是党内被追缉的同志们的集会场所。他是一个干练商人，据说他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做很大的买卖。就在这一期间，他和蒋介石交往很密切。1916年，陈其美被刺，张人杰深切感到有代陈其美来保护蒋介石的责任，张对青年门生蒋介石的影响是很大的。蒋介石非常敬重张人杰，他在一封信中说：“戴季陶是我的益友，而先生您是我的良师。”张人杰经常给蒋介石以种种支持并经常鼓励他。

1921年，孙逸仙最后决定改组国民党，各地选出党内代表六十人，在1922年12月开了三次筹备会讨论改组方针，张人杰即是代表之一。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改组，张人杰虽未出席会议，但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设有地区执行总部，张人杰、汪精卫、叶楚伦、于右任属上海总部，其所辖地区包括江、浙、皖、赣各省。

同年底，张人杰足病严重，孙逸仙对张人杰的健康十分关怀，在1924年6月特地写信推荐新由德国回国的医生前去诊治。1925年2月，孙逸仙患癌病，在北京协和医院用镭素治疗无效，张人杰建议采用中医治疗，未经采纳。张人杰亲去探望，是孙逸仙临终前签具遗嘱的目击人。

1925年3月，孙逸仙去世。7月1日国民党在广州组成国民政府，张人杰当选为十六名政务委员之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张人杰与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人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此四人被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其中张人杰年纪最小。蒋介石的权势很快增高，张人杰不管自己体弱多病，深感到必须给以有力支持，因而积极参预政界活动。张人杰在法国时就和汪精卫结下了友谊，因而当蒋汪之间纠纷日增时，张人杰力图从中调解。1926年1月，张人杰去广州，和蒋介石、汪精卫夫妇一起，到黄埔风景区游览，以改善他们间的关系，然后回上海。后来广州的政局更为复杂，他又一再向他们

呼吁，并于1926年3月2日又去广州，正是离奇的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两天（译注：原文如此，应作3月20日）。汪精卫被迫出国。汪精卫、胡汉民都不在广州，谭延闿代国民政府主席，因为他资历较浅，所以张人杰认为需要他自己亲自留在广州从精神上支持蒋介石。

1926年5月19日，张人杰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成为实际上的国民党领袖。7月7日，张人杰辞职，蒋介石继任。北伐期间，蒋介石率部进军，7月至12月由张人杰暂代主席职务，这是近代中国政治史上最危急的时期之一。

当年11月北伐胜利进军，国民党总部和国民政府逐步由广州向北转移。此时，张人杰的父亲去世，张人杰应蒋介石之请，取消了回原籍的计划，于1929年12月中旬到了蒋介石在南昌的临时总司令部。北伐军攻占浙江，张人杰去杭州当浙江临时省政府主席。武汉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要人强烈攻击张人杰，说他“勇而无谋，老气横秋，腐败无能”。张人杰与蒋介石研究了当时局势，请褚民谊催促汪精卫从欧洲回国。

1927年4月1日，汪精卫回到上海，在那里和一批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商议对付共产党的办法，张人杰从杭州赶来参加。会议决定把共产党员驱逐出国民党。这是1927年4月12日开始在上海及其他地区清党的预兆。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成立。在这之前，武汉也宣布成立了国民政府。这样，宁汉分裂了。9月（译注：原文如此，应作7月），武汉政府中的国民党领袖人物和共产党破裂。接着，组成国民党特别委员会，使宁、汉、沪（包括西山会议派）三派重新统一。张人杰是特别委员会委员。

1928年1月，蒋介石在南京恢复原职，2月，国民政府又新成立全国建设委员会，以张人杰为主席。建设委员会的成绩和它原定的庞大计划是远不相称的，但是在张人杰的主持下，也颇做了一些工作。建设委员会第一项工作是改建南京发电厂，不到一年完成。又在京沪路沿线的戚墅堰新建发电厂，以利工业发展和农田灌溉。1928年11月和美国无线电公司订立合同，在上海近郊真如建立国际广播电台，不久又和德国西门子公司订立合同以发展国内广播事业。委员会筹建了江南、淮南铁路及其沿线的淮南、马鞍山、长兴等煤矿，又开办

了宁芜长途公共汽车。

1931年10月，成立全国经济委员会。建设委员会的职能限于建设工程的计划和指导。以宋子文为首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则负责全面发展计划。1938年建设委员会取消，它的职权分别隶属于经济部和全国资源委员会。

1928年11月，张人杰被任命为其原籍浙江省的省主席。他担任省主席的职务直到1930年1月。他在任期内把主要精力用在发展全省的交通事业。1930年他筹办杭州西湖博览会。有人批评他挥霍浪费。

张人杰后来四肢瘫痪，渐渐离开了政治活动。1932年1月他听到日军进袭上海的消息，那时正在吃饭，他突然发觉了“弱肉强食”这句谚语的真谛，从此以后，他终生成为素食主义者。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他去汉口。1938年秋他经香港去欧洲，游历了瑞士、法国，重温本世纪初在巴黎时青年时期的欢乐。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张人杰从欧洲去美国，寓居于纽约。1942年12月，一群和平主义者在他家里开会，向各国政府呼吁和平。张人杰的瘫痪程度愈来愈严重，终于在1945年失明，1950年9月3日死在纽约。9月16日蒋介石在台北亲自主持他的追悼会。

张人杰两次结婚，他的前妻姚慧生了五个女儿。四女张荔英（乔治达）1930年在巴黎和陈友仁结婚，因此张人杰对她深为失望。陈友仁死后，又和《大轮回》的作者何云志结婚，后又离婚。五女倩英1946年在上海和林可胜结婚。姚慧死后，张人杰和朱逸民结婚，生有五女两子。张人杰死后，朱到美国定居。

张 澜 字：表方

张澜（1872——1955,2），四川政界首领，中国民主同盟第一任主席，1949年——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是三个非共产党人的副主席之一。

张澜，四川南充人，出身于书香之家，受旧式教育，后来被尊为经典式学

者。他在清代末年危难时期成长起来，被梁启超等人的改良主义观点所吸引而投身于一个主张君主立宪的社团。

张澜自1911年任川汉铁路股东会副董事长而渐渐为公众所注目。这个股东会反对川汉路收归国有。四川反对北京当局的情绪激荡，清政府当局采用蛮横手段镇压群众示威游行。流血的事件使这个本属和平抗议性质的举动变成了武装起义。清政府当局很快镇压了起义，但是反对铁路国有的运动迅即波及各地，为反满的共和革命党人加以充分利用，这是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一个直接原因。

张澜在政治上属于君主立宪派，他是四川君主立宪派的一个首领人物，1916年反袁活动中，他曾组织了一小股地方武装声援共和，但在行动之前，袁世凯已死了。他从未掌握过四川的军力，但是他是民国初期四川的一个高级政治首领。

四川当时经常是地方军人互相倾轧的一个场所，他们早先曾经在一起赶走了占领四川部分地区达数年的滇军。从来没有一个单独的权力有效地统治过四川全省，同样，四川也从来不接受中央的控制。张澜由于他个人的声誉，在1920年短期内当过四川省长。二十年代中，他把主要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1928年，他当了两年成都师范的校长后，又当了成都大学校长。1928—1937年他在政治上并不活跃，但在四川仍居有重要地位。他和大部分四川地方军人有长期交往，他因为不属于任何派系而受到他们普遍的尊重。同时，作为一个主要的省立大学的校长，他受到学生们和知识界的尊敬。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张澜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在这个组织商讨问题时很少积极活动，但他一旦发言就很引人注目。他坦率地批评国民政府的独裁措施，因此受大学学生们的注意而很有名望。

1941年，各反对派系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时，张澜被选为主席。他之所以当选，是由于他在四川的声望，也由于各参加社团从现实的愿望出发，希望避免内部争执的结果。1944年该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后，张澜仍担任主席之职直到他去世。张澜并非民盟的决策人，但他对参加该组织的小党派和政界人物起了稳定的作用。

1946年，张澜以民盟四代表之一参加了流产的政治协商会议，其他三人是张嘉森、张东荪和罗隆基。1946年张澜去上海，1947年10月南京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民盟领导人有不少飞往香港，张仍留在上海，为国民党当局所软禁。1949年春，国民党在沪宁地区情势恶化，张澜、罗隆基经共产党代表之劝，躲避起来等待解放。1949年中，共产党在大陆上大部分地域取得胜利，张澜去北平协助筹备成立新的中央政府。

1949年9月，他率领民盟代表团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张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六位副主席之一，其他两位非共产党人的副主席是孙逸仙夫人（宋庆龄）和李济琛。张澜任副主席直到1954年，那时改副主席为一人，此后他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张澜安定而舒畅地在北京度过了晚年。从他将近八十岁时起，不再过中日战争时期在重庆那样受独裁势力猛烈抨击的生活了。他经常在纪念日的场合出面，他的高龄和要职受到应有的尊敬。1955年2月患动脉硬化症逝世，年八十四岁。他的遗孀名刘慧贞（译音）。

张厉生 字：少武

张厉生（1900,5,24——）国民党首领人物，政府官员，1936——37年国民党组织部长，1944——1948年5月任内政部长。在台湾曾任行政院副院长、驻日大使之职。

张厉生，河北乐亭人，该地在长城以南，渤海之滨，虽世代务农，但父亲张省吾常去东北经商，目睹日本人在东北的暴行，曾因反抗日本人而被捕入狱。张厉生童年时听到父亲诉说去东北经商时的经历，因此对日本人的敌恨很深。

张厉生八岁时虽家庭经济困窘，父亲仍送他上学，不久又进乐亭高小。此

时他父亲死去，张厉生由亲友接济继续上学。1917年进了张伯苓创办的天津南开学校。当时，名学者、革命家吴稚晖在附近的唐山路矿学校教中文，张厉生对他深为敬仰，经人介绍常前去拜访。他受到吴稚晖的影响，决定去欧洲留学。事先，他离开南开入北京朝阳学院法科预备班，学习欧洲史和法语。

1920年夏，张厉生由亲友资助去法国，经补习后，于1922年进巴黎大学，学社会经济学。他在巴黎加入国民党，1924年选入巴黎分部执行委员会，那时巴黎分部是国民党在欧洲的最大组织。当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执行委员中有周恩来和李富春。但在那时，他已经常和这两个年轻共产党人发生争执。

1925年张厉生回国，在上海中山大学教书。1926年底，北伐军到达武汉，张去那里担任第十军政治部秘书。1927年底，邵元冲任杭州市长，张厉生去杭州任市政府秘书长。清党时，张厉生因在法国时有反共经历，所以调到南京市党部任监察委员。1929年3月出席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长陈果夫以极好印象，任他为组织部秘书。1931年国民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张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32年10月，任河北省政府委员，负责华北党务，那时他三十二岁。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委员，1936年2月继陈立夫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重要机构组织部部长。

中日战争开始后，陈诚于1938年1月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张厉生离组织部而任政治部秘书长，后为副主任，一直到1940年9月。陈诚辞职时，张厉生亦离职，任最高国防委员会为提高行政效率而设立的党政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在职两年。

1942年12月，张厉生由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提名任行政院秘书长，从此后，他直接参与了政府行政工作，并成为全国总动员会的当然秘书长。他在行政院三年，因工作负责又善于调处在重庆的政府各部之间的关系而很有声望。1944年12月，宋子文任行政院长，张厉生任内政部长，但继续担任秘书长之职数月，后来由蒋梦麟接任。1947年3月，张群代宋子文为行政院长，各部均有变动。但张厉生仍任内政部长直到1948年5月新宪法公布。然后他当了行政院

副院长。

他在四年内政部长任内，除经常工作外，又监督国民代表大会、监察院和普选的选举事项。他又草拟了人口普查法规，这些法规在1946年公布。他还担负了全国人口普查的准备工作，在1947年3月设立了人口普查局。但因国内战争关系，未能实行。但1956年9月台湾的人口普查即以此为依据。

中国共产党虽未参加国民代表大会，但各项选举照样进行，大会如期召开，通过新宪法，按宪法组成政府，张厉生任行政院副院长。1948年11月，内阁倒台，由孙科另组新内阁，张厉生任不管部长。当中国共产党军队打到南方时，张厉生迁往台湾。

1949年8月，陈诚任台湾省长，张厉生任台湾省立自治研究院主席，他可以凭以往经验规划台湾省内的地方自治。1950年3月，陈诚任行政院长，张厉生任行政院副院长，一直到1954年6月当陈诚选为副总统离去行政院长职务时为止。从1954年8月到1958年之间，张一直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的职务。1959年后任驻日大使四年。1963年9月回台湾，当时台北与东京间官方关系非常紧张，他从此退出了官场活动。

张默君 原名：昭汉 西名：莎非亚

张默君（1883,10,4—1965,1,30），妇女活动家，教育家，诗人，神州女校第一任校长，江苏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行政院、立法院成员。

她出生在湖南湘乡一个士绅家庭，她的家庭环境使她对中国古典文学打下了坚实基础，并对当代政事发生浓厚兴趣。她的父母都是学者，她的父亲张宝居是一个翰林和官吏，她母亲何逸肖是一个诗人，能诗善文的翰林、湖南督军谭延闿对何逸肖的诗作很推崇。

她早年在家中受母教，后去南京上中学，清代末年她父亲在两江总督端方

手下任学政。在南京时，她还在金陵阳城学堂附属小学教书，同时又在汇文女校学英语。她读了邹容的《革命军》、谭嗣同的《仁学》后，对各种政治思想很感兴趣。年轻的张默君又受她父亲的进步观点的影响，她父亲虽是清朝官吏，但同情民族主义新思想。她由南京到上海进务本女校，又读了富有民族思想的《新湖南》、《洞庭波》、《浙江潮》等杂志，开始与反满运动的成员有所接触，经黄兴介绍加入了同盟会，从事筹划同盟会在江浙两省进行革命的秘密工作，与秋瑾、赵声及其他反满革命活动分子有了联系。

张默君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务本女校后，在江苏省立粹明（译音）女校教书，又在苏州劳拉·海古德（译音）师范学校学英语；准备获得机会去美国留学。但她的从事政治活动的友辈劝她留在国内，以便她通过她父亲和清朝官吏接触，为革命事业得到有用的情报。

1911年武昌起义，张默君和她父亲在苏州脱离清廷统治宣告独立的过程起了积极作用，她父亲担任了江苏都督程德全的参军，张默君协助起草和编写宣传材料，并负责在苏州出版江苏《大汉报》，该报经常刊载她有声有色的社论。

民国初年，张默君在政治上仍很活跃，她会合了妇女界一些朋友组成“神州妇女”协会，她被选为会长，筹集经费支援1912年初在南京成立的临时政府。这些活动引起了孙逸仙的注意。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张默君在国民党上海总部负责通讯部工作。她和神州妇女会在争取女权、改革妇女教育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为了争取群众，神州妇女会注重新闻宣传工作，创办了《神州日报》，设立了神州女校，这是上海第一个私人创办的女校。1914年秋张默君任第一任校长。她多方设法扩大学额，增聘师资。几年中，叶楚伦、叶圣陶、谢六逸等知名人士都曾由她邀请在那里教过书。

1918年，教育部派她出国考察西方教学法。她首先去美国，考察了美国的几个学校和女子学院后，趁机进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学习，被选为纽约中国学生联合会主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她去欧洲。1919年夏，遍游英、法、德、比、瑞士，特别注意各地社会情况和妇女教育。她的游历见闻载于《欧美教育考察录》。回国途中，她又到东南亚访问。1920年冬回到上海，继

续担任神州女校校长，不久江苏省政府又任命她主持江苏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她1927年辞去校长职务之前的几年之中，她提高该校学术水平，扩大班级，增添设备，聘请名师，学校办得很出色。为了消灭文盲，她和她的朋友、熊希龄的第一个妻子朱其慧着手进行普及教育工作，在广大地区为失学妇女和儿童创办专门学校，在她的师范学校还附设夜校。她继续在新闻界工作，主持《神州日报》，主编《上海时报》的每周妇女专刊。

张默君这几年的独立和献身精神，使一些爱慕她的男子不敢向她求婚。但是她于1924年和邵元冲结婚，邵元冲是孙逸仙的私人机要秘书。婚礼在1924年9月于上海举行，由于右任主婚，戴季陶作介绍人，这次婚礼引起了广泛注意和赞美。张默君和她丈夫的身世相仿，既受过旧学训练，又曾在美国深造。

结婚后，张默君在政治上仍很活跃。1927年，邵元冲任杭州市长，张默君担任市教育局局长，同时又是中央政治会议上海分会的教育委员。第二年，他们迁往南京，参加新的国民政府的工作。张默君历任考试院特种考试委员会委员（1929），立法院委员（1930），1931年春任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名誉编辑，同时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

1933—1935年，张默君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监察委员，又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35年春，她和邵元冲遍历西北各省：陕西、山西、甘肃、青海、宁夏，游历见闻载于《西北览胜》一书，不久即出版。

1936年12月，邵元冲随从蒋介石去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谈判时，在劫持蒋介石的变乱中中弹而死。张默君为突然失去丈夫而大为震惊，从此回到湖南娘家，不问政治，每日教育儿女，写诗习字而已。1940年，国民政府请她到重庆考试院任职。1942年又派她视察湖南党务。中日战争结束前，她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考试院法典委员会委员。

战后几年中，她是南京考试院委员，国史馆名誉编辑。共产党在大陆取得政权后，她到了台湾，仍任考试院委员兼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中央评审委员。在台湾，她那刚成年的儿子突然夭折，使她很为忧伤。1957年她向台湾中华民国政府捐献了她毕生收藏的一百多方玉石。1965年1月30日，她死在台北，遗有女儿邵英多和她的外孙。

张弼士 字：振勋

张弼士（1840—1916，8），企业家，以他的烟台张裕酿酒厂知名。他在爪哇、马来亚成了一个百万巨富。他的爱国心和他的事业为清政府所利用，这是极少数华侨中的一人。

张弼士出身在粤东大埔的一个贫苦家庭。大埔是广东省的先进地区，比较开通，张弼士童年时受了一些教育，1856年十七岁时离家赴东南亚去试试他的命运。他的目的地是巴达维亚。

青年张弼士既有雄心又小心谨慎，初到客地，他认为必须取得荷兰殖民主人的交情和信任，才能对他的事业进展更为有利。他工作勤恳，且不断地讨好荷兰当局。1858年，他到爪哇才两年，就办起了他第一桩事业——开公司种植椰子和稻米，爪哇是当时诸岛中经济最为发达的一个地区。

张弼士和荷兰殖民官员的交情不断加深，使他获得垦殖荒地的机会，又使他有效地垄断例如烟酒之类的贸易。几年之内，他发了财，成了爪哇的一名显要人物。实业经营的成功，反过来又加强了他和荷兰行政当局的私人关系。

1875年，张弼士三十六岁，他的事业达到高峰，他的荷兰朋友提议他向苏门答腊发展他的事业，那里的经济不甚发达。荷兰人看准了张弼士，认为他是开发苏门答腊经济资源的可靠而理想的开拓者。张的事业飞黄腾达，1877年他创办了第一个大企业永兴公司，在苏门答腊种植胡椒、橡胶、咖啡、茶叶。他所兴办的事业对苏门答腊东北德利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他在德利还开设了一所银行。

从棉兰到英属殖民地檳城很近，檳城又是马来亚第二位的商业中心，所以很吸引张弼士，他准备到那里去寻求发展。他与友人泗水华侨首领李大义在檳城设立一家贸易公司，从苏门答腊出口商品。接着，又从事航运业，1886年设立万永生公司，有三艘船只来往于苏门答腊和檳城之间。

张弼士成了苏门答腊最有钱的中国人，也是东南亚最富有者之一。北京清

政府渐渐悟到需要现代化和工业化，提出了很现实的办法，准备授海外富裕华侨以高级官衔，以吸引他们向国内投资。张弼士就是获得这种荣誉的第一批华侨中的一个。1890年，清政府在槟城设领事馆，张任领事。

张弼士作为清朝官吏，常回国探访，观察国内经济状况，并向国内许多地方的工业企业投资。在很早时候，他就掌握多种经营的方针，创办一些很少有人去经营的事业，这更是引人注目了，例如广州机器纺织厂、广东佛山的机器造砖厂、广东惠州的玻璃厂、海南岛对岸大陆上雷州半岛的畜牧场、福建平海的盐场。

1894年，张弼士在山东烟台创办了他在中国的最有名而最成功的企业——张裕酿酒厂，这是国内第一个生产西式商品的大企业。创办酿酒厂的过程要回溯到1871年，那时三十二岁的张弼士正开始登上名利之途，他遇到了一个参加1860年侵华英法联军的老兵，那时这个法国老兵已成为爪哇法国领事馆的外务官吏了。他说，占领烟台的军队根据经验都认为，那里的气候适宜于种植酿酒葡萄。1891年，张在被任命为槟城领事的那一年回国，他应烟台海关道盛宣怀的邀请，到烟台访问。他回想起那个法国人提出的主意，他就向盛宣怀讯问，盛告诉他说烟台酿制的土酒质量很好。张弼士决心着手进行此项企业，他聘请欧洲专家，第一个死在来华途中，第二个不合格，第三个奥地利人终于到了烟台，引进欧美葡萄种籽，渐渐垦拓了一片葡萄园。但直到1906年酿酒厂才能获利，1909年又附设玻璃厂。张弼士的长子张秩君象他父亲一样是个经商的行家，张裕酿酒厂从建厂起就由张秩君经营，出产红、白葡萄酒和白兰地酒。

1896年，他又投资开掘广西桂县银矿。这一着失败了，一方面是由于进口机械不适合当地需用，另一方面是由于该地政治局势不安定。

张弼士在东南亚的巨资不断增添。他参加了英属马来亚迅速发展的开矿业，1898年他又协助在马来亚东岸建文冬矿城，在那里正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淘金热”。锡是马来亚的主要矿藏，张弼士对雪兰莪地区的锡矿很感兴趣。

张弼士的官吏生涯也有进展，1902年提升为新加坡总领事。1903年慈禧召见，赏给三品京官，入新设的商部任事。1904年10月24日张弼士给商部上书，对国内的经济开发作了重要建议。从他所撰文件的时代来考虑，其中有不少先

进的见解。他指出政府的最高首脑渴望得到外国资本来开发中国，而又无实际措施吸引外国投资者。他提出与其如此，还不如吸收海外华侨企业家的投资为好，他又说明了阻碍华侨投资的困难所在，并提出了克服的办法。

清政府赞同他的建议，任命他为东南亚的特别商务大臣，又任命为闽粤两省农工路矿督办。清廷还授以太仆寺卿的荣誉职称和穿戴一品朝服副大臣官衔。清廷的目的是想通过他的积极支持吸引海外华侨的投资。张弼士虽作了极大努力，但殊少成效。革命高潮正在兴起，没有一个华侨首领愿意支持满清政府。

1912年民国成立，张弼士回爪哇、马来亚。他在檳城又创办了一个经营椰子的新企业。1916年8月死于泗水，年七十七岁。

章炳麟 原名：章学乘 章绛 字：枚叔 号：太炎 荊汉

章炳麟（1868，11，25—1936，6，14），学者，反满革命家，著名的《苏报》、同盟会《民报》的编辑。著名的经典学者，以研究哲学和注疏而闻名。

章炳麟的传记很多，但对他的先世和父母都少有记载。章炳麟，浙江余杭人，从小受家教，特别是他的外祖父，曾教他读经籍和史书。十二岁时，他随祖父读《东华录》，了解吕留良、曾静的反满活动，才知道满清统治乃是异族统治。他又读了十七世纪反满学者王夫之的著作和全祖望记载明末遗臣在浙江反满的史书。十九岁时，他读了《明季稗史汇编》，对满清更为反感，这是一部忠于明朝的作者记述明代末年事迹的文集合编。章炳麟自称，他从这些著作中产生了强烈的反满的信念。

章炳麟青年时的兴趣并不专注于政治历史，他也无意应试求功名，而是致力于研究哲学和古籍注疏，以后成了他毕生的爱好。他在十多岁时开始读《说文解字》、《尔雅》、《十三经注疏》。1892年二十五岁时，他离开余杭去杭

州人著名学者俞樾主持的“诂经精舍”读书。四年中，他研究哲史典籍，致力于《左氏春秋》。

1894—1895年不幸的中日战争期间，章炳麟和许多国人一样，深信中国必须经重大改革才能独立生存。1895年康有为等组织强学会，章送了一笔捐款并要求列名于强学会，由此引起梁启超的注意，1896年请他离“诂经精舍”去《时务报》，这是由梁和汪康年在上海创办的改良派报纸。他在《时务报》两年后，1898年应两湖总督张之洞之请去武昌张手下工作。不久，因张之洞的《劝学篇》这本书而与张发生争执。章炳麟竭力反对《劝学篇》中效忠清王朝的观点。他离开张之洞后不久，在北京发生慈禧反对维新派的政变，慈禧下令逮捕和变法运动有关人物。章炳麟曾与《时务报》有关系，所以也列入逮捕名单之内。章逃往台湾，当时台湾尚在日本统治之下。

他在台湾与横滨的梁启超有来往，经梁邀请，他于1899年去日本。当时，康、梁等人认为有可能和孙逸仙的革命党合作。经梁启超介绍，章炳麟在横滨结识了孙逸仙。康有为组织保皇会，设法想从保守的慈禧太后手中释放被囚的光绪皇帝，仍作他们变法的首脑。此时，章炳麟与梁启超分手。梁是康的弟子，他认为只有在光绪皇帝的领导下才能改造中国，而章炳麟却认为所有满族，其中包括光绪皇帝，都是汉人的仇敌，必须驱除，变法才能成功。此后，章离开日本回到上海。

1900年6月，在华北义和团起义高潮中，章炳麟参加了在上海的几百个变法运动的同情者的大会。会议主持人唐才常力谋保皇党和革命党联合一致，支持武装起义，推翻两湖满清当局。为了得到保皇党的财政支持，唐才常等人订约效忠光绪皇帝。章炳麟愤怒抗议，并当众剪去发辫以示与满清的最后决裂。三个月后，唐才常的汉口起义被扑灭，清政府下令逮捕章炳麟及其他在上海开会的主要人物。章去苏州避难，执教于美国传教士办的英华学堂（东西书院，1901年改为东吴大学）。他在苏州教书时，经常出明清史的试题，这被清当局认为是政治上的挑衅。1901年底，江苏巡抚满洲人恩铭迫令该校当局交待章炳麟的下落，那时，他正在杭州度寒假，得到秘密通知后，1902年初先逃到上海，旋去日本。

章炳麟在东京和孙逸仙重逢，并且与张继、冯自由、秦力山等其他青年革命者来往，讨论推翻满清的办法。章认为要想取得胜利，必须提高中国青年的爱国心，而用历史的事实激发他们的爱国心，是最好的办法。他建议1902年5月6日召集中国留学生及政治避难者举行汉族亡于满清统治的纪念会。章撰写的开会通知，在留日的中国人之间流传。日本当局应中国公使之请禁止召开此会。但章炳麟的建立爱国的反满组织的思想遍及中国学生之中，由此很快组织了几个革命团体，如在日本的“青年会”（1901年）、“军国民教育会”（1902年），以及在中国的“光复会”（1903年）。

1902年，章炳麟由东京回到上海，和蔡元培、吴稚晖等人组织“中国教育会”，以促进中国现代教育。会员大都是怀有激进民族思想的青年，这个组织就成为进行秘密革命活动的中心。11月，经一些不久前从日本回国的青年学生的迫切要求，教育会的领导人在上海设立一所新学校“爱国学社”，校长蔡元培，教师有章炳麟、吴稚晖、黄炎培、蒋维乔等人。1903年初，“爱国学社”增加名额，不少学生从“南洋公学”中转来，其中有激进青年章士钊。章炳麟教中文课程，所以和章士钊及新从日本回国的学生邹容等人过往密切。由于他与这两个青年学生的关系，1903年6月有名的《苏报》案中，章炳麟也被牵连在内。

5月底，章士钊任《苏报》主笔。《苏报》和上海“爱国学社”的关系很密切。章士钊任主编后，《苏报》的论调越来越激烈，又刊载章炳麟、吴稚晖和“爱国学社”其他诸人的文章，反映了强烈的反满情绪。其中有章炳麟称赞邹容《革命军》的序言，那是一本号召武装起义的小册子；还有他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反对康有为的君主立宪，并嘲笑光绪是“载湉小丑，不辨菽麦”。清廷为此攻击所激怒，下令封闭《苏报》，逮捕章炳麟、邹容及其他与此有关的人物。1903年6月29日，章被捕，两日后，邹容投案。上海会审公堂判处章炳麟徒刑三年，邹容两年。上海外国领事当局拒绝了清政府提出的引渡要求，把他们关押在公共租界的一所监狱。邹容服刑未滿，于1905年在狱中去世。

1906年6月29日，章炳麟服刑期满获释，即由同盟会员把他护送到日本。在东京，他受到革命党人英雄般的欢迎，并任同盟会杂志《民报》主笔。此后

两年中，他经手主编了十五期。他作为《民报》的主笔和主要撰稿人，他的革命者的名望和经典学者的修养使《民报》增色。他撰文反对梁启超主办的销路很广的保皇派杂志《新民丛报》所散布的影响，吸引了不少知识界人士投身于革命。1908年10月10日，《民报》刊登一篇文章主张把政治暗杀作为革命手段，被日本当局没收，章炳麟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宋教仁就此向日本法庭起诉，但均无结果。

1907年，广东革命起事多次失败，引起在日本的同盟会一些会员对孙逸仙的领导工作不满。其中最尖锐的批评出于章炳麟，他不仅批评革命党武装起事多次失败，其责任在孙逸仙，并且斥责孙逸仙私自挪用革命党公款。东京同盟会总部内，有一股罢免孙逸仙为同盟会主席的活动，其发难人是章炳麟和陶成章。陶成章是章在《民报》的一个同事，1908年4月到7月任《民报》主编，是光复会的老会员，1903年在上海成立时就加入，1906年和其他一些光复会会员加入了同盟会。他对同盟会领导不满，1908年离东京去新加坡重组光复会。此后光复会常打击同盟会，很快在东南亚和荷属东印度的华侨中，以及在浙江、江苏、福建和华东各省发展会员。章炳麟虽然仍在日本，但很受国内及东南亚的光复会会员的尊敬，被视为是陶成章所组织的光复会的首领。1910年，光复会在东京重建，举章炳麟为首领，陶成章为副首领。此后，同盟会和光复会之间的争论日益尖锐。1912年1月，在革命军占领上海后，陶成章被刺，据说此举是由上海同盟会首领唆使的。

章炳麟虽与光复会有关系，但直到1911年革命时，他一直是同盟会会员。他认为同盟会的主要目的是推翻满清，这个目的一经完成，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辛亥革命后，他是第一批和同盟会断绝关系的一人。1911年底他从日本回到上海，1912年1月3日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这个政治组织在几个重大问题上和同盟会唱反调。虽然与同盟会有分歧，章炳麟仍受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孙逸仙之请，去当他的枢密顾问。1912年2月，袁世凯请他去北京当顾问。4月，他在去北京之前，把光复会这个组织和张謇的政治团体合并为“统一党”，以章炳麟、张謇、熊希龄、程德全为首脑。章炳麟在北京设该党总部，5月与黎元洪和湖北一些首领为首的“民社”合并组成“共和党”，章仍为首

领之一。这个团体中有很多成员是前满清官吏和国会中支持袁世凯先反同盟会、后反国民党的人。章炳麟对这个党的保守主义和屈从袁世凯的态度表示不满，不久即退出共和党，准备重建独立的统一党。

在北京，袁世凯任章炳麟为东三省筹边专使。章去东北上任，他在沈阳为期不久，发现这个职位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他对袁世凯极为愤懑，终于在1913年春因他的至友宋教仁被袁世凯指使人在上海刺死而公开爆发。他辞职赶到上海，又和从前同盟会同人联结一起公开斥责袁世凯。

1913年7月8日间二次革命后，章炳麟又到北京准备重组共和党。袁世凯害怕他的反对，把他软禁起来，只许章炳麟的少数密友往还。在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之前，章在北京获得了自由。他回到上海后，很快出国去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游历，他在那里向华侨团体作有关中国政治形势的报告。是年秋，他又回到上海，在那里定居，并和许多过去的革命同志和旧友谈论国家大事。

1917年7月，他和孙逸仙、唐绍仪等人由上海乘船去广州，支援护法运动，反对段祺瑞的北京政府。1917年9月8日，广州非常国会选举孙逸仙为军政府大元帅，几天后，任章为军政府秘书长。章炳麟对他的职务很厌烦，又常在会议中和胡汉民争辩不休，他要求以个人名义去川滇活动，争取那里实力军人的援助。孙逸仙同意了他的要求。章经安南去昆明会见唐继尧，然后又在重庆过了几月，多次商谈军事上进行合作共同反对北京政府的问题，但无结果。他烦恼地离开四川，1918年春回到广州，那时孙逸仙已离去军政府职务到上海去了。经这次挫败后，章炳麟隐居上海寓所，几乎完全退出了政治活动，偶然也因国事危急而有所举动。1922年他写信给黎元洪，要黎拒绝曹锟、吴佩孚促其做总统。1924年他要求召集老同盟会员会议讨论阻止共产党人在改组后的国民党内的活动；1932年他在北平访问张学良，要求张在北方困扰日军，以减轻日军在上海对正在作战的中国军队的压力。

自从1918年退出政界活动之后，章炳麟用大部分精力从事教学工作和典籍研究。二十年代中期，他曾主编《华国》月刊。该刊创办于1923年9月，1926年7月停刊，章炳麟在这上面发表了很多学术论文。他在上海住了有十五年之久，1934年4月迁居苏州。第二年他私人创办了一个“章氏国学讲习所”，同

时出版了半月刊《制言》。在全国教育制度不断西化的过程中，他希望通过他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和在他的讲习所的讲学来保存中国经典学术的传统，他为此而奋斗到1936年6月14日去世。他死后，由他创办的“讲习所”改名为“太炎文学院”以志纪念，并迁往上海，该文学院维持到1940年9月。

章炳麟在革命活动中的作用，受到赞誉和尊敬，而在古典学术中尤有显著名望。早年时他虽是一个维新派和革命派，但一直酷爱经典学术，他追随名师俞樾，对儒家和其他古代哲学著作进行注疏研究。他在研究过程中增加了反满民族情绪。他早期的哲学史学论文，充满着反满嘲讽，反映出他早年的知识兴趣。1901年他把这些文章汇编出版为《馥书》，1914年又增订出版为《检论》。他在日本流亡期间，除担任《民报》编辑工作外，还教书和研究汉学。1906年到1911年间，他有关中国经典和古代哲学家的重要论文发表在《国粹学报》，这是由刘师培和邓实在上海创办的具有民族主义观点的学术刊物。佛学是章炳麟注意的另一研究课题，在《民报》和《国粹学报》中有好几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尤其注意在《诸识唯论》，《庄子解诂》、《齐物论释》中，对佛学和老庄哲学作了比较，极有创见。他从俞樾受学时，尤喜《左传》。在他的几篇著作中，如《春秋左传续录》、《刘子政左传说》，都论述了《左传》胜于《公羊传》、《谷梁传》。章炳麟是一个古文学派代表人物（反对康有为等以公羊传为依据的今文学派）。他在哲学和小学的研究方面成绩最大，其重要著作《文始》，历述中国文字的起源，他的《新方言》，根据汉代学者杨雄《方言》对近代中国方言作地理区域的考查。还有他的《小学答问》、《说文部首韵语》等文章。在有关小学和文学哲学关系方面的文章中，生动说明了要有丰富的小学知识才能更好的理解中国古代典籍。他最为闻名的著作是《国故论衡》。章炳麟语言学知识很渊博，但对甲骨文的研究并不重视，并不承认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这些近代甲骨文学者所作出的贡献。

章炳麟是一个保存中国道德文化遗产的创导人，他注意古代礼制法典，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关于这一问题的著作，有在《民报》上发表的《五朝法律索隐》，对中国的法典史作了简要概述。他在晚年致力于历代丧礼制度的编订。章炳麟的史学著述并不多，他一度准备编写一部中国通史，这一计划

的内容目录收在初版的《楹书》里，但在《捡论》里删去了。章炳麟善写文章，他被公认为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最有权威的代表和具有造诣的文体家之一。他的诗大都是五言，具有魏晋风格。辛亥革命后，他作为学者和文学大师，对北京大学有很大的影响，他的几个门生和朋友（称为江浙派）在北大取代了林纾和其他桐城派人物担任文学系教授。章炳麟是文言文的忠诚守护者，因此是胡适、陈独秀领导的白话文运动的强有力的反对者。白话文在大学学生中渐渐普及，章炳麟在北大及其他文学组织的影响迅即衰落，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所写的古文被看作是文学界的奇特的老古董了。

章炳麟的一些早期文章，包括在《民报》、《国粹学报》上发表的一部分文章，编印在1914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章太炎文钞》。他的十四篇有关汉学的文章，由浙江省立图书馆收集在《章氏丛书》中于1919年出版，又在1924年由上海国学流通局重印。1933年在北平出版的《章氏丛书续编》，是他的学生钱玄同、朱希祖、马裕藻所编印。《章氏丛书三编》于1939年由他创办的章氏国学讲习所出版。一篇相当完备的章炳麟著作目录——《太炎先生著述目录初稿》，由他的几名学生编撰，为纪念他逝世而发表在1939年9月的《制言》特刊上；他还有不少未出版的著作，其中有《自订年谱》。

章炳麟遗有子两人，章导、章继，女二人，章焱、章珪。章焱于1903年和光复会的创办人龚宝铨结婚。章炳麟在北京被软禁时，章焱前去探望，1915年9月7日她神秘地吊死在他父亲被软禁的住处。章炳麟的前妻很早就去世，1913年6月第二次结婚，他的妻子汤国黎是一个很有才学的妇女。章炳麟性情急躁，直言不讳，非常自信，行动粗暴，因此多有称他为疯子的。他青年时严于律己，每当别人小有疵缺，就当面加以指责。晚年时，他比较收敛，据说这是他第二个夫人的良好影响所致。

章炳麟是近代中国的一位出名的经典学者，他的学生中有不少后来在各自的专业中很有名望，例如钱玄同、朱希祖和1902年的举人吴承仕（1885—1939）。黄侃、汪东是章炳麟最赞赏的两个学生，并称黄汪。

张伯苓 字：寿春

张伯苓（1876—1951），著名的基督教徒教育家，1919年在天津创办南开学堂，成立南开大学，并担任校长之职一直到1948年。中日战争期间，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1948年在南京任考试院长，1949年退休后住在天津。

张伯苓出生在天津一个颇有才学的家庭，他是长子。他父亲是一个纨绔公子，也是一个学者，他因贪图享乐而耗尽家财，败落到只能以授课谋生。他父亲有鉴于自己的失败，决心教育培植他的儿子。张伯苓由于他父亲的教育和督促，十三岁时便考入北洋水师学堂。

张伯苓是一个体魄健壮，秉赋聪颖，勤奋好学的孩子，在水师学堂五年中，他名列前茅。他的老师中有博学的严复、伍光建，以后他们以介绍西学而知名。张伯苓在北洋水师学堂当士官生的最后一年，恰好是中日战争的那一年，中国海军在这次战争中为日本海军所打败，全部北洋海军消灭殆尽，因此，张伯苓在毕业后等了一年才能到“通济”舰上见习。1898年7月，该舰奉命参加山东的重要港口威海卫从日本占领军手中转交给英国控制的移交工作，那时英国强迫中国租借威海卫为英国海军基地。张伯苓因国家耻辱心灰意懒，离开海军职位回到天津。

他决心尽其精力从事近代教育事业，希望由此改造中国免于衰亡。天津的一个知名学者、热心公益的严修创办了一所在其家中开课的私学，张伯苓就在那里教书，从此张伯苓开始了他作为教育家的经历。人们称之为“严馆”或严氏家学，可算是近代教育的一个小小试验场地，除了教英语、数学、自然科学常识外，还有张伯苓教的体育。他亲自设计并由当地木工制成曲棍、哑铃，那是他在水师学堂时习用过的。他还亲自参加学生的比赛，那是在当时中国所未听闻过的。他注重科学、体育教育，他主张师生自由平等地交往，这些都是他作为中国近代教育创始人之一的确实例证。三年后，即1901年，他又在另一个私人学堂“王馆”中开课。王馆设在另一个有名的天津富翁王桂昌的家里。

从这样平凡的开端中，以南开为名的教育事业逐渐发展起来了。建立南开学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张伯苓和严修的交情。严修是一个学者、藏书家、爱国者，他对西方新知识抱着虚心接受的态度。他在天津和华北的声望很高，是张伯苓经济上的靠山。张伯苓则青年有为，富于献身精神。严张二人曾于1903年同去日本考察该国的教育事业。

1904年，他们决定扩充天津的严修私立学堂为一所近代中学，称为第一私立中学，招生七十名。两年后，朋友们捐出了二亩地，第一私立中学就搬到这个名为南开的地区，校名也改为南开中学。为了熟悉近代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张伯苓于1908年去美国、欧洲游历。

南开的目的是“革除旧习，培植青年，拯救国家”。中国的弊端可以归纳如下：体格虚弱，迷信而缺少科学知识，贫穷，缺乏社会公德和社会革新，自私。纠正这些缺点，张伯苓提出了改革教育的五点方案并予以实施：1.增强体质；2.以近代科学方法和科学成就培养青年；3.组织青年参加团体活动和集体事业；4.施以德育训练；5.培养学生为国效力的意志和能力。

张伯苓早期的教育家生涯，受到他所爱好参加的华北基督教青年会活动的影响。张伯苓在北洋水师学堂时，有一个美国青年会秘书华伦·里昂在1895年于天津设立了中国第一个市区青年会。当时，正是张伯苓创办第一所学校的时候，他已经结识了几个美国青年会的秘书，其中有在华北工作的两名著名运动员，一个是罗勃特·盖利，他是普林斯顿全美足球队中锋，还有一个是C·H·罗勃逊。罗勃逊是杜柏的跳高运动员，每周在天津圣经班讲道，对张伯苓有直接的影响，向张宣传基督教是改革社会的一种力量。张伯苓通过这些人和其他美国青年会代表人物，其中包括约翰·郝西的父亲罗斯科·M·郝西，又通过他1908年出国考察所得的个人经验，看到宗教的力量可以推动社会公共事业。他对基督教的信仰逐渐加深，在1909年成为一个基督教徒了。当时，国内的士大夫中投身于此的为数极少，他的决定入教极其引人注目。

也许由于他和青年会的关系，张伯苓当时拥有业余体育运动教育革新家的声誉。1909年，经张伯苓的赞助，第一届华北田径赛在南开中学举行。中国的第一次运动会，因为乏人创导，经张伯苓敦促，由全国基督教青年会主办，在

1910年10月举行，同时还主办了全国工业展览会。此后几年中，由于张伯苓重视比赛风格和业余运动竞赛水平，他经常被邀参加区域性和全国性的比赛的工作。南开很早以来就是非教会学校中拥有优秀球队和运动员的著名学校。

张伯苓早有雄心创办一所模范的私立大学。他为此而作准备，1917年去美国人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选习教育课程。他的梦想终于在1919年实现，在天津创办了南开大学，包括文理商三个学院，1920年又增设矿业学院。他对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在1919年获得了公认，那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以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他的工作又意外地获得了天津人直系北洋军阀李纯的崇敬。1920年10月，李纯自杀身死，他给南开遗赠了一笔款子，这对张伯苓此后事业的继续发展很有用处。

南开的建设稳步发展，1923年设立了女子中学，1928年又设立了实验小学，1931年设立了南开经济研究所，第二年又设立了南开化学研究所。南开在华北高等教育界虽是后起者，但它在张伯苓主持下很快就成了一个首屈一指的私立大学。

张伯苓作为一个教育家而取得的成功，也由于他的行政才能。他物色出众的青年学者充实南开的学术岗位，他们一旦就任，就一心加以信托。在他罗致的教职员中，有如法律学家徐谟，名史学家蒋廷黻，南开文学院成为华北优秀学院中的一个。天津是一个重要工业城市，从学术和社会需要来说，设立一个经济研究中心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步骤。何廉、方显廷等经济学家主持下的南开经济研究所首先编纂生活指数，研究工厂条件，调查外贸利润。研究所渐渐成为中国经济研究的权威中心，其出版物为全世界所周知。南开的发展和扩充，使张伯苓在经济上不仅可以从政府和国内私人研究机构得到支持，而且可以从国外的教育慈善机关得到支持，其中包括中华基金、中英庚款、洛克菲勒基金。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南开用地二百亩，建起了象样的校舍，有可供三千学生之用的房屋设备。

张伯苓在南开每星期三召集全校学生进行称为“修身班”的活动，以学生生活和国内外大事为广泛主题加以议论，这是他的公民道德教育的一部分。他知道很多南开学生的姓名，还和他们作个别交谈。他还在天津首创了一个不属

于任何教派的新教教堂，以后为许多主要城市所仿效。张伯苓认为青年会是最适合中国的风土人情的基督教团体，所以他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从事这项工作。他是天津青年会的理事，又当了多年总干事。他即使在南开经济上发生问题时，仍不倦地为天津青年会募捐。

张伯苓在1894—95年中日战争期间当水师士官时，早就感到日本的扩张对中国的威胁。1927年他去东北游历，回天津后，他责成南开师生举办研讨东北各省问题的座谈会。1931年9月沈阳事变后，日本的军事势力直接影响南开所在的华北天津地区。在继续不断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学生示威游行中，南开学生起了关键作用，因此引起华北日军司令部的仇视。南开校舍接近日军警卫队军营，张伯苓别无选择的办法，只能处在一触即发的严重形势之中。1937年7月7日，日军袭击华北后，日机即连续两天（七月廿九、卅日），对南开低飞轰炸，南开校舍化为一片瓦砾。

南开被毁的消息传到张伯苓处，当时他在南京，他为此向蒋介石报告，蒋指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只要有中国，就有南开”。张伯苓在政治上并不活跃，国民政府1928—1937年的十年期间，他和蒋介石并无亲密来往，只是在1934年杭州中央航空学校学生毕业典礼时同时在场，蒋介石是航校的名誉校长，张伯苓之所以出席，是因为他的四子张锡祜是那一届毕业生。蒋介石和张伯苓都作了热情的讲话。1937年南开校舍被毁后不久，他的儿子架机出击轰炸失事，张又遇到另一场悲剧。

三十年代中，日军加紧侵略，张伯苓曾去四川，准备在内地为南开找到一处校址。1937年中日战争前夕，他在重庆附近辟地建立了一所南育中学，1938年经南开同学会之请，改名为重庆南开中学。战时几年之中，这所学校成为华西的一个重要教育机构，它保持了天津先驱者的高水平和传统。

华北陷入战火之中，南开大学被迫迁往安全地区，和北大、清华于1938年先行迁到湖南长沙而合并为临时大学，以后又迁往云南昆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三个最高行政领导人组成校务委员，张伯苓代表南开，梅贻琦代表清华，蒋梦麟代表北大。张伯苓大部分时间都在战时首都重庆，他在国民参政会的政治事务中花了不少精力。

张伯苓在从事教育事业的经历中，政府曾授于高级职位，但一直到战争爆发之前，他迄未积极参与。1938年国民参政会成立，他任副议长。这是一个半民意机构，有各党派代表参加，原来的用意是反映群众舆论。张伯苓忠于职守，勤勤恳恳，他一贯忠于蒋介石，把他看作是全国抗日的象征。

1945年日本投降，张伯苓计划把南开迁回原址，那里的校舍已被战火毁坏殆尽。国民政府为了实践蒋介石1937年“就有南开”的诺言，下令自1946年改为国立，张伯苓仍任校长。这个地位的改变，对年迈的教育家虽是一种宽慰，但是筹措南开事业继续发展所需的经费却是一件困难而麻烦的事。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对张伯苓长期从事中国高等教育大为赞扬，他认为张伯苓“在美国具有潜在的拥护者，因为美国对兴办教育宗教事业的呼吁总会给以响应”，张伯苓是中国的一个出色的拓荒人，把教育当作国家的事业，这是中国的传统。

1946年，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张伯苓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去美国出席典礼。由哥伦比亚大学法兰克·M·法肯索尔宣读的荣誉状中赞扬：张伯苓是“教育家，南开大学创始人和校长，是具有全国影响而为世界所公认的教育机构的缔造者、人才的培育者，是一位五十年来以坚强的信念、一贯的忠诚献身于教育青年复兴中国的伟人，他是民族自信心的一个象征”。

为了纪念张伯苓半个世纪从事近代中国教育事业，他在国内和在美国的友人撰文编了一本名为《另一个中国》的纪念集。纪念集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在混乱的政治军事事件后面，还存在着另一个中国，富于人情而趋向进步，那才是活生生的重要事实。在这本纪念集的一些文章中谈到了张伯苓的传略、他的主要成就以及与他有关的一些近代中国历史的片段。这些文章是由胡适、司徒雷登、恒慕义等人撰写的。

他从事许多公共事务，是一个无党派人士，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才加入国民党，而在1945年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他年过七十岁，在1948年新宪法公布后他还同意任考试院院长。1948年冬，共产党军队进占天津时，他仍在天津。1951年2月23日在天津中风去世，年七十六岁。

张伯苓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北方人，他比一般人都要高。他嗜爱体育锻炼，

常常参加学生的比赛。他是一位雄辩的演说家，是一个能够生动感人地阐述普通的道德信念的能手。他经常为学校慷慨解囊，而私人生活的节俭又可引为表率。他很重视基督教青年会的地位，认为它阐明了实用基督教，因此他竭力设法提高它的声誉，认为它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合力提高中国社会道德正义的一个机构。张伯苓认识到各种教派传入的危险性，因此提倡建立反映中国思想和实际的新教组织形式。

张伯苓遗有几个儿子，还有他的幼弟张彭春。他的长子张锡陆，曾在芝加哥大学学数学，后在国内当教授。张彭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文学戏剧，回国后在天津协助张伯苓工作，在南开导演戏剧节目。他特别喜爱戏剧艺术，曾在南开登台扮演过西方戏剧著名剧目中的角色而引人注目。1930年梅兰芳去美国演出时，张彭春自荐充为领班和新闻代表，为梅兰芳戏班的演出节目给美国观众作讲解，他们对中国的舞台传统和演出技巧是完全陌生的。张彭春后来进入外交界，曾任中国驻智利、古巴公使，他退休后住在美国，新泽西、纳特莱是他的寓所，1957年7月19日因心脏病去世，年六十五岁。

章士钊 字：行严

章士钊（1881—— ），记者，教育家，政府官员，律师，主要由于主编《苏报》、《独立周报》，特别是《甲寅》这一类报刊而在中国文坛和政治思想界负有盛名。

章士钊，湖南长沙人，出身于一个务农家庭。他家境清寒，但他父母仍送他在本地私塾读书，由此获得了中国典籍的基础知识。1901年他和他幼弟去武昌准备入军事学堂。第二年，他进了南京陆军学堂，同学中有后来成为反满革命领袖的赵声。当时南京学生中动荡不安，他和三十几个同学一起去上海，在上海进入了爱国学社，这是一所对学生进行革命思想教育的学校，那里的教师有蔡元培（任校长）、章炳麟、吴稚晖等人。他在爱国学社认识了张继、邹容

等青年激进分子。

1903年5月，章士钊主编《苏报》，除了他本人发表日益激进的观点外，又刊载了章炳麟的两篇鼓动文章，一篇是为邹容著名的《革命军》小册子写的序言，一篇是驳康有为君主立宪谬论的文章。因章士钊主编的《苏报》的革命论调日益增强，7月，满清当局查封《苏报》，并监禁章炳麟、邹容。身为该报编辑的章士钊却未遭逮捕。

1903年8月，章和张继、陈独秀等人创办了《国民日日报》，它对政治革命的主张较之《苏报》更为激烈。章士钊在该报用笔名青桐发表的文章，一时在国内的和在日本留学的学生中流行，不仅被视为是政治文献，其文章风格也被视为典范。

1903年冬，他和黄兴组织华兴会，这是湖南大举反满的一个秘密组织。他又翻译了孙逸仙政治活动的积极支持者、日本冒险家宫崎寅藏的1902年在日本第一次出现的著作《三十三年落花梦》。章士钊的节译本中有一篇序言，称赞孙逸仙是当代中国革命家。译本于1903年在上海出版，流传很广。1904年下半年，因广西前巡抚王之春被刺受嫌，与张继、黄兴一同入狱。六周后获释，他怕政府当局再来胁迫，和他的友伴去日本。

章士钊在东京对日本的近代化大有感受，他认为中国要达到同样的近代化程度，根本的要求是发展教育而并不是政治革命。因此他渐渐摈弃了他过去的激进主张。1905年8月革命的同盟会成立，虽经张继、章炳麟多次劝说，他始终拒不加入。他进了正则学校读英语，准备研究西方文化，1908年去苏格兰继续研究西方教育。他在爱丁堡大学，潜心研究政治经济学，嗜读巴奇豪特、布赖斯、霍布豪斯等有关立宪政府和内阁制度的著作。他又酷爱逻辑学而浏览了古代中国名家的著作。这样，他能校正严复有关弥尔、杰文斯的译本。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章士钊回国。他在英国时，曾写过几篇论西方立宪政府和政党发展的文章发表在北京的《帝国日报》上，引起了国内致力立宪政府的人士的注意。他到上海后，和宋教仁长时间讨论政府组织诸问题。他仍拒绝老朋友劝请他加入同盟会，但接受于右任之请参加《民立报》编辑。1912年春夏之际，他在《民立报》上概述了他对于政党政治的观点。他崇拜英国的

两党政治，而对当时中国政党的混乱状态极为不满。他主张现存所有政党全行解散，然后召开全国政治协商大会成立两大政党，以便代表相反的意见。这个建议受到多方面攻击，尤其是同盟会（已改组为国民党）会员的攻击。他在国民党的猛烈攻击下，离开《民立报》，1912年9月创办了他自己的《独立周报》，继续对政府和时局发表他的理论和意见。

1912年下半年，国民党和袁世凯之间的关系紧张，袁世凯利用章和革命党的分歧，请他到北京去，并授以高职，其中包括北京大学校长之职。但章对袁世凯心存疑虑，自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后，他就离开北京去上海，在那里他遇到袁世凯的宿敌岑春煊，乃与之联合反袁。在1913年夏二次革命中，他担任老友黄兴的秘书长。二次革命失败，章和袁世凯的不少政敌一起流亡到日本，在日本住了三年。

1914年5月，他创办了他所办刊物中最有名的《甲寅杂志》，抨击袁世凯违反共和政府的原则。《甲寅杂志》一时成了国内外的一个重要论坛，其通讯栏尤为引人注目，来信人物中有陈独秀、李大钊、吴稚晖等人。但是主要撰稿人却是章士钊本人，他阐述立宪政府、内阁制度、政治上的协商原则等思想。他的文章论调平允，说理清楚，使《甲寅杂志》在中国知识界中获得了极大的声望，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1916年初，武力反对袁世凯帝制运动的势力日强，章士钊和岑春煊一起回国。5月，岑春煊在广东肇庆担任反对袁世凯的军务院代理执行抚军长职，章则任秘书长。黎元洪就职当总统，旧国会恢复，章士钊以湖南议员身份（章士钊是在1913年自湖南省选出的国会议员）去北京参加国会，同时又在北京大学新设的研究所担任高级教师讲逻辑学。1917年1月他将杂志恢复改为《甲寅日刊》。6月，段祺瑞执政，解散国会，章离北京去上海。1918年5月，一年前由孙逸仙在广州成立的军政府改组，由章的旧友岑春煊主持。1919年章士钊受岑委派，任南北议和的南方代表去上海参加和议。

国内政局混乱，国会因无法对军人行使权力而一再失败，这一切使章士钊和其他知识界名人怀疑到中国是否适合采用代议政治。1921年2月，他又去欧洲想亲自考察英国的政界变化。他在伦敦，和威尔斯、萧伯纳这样一些名人谈

话。他们对中国政局的评论，加深了他对代议政治的有效性的怀疑。他认为代议政治只适合于西方工业化国家，而中国基本上只是一个农业国，因此，其基本需要是发展适合于农业经济的社会政治机构。

章士钊1922年回国，11月由教育部聘为由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改组的国立农业学院院长。1923年6月，黎元洪被直系军阀逐走，章士钊也离开北京到上海。10月，曹锟购买国会议员当上了总统，使他从代议政治的迷梦中彻底醒悟过来。他在《新闻报》和《东方杂志》上写了不少文章，反对代议制度和其他西方输入的政治制度，而主张采取一种适应中国农业基础的政治制度。为了广泛宣传他发展中国农业的观点，他计划恢复他的《甲寅》周刊。

1924年10月，曹锟被逐，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因为章士钊最近主张取消国会废除宪法，段祺瑞想利用他的声望，把他纳入政府中。11月，他就任司法总长，不久，他就着手检举贿选曹锟的国会议员。

1925年4月，因政府和北京各高等院校的冲突日益加剧，章士钊被任为代教育总长。他对各院校的学术水平和纪律表示不满，宣布教育部统管各校入学考试和毕业考试，并合并八所国立院校。他的措施引起学生们的激烈反对，在此以前，学生一直是不必考试的。对章士钊的愤怒于1925年5月7日达到高潮，这一天学生要纪念“国耻日”（1915年5月7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学生们被报纸登载的一条教育部禁止学生游行的新闻所激怒，一批人冲入章士钊住宅加以捣毁，两日后，又要求撤他的职。5月12日，章辞教育总长职去上海。

6月，章士钊受段祺瑞之请回北京仍任司法总长。面临延续不断的学潮，1925年7月26日段又任他为教育总长。当时纠纷的焦点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罢课反对校长，得到该校著名教师周树人、李石曾、沈尹默等人的支持。章士钊采取强硬手段制止罢课，甚至采取由教育部强行改组该校的办法，这一决定更引起师生的反对。章士钊不顾朋友规劝和公众舆论的指责，调动京师警察谋用武力解决。章士钊如此不得人心，以至在1925年12月间，他的住宅被学生全部捣毁。他虽于11月提出辞职，但一直留在北京担任段祺瑞的秘书长之职，直到1926年4月。段祺瑞退出政府后，章士钊离北京住在天津日本租界。

章士钊在青年知识界和学生界中之所以不得人心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1925年7月在北京出版的《甲寅周刊》上反对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在这份杂志里，他说明了他对于中国的所谓欧化的疑虑，并反复申述他的所谓中国基本上是农业国家，只应发展现存的制度而不应效法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观点。他批评别人盲目摹仿西方而弃本国传统于不顾。他希望新旧调和——善于采用中国特有传统，以适应目前需要。这些基本上保守的观念，引起了当时不少进步的知识界人士强烈的反对甚至嘲讽，在他们看来，由于章士钊在文学上很有声名和影响，他是一个危险的反动分子。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曾下令逮捕北京政府中的重要人物，其中包括章士钊。1928年底，国民革命军进占北京，章士钊携全家作第三次欧洲之行，遍历德、法、英诸国一年多。1930年春回国，应东北军阀张学良之聘任沈阳东北大学文学教授，1931年3月，任该校文学院院长。经张学良调解，南京国民政府取消对他的通缉令。1931年9月沈阳事变后，他应上海闻人杜月笙之请回上海，并由杜协助开业当律师。1932年10月他曾自愿为以叛国罪被控的老友、中国共产党前首领陈独秀辩护。1933年4月章士钊提出了一篇为陈独秀辩护的长篇答辩，这篇答辩（虽未为陈独秀本人所接受）被视为文学上和法学上的杰作。章士钊在法律界成了名人后，1934年春任上海法政学院院长。

抗日作战初期，章士钊留在上海租界，1941年秋，由杜月笙派人护送经香港去重庆。战时的几年中，他蛰居在杜月笙寓所，并曾企图劝说杜月笙组织一个新政党。

1945年下半年，他回上海重开律师旧业，在他受理的许多著名诉讼案中，有一件是为汉奸梁鸿志叛国罪辩护，没有取得成功。1949年初，内战形势有利于共产党，章士钊曾当过国民政府代表去北平两次商讨和平。章士钊本人受到毛泽东优礼接待。以前章士钊曾经在经济上给予毛泽东好几年资助，章士钊早年在英国留学时也认识毛泽东岳父杨昌济。1949年4月，谈判失败，章士钊决定留居北京。五十年代初期，他多次出访香港，据说是为了寻求当地的著名中国人士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朝鲜战争。

这位住在北京的年迈学者章士钊，曾对1911年革命前反满活动中的重要事

件和重要人物重新作了评价。他被认为是支持这样一种看法的一些人的代表，即认为在中国早期的革命活动中以及在辛亥革命以后革命党人中间的政治论争中，黄兴的重要作用大于孙中山。1961—1963年北京出版的《辛亥革命回忆录》的一篇他论黄兴的文章中说明了自己的意见。他说，他早年曾和全国知识界和政治界人物有过交往，黄兴为人豁达有大度，最易相处。他觉得章炳麟、陈独秀、李根源三个人最难与共事。

章士钊的大量著作包括他为一些杂志写的论文和散文，大部重刊在《甲寅杂志存稿》中，收集了载于《甲寅杂志》、《甲寅周刊》、《独立周报》上的文章；《长沙章氏丛稿》包括他在1923—24年载于《新闻报》的政论文章。他长期研究逻辑学的文章见于《逻辑指要》和《名家小说》。他还编过中文字典《中等国文典》，并写了《弗罗乙德序传》。作为一个作家来说，他在《甲寅杂志》上的文章是最好的。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西方文法和逻辑的明显影响。章士钊运用古文辞的简练畅达，为其前人或同辈所不及。

章士钊的夫人吴弱男，是袁世凯在朝鲜时的军事上司吴长庆的孙女。她是日本留学生、同盟会会员，1906年经章炳麟介绍，认识了章士钊。

张大千

张大千（1899，5，10—— ），画家，鉴赏家，他以继承多种古典画派的绘画和临摹甘肃敦煌壁画而获得了国际声誉。

张大千四川内江人，父亲张怀中，母亲曾怡也是画家。他有兄弟姐妹八人。张大千最初从母学画，十二岁时已善画花卉、人物和风景。他最初从长姊学中国典籍，直到她1911年去世为止。那年，张大千一家处境不佳，因为他的长兄张善孖从事反满革命运动。张善孖后来又参加过1915—1916年反袁运动，但最后脱离政治，从事绘画，以画虎知名。张大千的幼弟张春寿（译音）也是画家。

1914年，张大千到叙州进中学，直到1916年。据他本人记述，他在叙州曾被土匪绑架勒索赎金，幸得逃脱，于1916年12月到上海。1917年4月，去日本京都和他的长兄张善孖住在一起，他在京都学了在织物上的绘画艺术。

1919年张大千回上海当学者曾熙的学生。不久，他进了松江的一个寺庙，那里的方丈怡灵（译音）是一个诗人，兼擅书画，给他取名为大千。张大千在寺庙舍生期满回四川结了婚。后又经曾熙之劝去上海就学于画家李瑞清（1867—1920），兼从李学篆刻。李死，他又回四川一直住到1925年他父亲去世。在此期间，他潜心学十七世纪的两个禅家画师石涛（1630—1707）、八大山人（1626—1705）的画法，他们的画风对张大千的绘画影响极深。1926年他在上海住家，第二年，他开始游历那些曾使古代名画家从中获得灵感的名山大川。

1929年，张大千任在南京举行的全国美术展览会征选委员，这个展览会是由教育部主持，广东画家高剑父筹办的。以后张大千和他长兄张善孖以官方代表身份去日本参加在东京举办的中国古代画展。第二年，张大千迁往苏州的一所古旧住宅居住，种花、养猴，还养了一只虎，借以自娱。1933年迁居北京，这一年，他的作品选入巴黎手工艺术博物馆中国画展展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1934年春，他在南京举办了一次相当成功的个人画展。同年秋，他和他兄弟游览华山，12月去日本。1935年他游览龙门石窟，9月在北京举办了一次展览会。1936年他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美术系教书，系主任是徐悲鸿。当年，他在上海主办画展，其个人声誉大为增高。

1937年他回北京。7月7日芦沟桥事变时期，张大千被日军逮捕，监禁一周后释放。1938年他逃离北京回四川，第二年他遍游华西名胜，其中包括峨眉山和青城山。

1940年，张大千去甘肃敦煌龛窟，他对那里的佛教壁画大为欣赏，随即组织了一批助手，两年之中临摹了二百多幅壁画。1943年他在成都举行个人画展，又在1944年1月展出敦煌壁画临摹本，5月，他带着展品去重庆。这些展品引起了广泛重视，因为人们第一次对古代佛教艺术杰作有了认识。他的敦煌临摹作品印影出版，并附有导言。1945年，张大千在成都又一次举行展览会，1946年回北京。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近代艺术宫举行现代画展，张大

千的十二幅画选入中国画馆展出。这个展览会又在伦敦、日内瓦、布拉格巡回展出。1946年11月，1947年5月，张大千先后在上海举行展览会。1948年去香港，在他去台湾之前，还在香港举行过一次展览会。

1950年1月，张大千由全印工艺美术协会邀请去新德里举行展览会，5月又在海德拉巴举行展览会。他留在印度直到年底，曾以三个月时间去阿旃陀观摩壁画。他回香港后于1952年全家迁往阿根廷。1953年又去美国，9月在纽约中国学院举办一次展览。接着又去台湾参观故宫收藏的古代绘画。1954年，张大千全家迁往巴西圣保罗。1955年，张大千去日本东京，他个人收藏的古代绘画的影印本四卷在东京出版，并在那里举行了一次个人画展。1956年1月，他第一次去欧洲，游历了罗马、巴黎。6月7月间在巴黎近代美术馆举行个人画展，不久，毕加索请张大千到他在法国南部的别墅作客。他在巴黎森纽赛博物馆展出了几幅他私人的古代藏画。1957年他经亚洲回巴西，1961年第二次访问巴黎，会见安德里·马松，与之探讨中国绘画的原理。

评价张大千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是困难的。他是一个具有多方面兴趣而又多产的画家，但是他的大量作品为私人所藏，一般人难以见到。他和马松的接谈中说到：“每一个中国画家的目标和抱负是通过手来表达出内心感情”。虽然他总是精细地遵循中国大师们已开创的道路，很少有自己的创新，但是他运用色彩和画笔的技巧无疑是第一流的。张大千从承袭南派大师画风景画的笔法，转为绘画敦煌壁画风格的画，这种转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西方人士感到困惑。他的仕女画很受人赞赏，那是反映了他临摹敦煌壁画的强烈影响。但是他的代表作却是风景画和奔放潇洒的荷花等花卉画。

张大千收藏古代绘画名作，他常从此得到启发和借鉴。据说他临摹名家的作品和原作一模一样，甚至他本人也难识别。张大千遵循中国古代格言，保持艺术家的精神和传统，因此，为很多人所崇敬。

张大千是个不知疲倦，热情奔放的人。他留着一把古代哲人的长胡子。他以品尝名酒和鉴赏美女的行家知名。在国内时，他经常雇有专门厨师，这些厨师往往因替这个饕餮的艺术家服务抬高了身价。张大千是最后一批中国传统的浪漫派画家之一，这在他的生活和作品中一贯表现出来。

附 录

中华民国史研究工作简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中国史学界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即很重视。1956年制定全国十二年科学规划时，《中华民国史》被列入重点项目，仅次于《中国近代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等书之后。1961年为辛亥革命五十周年，我国掀起了研究辛亥革命的高潮，史学家写的论文和专著，辛亥老人写的专文和回忆录，已出版的不下一千余万字。全国政协、各省市政协、文史馆和各出版社收存的稿件，更不计其数，真是盛况空前。就在这年，董老（必武同志）提出要专修民国史和重修清史。随后，周恩来总理也曾一再提到要修民国史。1971年在周总理领导下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制订了出版计划，《中华民国史》就是1972年列入这次出版计划的。是年秋，我们接受了编写《中华民国史》的任务，于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设立中华民国史研究组（编制五十人），专门从事这项研究工作。当时，全国正在进行“批林整风”，“奴隶创造历史”的观点深入人心，不少同志认为民国史应该以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为中心内容。经过一场争论，大家才明确地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不同的历史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去反映。民国史不仅应与党史、革命史有明显的区别，就是和一般的通史也应有所不同。它应着重地写民国时期统治阶级方面的历史。最后，我们甚至这样地提出：不但要敢于为资产阶级革命家树碑立传，而且要敢于给反动派以至给汉奸卖国贼树碑立传，因为反面教员是绝不可少的。为此，我们拟的一千人的传记名单中，既有袁世凯，也有汪精卫。经过讨论，我们还明确地认识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针，就是要写真史，写信史，注重调查研究，广泛搜集资料，在确实可靠的资料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叙述历史、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

要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写历史，反对任何主观与臆造。

通过讨论，统一了思想以后，我们制订了一个编写中华民国史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首先要编三部资料书：一，中华民国大事记（估计编成后约二百万字，初稿字数更多）。二，中华民国人物志，其中人物传记约一千人（每人平均写三千字），人名辞典约四千人（每人平均一二百字）。三、专题资料，现拟出专题近六百个，每个专题字数不定，以少而精为原则。在资料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即着手写一部书，定名为《中华民国史》。分三编（六卷）：第一编为中华民国的创立（一卷，1905——1912）。第二编为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分二卷，1912——1928）。第三编，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分三卷，1927——1949）。为了便于推动工作，展开全国协作，集中资料和征求意见，从1973年起，由中华书局为我们出版了一个不定期的内部刊物《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开始每集印四千份，后增为八千份，由中国书店内部发行。

由于工作开始之初，就经过了民主的讨论，整个民国史研究组的同志们对方针任务的认识比较明确和一致，所以后来在“批林批孔”、“批儒评法”以及反右倾等运动中，我们的研究工作一直坚持下来了，而且没有迷失方向。一个时期，有人说我们犯了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错误，要我们以上海的《学习与批判》为榜样，我们没有听话。又有一个时候，有人不要我们写民国史，甚至说《中华民国史》这个名称就是错误的，应该写现代史，我们也没有听话。实践证明，我们坚持了正确的方针，抵制了错误的意见。但是，在1972——1976年这段时期中，当“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我们的研究工作也不能不受到影响，工作进度很慢，研究成绩不大，就是显著的证明。

截至1978年底，我们共出版了《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二十三集，正在付印中的六集，公开印行则只有人物传记一册。根据现在的情况，大事记1927年以前的初稿已编完，其余的每年都已有人在编写，预计1979年可大部完成初稿，1980年可全部完成并印出初稿，然后再修订公开印行，至1983年当可竟全功。人物传记以后拟每年公开印行一册。专题资料的编写要靠全国协作，每年总可以出几册，但准确的进度目前尚难定。《中华民国史》一书，第一编初稿已草就，须经1979年修改后才能付印。第二编已拟出提纲，准备立即动手编写。第三编

拟于1980年动手。全书大约要到1985年才能完成。

编写《中华民国史》是一项重大的任务，即不能因袭封建时代修史（那样无所不包）的办法，也不能像写普通历史著作那样写成一本书或一部书就算完事。它即要写一部（多卷本的）概括整个民国时期的专著，又要整理、保存这一时期的大量资料。因此它的规模不能太小，我们的计划只能算最低限度的要求。但我们的人手不多，水平又不高，因此只有靠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行全国大协作来完成。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经成立；中华民国史研究组已扩大为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藏有民国时期全部档案的南京档案馆已归近代史研究所领导，所藏档案首先供研究民国史利用；而且全国协作的局面也逐渐形成；我们相信：在新时期的大好形势下，在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下，我们的任务是—定能够完成的。我们热切地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支持！我们诚恳地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批评和指教！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1979年4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稿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第一分册)

作者=(美)包华德主编 沈自敏译

页数=115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79年06月

SS号=11004759

DX号=000002205512

url=<http://book.duxiu.com/>

bookDetail.jsp?dxNumber=

000002205512&d=E8EC3AF34B424CBE

8ED83642F81B6878&fenlei=

1103050207&sw=%C3%F1%B9%FA%C3%

FB%C8%CB%B4%AB%BC%C7%B4%C7%B5%E

4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译者说明

序言

白云梯

詹大悲

詹天佑

张继

张季鸾

张其锃

张其昀

张嘉璈

张嘉森

张謇

张之江

张治中

张群

张恩溥

张尔田

张发奎

张学良

张勋

张一麐

张人傑

张澜

张厉生

张默君

张弼士

章炳麟

张伯苓

章士钊

张大千

附录：中华民国史研究工作简介

目录